

社会无政府主义与组织

(2009年)

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

Social Anarchism and Organisation



by Federação Anarquista
do Rio de Janeiro - FARJ
Translation by Jonathan Payn

Social Anarchism and Organisation

Anarchist Federation of Rio de Janeiro

原文链接：<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anarchist-federation-of-rio-de-janeiro-social-anarchism-and-organisation>

目录

译者引言	5
2008 年大会的背景和关于组织问题的辩论	8
社会无政府主义、阶级斗争与中心-边缘关系	11
巴西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媒介的丧失与重建	16
统治与剥削的社会：资本主义与国家	25
最终目标：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33
组织和社会力量	44
社会运动与人民组织	49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	61
资源管理	63
图 1	68
图 2	71
图 3	74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社会工作和嵌入	77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理论的生产和再生产	84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宣传	87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政治教育、关系和资源管理	90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与社会运动的关系	92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战略、战术和纲领的必要性	98
Especifismo：无政府主义组织、历史观点和影响	103
说明和结论	122

举行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Anarchist Federation of Rio de Janeiro, FARJ*) 第一届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加深我们对组织问题的思考，并将其正式纳入一项纲领。自 2003 年以来，我们组织内部一直在进行这场辩论。我们编写了理论材料，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从政治实践的成败得失中汲取了经验教训。《社会无政府主义与组织》(*Social Anarchism and Organisation*)文件正式确立了我们在所有这些思考之后的立场。它不仅仅是一份纯理论文件，还反映了五年来我们在人民的社会斗争中实际应用无政府主义后得出的结论。文件分为 16 个部分。该文件的葡萄牙语版本已由 Faísca 和 FARJ 共同出版。

2008 年 8 月 30 日和 31 日举行的第一届大会批准的文件

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向其同志们致敬：

胡安·佩雷斯·布扎斯 (*Juan Perez Bouzas, 1899-1958 年*)

胡安·佩雷斯·布扎斯 (*Juan Perez Bouzas, 1899——1958 年*)，加利西亚裔无政府主义鞋匠。2008 年是他逝世 50 周年 (1958 年 9 月 5 日)。

爱迪尔·佩雷斯 (*Ideal Peres 1925-1995 年*)

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保证了无政府主义社会轴心的维持和几代激进分子的联系。

普利尼奥·奥古斯托·科埃略 (*Plínio Augusto Coêlho, 1956 年至今*)

孜孜不倦地为我们的梦想注入实质内容，将它们与那些在革命的平静或动荡中先行一步

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你们仍然孤立无援，如果你们每个人都不得不独自行动，那么毫无疑问，你们将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如果你们聚集在一起，组织起你们的力量——无论起初多么微弱——只为联合行动，以共同的思想和态度为指导，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那么你们将变得战无不胜。

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译者引言

这份文件最初以《社会与组织无政府主义》(Anarquismo Social e Organização)为题以葡萄牙文出版，于 2008 年 8 月在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盟 (Federação Anarquista do Rio de Janeiro) 第一届大会上通过，旨在勾勒出无政府主义联盟关于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构想，“它不仅仅是一份纯粹的理论文件，……还反映了无政府主义在我国人民的社会斗争中实际应用五年后得出的结论”。

在这份文件中，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Anarchist Federation of Rio de Janeiro, FARJ) 通过爱迪尔·佩雷斯 (Ideal Peres) 等卡里奥卡^{1}无政府主义者的战斗历史，追溯了自己的历史和组织根源，爱迪尔·佩雷斯曾在独裁统治的黑暗岁月中努力点燃无政府主义的火焰，他的父亲胡安·佩雷斯·布扎斯 (Juan Perez Bouzas) 是加利西亚移民无政府主义者，他果断地参加了 1934 年的塞战役，“无政府主义者面对整合主义法西斯的机枪毫不畏惧^{2}”。

《社会无政府主义与组织》可能是目前英文版中对拉丁美洲无政府主义概念最全面的阐述之一，它追溯并概述了对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RJ)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概念及其社会变革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影响。该书倡导一种无政府主义概念，将无政府主义活动分为社会（社会或“群众”运动）和政治（基于特定/专门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组织，*Specific anarchist organisations*）两个层面，认为这种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组织二元论方法 (*Organizational Dualism*) 与巴枯宁本人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的思想和实践是一致的，并且可以追溯到巴枯宁本人的思想和实践。通过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盟 (Federación Anarquista Uruguaya, FAU) 和 1918 年无政府主义联盟 (Aliança Anarquista) 以及 1919 年共产党 (Partido Comunista, 内容为自由意志) 的经历；通过墨西哥革命期间马贡主义者 (Magonistas) 的经历和墨西哥自由党 (Partido Liberal Mexicano, PLM) 的激进阶段，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FARJ) 将这一共同的政治血统追溯到巴枯宁；西班牙革命期间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erica, FAI) 和社

鲁提之友小组 (*Friends of Durruti group*) 的经验,以及《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组织平台》(*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 《平台》, 作者为马赫诺和阿尔西诺夫)作者的经验;艾力格·马拉泰斯塔 (Erico Malatesta) 对无政府党 (*anarchist party*) 的构想

从无政府主义辉煌时期结束时失去“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影响力)的经验中, FARJ 主张需要一个专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specific anarchist organisation*)——组织严密, 由高度忠诚的激进分子组成, 在理论和战略上高度统一——通过参与和支持反对剥削和统治的群众运动和斗争, 寻求以无政府主义原则影响这些运动, 并使其朝着革命和自由意志的方向发展。其最终目标是夺回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 作为通过社会革命引入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

为了提高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影响力, FARJ 重申无政府主义需要越来越多地与被剥削阶级接触, 从而将阶级斗争视为传播无政府主义原则和实践的最重要、最肥沃的土壤。然而, 为了让这些原则和实践扎根, 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在被剥削阶级的运动和组织中开展长期、持续的宣传、组织和教育工作, 而且——对 FARJ 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始终以符合其所谓的“激进伦理”(*militant ethic*)的方式行事。《社会无政府主义与组织》概述了 FARJ 对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各种任务的构想, 以及其结构、吸引新成员的程序和对社会运动的定位——所有这些都遵循同心圆的逻辑。

《社会无政府主义与组织》对“我们在哪里? ”、“我们想去哪里? ”和“我们认为如何才能离开我们现在的位置, 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 ”这些问题做出了战略性回答, 阐明了 FARJ 对“剥削和统治社会”——资本主义和国家——下的社会阶层的理解, 以及对其最终目标——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理解, 并说明了这些目标可能是怎样的。在此过程中, 它解释了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对“人民组织”(*the popular organisation*)的概念, 即团结为解放而斗争的社会运动, 积累日常阶级斗争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果, 而不是孤立的社会运动力量的简单总和, 它将构成一股更大的社会力量, 当这股力量大于国家和资本的力量时, 就与现行制度根本决裂, 并以暴力作为对国家和资本暴力的必要回应, 通过社会革命启动向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 自该文件最初发表以来, 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已开始使用“人民权力”(*popular power*, 亦可译为大众权力/人民力量)一词来代替“人民组织”, 并进一步发展了其对这一对“特定主义”(*especifismo*, 可翻译为专门主义或特殊主义)至关重要的概念的理解。

在这份文件通过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巴西无政府主义革命阵线经历了一系列理论发展，例如：深化了基于“统治”范畴的阶级概念，同时将经济阶级视为统治的一种；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巴西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新的研究和理解；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深化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一些主题。此外，还取得了一些实际进展，包括与以下运动开展了“社会工作”：基层失业工人运动（Grassroots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MTD-Pela Base）、无地运动（Landless Movement, MST）、人民议会运动（Movimento Conselhos Populares）以及参与创建“人民组织”倾向。虽然这份文件是在特定的拉丁美洲背景下首次发表和通过的，但比本译本早了三年多，它仍然是对全球当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富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贡献；对于任何致力于在无政府主义实践中找到对“**何从此岸达彼岸**”这一问题的最合适的回应的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这个译本能对得起它。

乔纳森·佩恩 (Jonathan Payn)

Johannesburg, 2012 年 3 月

2008 年大会的背景和关于组织问题的辩论

要有效地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采取行动。

——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 (*Uruguayan Anarchist Federation, FAU*)

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FARJ) 第一届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加深我们对组织问题的思考，并将其正式确定为一项纲领。

自 2003 年以来，我们组织内部一直在围绕组织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编写了理论材料，发展了我们的思想，从我们政治实践的成功和失误中吸取了教训，现在越来越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辩论并将其正式化，在内部和外部传播这些知识。

我们两条战线——占领和社区——的实际工作对我们在这一时期进行的理论思考具有绝对的核心作用。它甚至促使我们在 2008 年初创建了第三条战线——**农业生态战线** (*the agro-ecological front*)，名为“无政府主义与自然”。

一年前，我们决定围绕组织问题进行一次必要的深入讨论，目的是将讨论结论形成一份文件，在 2008 年大会上予以确认。为此，早在 2007 年，我们就采取了一些行动，以促进必要的理论成熟，这对我们要走的这条路至关重要：

- 启动政治教育秘书处
- 举办内部教育研讨会
- 编写激进分子教育手册

这些行动旨在为我们组织的每一位战士提供结构、空间和必要的支持，使这场辩论能够以最理想的方式进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阅读、写作、辩论、重温已经写好的材料、深入讨论、作出澄清；总之，为这次辩论制定了我们认为必要的最全面的纲领。

然而，我们并不仅仅想为辩论提供一个论坛。我们希望达成更多的结论性立场，或深化本组织的政治路线。我们的组织模式的特点之一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因此我们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来深化某些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并最终形成具体的立场，由整个组织来确定和传播。

在这五年中，我们始终认为，要制定政治路线，就必须考虑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影响，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当二者以积极的方式相互影响时，就会增强本组织所有工作的成果。有了好的理论就能改进实践，有了好的实践就能改进理论。我们无法设想无政府主义组织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甚至无法发展一种理论并试图使实践完全适应这种理论。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最根本的是不能建立一个远离斗争的组织，先编写文件，然后再去实践，目的是让实践适应理论。同样，在我们看来，构想一个只有实践而没有理论，甚至把实践中发生的一切都假定为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在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不把深入理论化作为开始行动的目标，另一方面，努力确保行动与理论保持一致，根据我们的理解，理论可以加强激进分子努力的结果，而不会造成不必要的精力损失。

在过去两年中进行的这场辩论中，我们希望发展出一种适当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发展出来的其他理论。显然，我们的整个理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其他理论以及在其他背景下生活和行动的其他作者的理论。例如，如果没有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的贡献，我们就不可能构想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然而，我们对这些——这些作者的理论和思想——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思考它们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中是否有意义。我们努力创造适当的概念，旨在为我们想要创造的理论赋予原创性，在这一努力中，我们认为我们非常成功，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构建了一个连贯的理论，并将其形式化，将古典和当代理论以及我们自己的概念融为一体。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确定的理论。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我们认为我们正在沿着我们希望走的道路迈出第一步。

最后，我们希望以集体的方式开展讨论并使之正规化。对我们来说，由一个或另一个同

志来撰写组织的所有理论，而其他人只是观察和遵循他们的立场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整个这一时期都在努力考虑组织的所有立场，而不仅仅是某个激进分子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也增加了文本的价值。它不是出自一个或另一个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之手，而是五年来无政府主义斗争和组织的成果，无政府主义与我们时代的斗争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寻求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走向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总之，它是五年实践活动的成果。

为了再进一步，将我们短暂历史中积累的理论正规化，我们于 2008 年 8 月 30 日和 31 日举行了第一次大会——大会与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五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举行。大会的主要精神如下。

伦理、承诺、解放！

Ethics, commitment, freedom!

社会无政府主义、阶级斗争与中心-边缘关系

……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拒绝以新的外部创建新的中心体系的意识形态。

——鲁道夫·德容(Rudolf de Jong)

对我们来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套思想、动机、愿望、价值观、结构或概念系统，与行动——我们称之为政治实践——有着直接的联系。意识形态要求制定最终目标（长远的、未来的观点），对我们所处的现实做出解释，并对这一现实的转变做出或多或少的大致预测。从这一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套抽象的价值观和理念，与实践相脱离，具有纯粹的反思性，而是一个概念体系，它以与实践共同构想的方式存在，并回归于实践。因此，意识形态需要自愿和有意识的行动，目的是将社会变革的愿望印在社会上。

我们将无政府主义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为以**自由意志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一种基于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机构提供了行动方向，而不带有任何伪科学或预言色彩。

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无政府主义也有其历史和特定背景。它并非产生于脱离实践、只追求抽象思考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是在 19 世纪伟大的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时蒲鲁东将其理论化，并在**国际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IWA*) 中形成，巴枯宁、纪尧姆 (Guillaume)、雷克卢斯 (Reclus) 等人都主张革命社会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合法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国际工人协会的这一倾向后来被称为“联邦主义”或‘反专制主义’，并在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 (Malatesta) 等人的激进主义中得到了延续。

因此，无政府主义正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形成的，“它来自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来自工人的需要，来自工人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这种渴望尤其存在于最英勇时代的工人群众之中”^[1]。将无政府主义理论化的工作是由直接参与社会斗争的思想家和工人完成的，

他们帮助将潜藏在他们所谓的“群众运动”中的情绪正式化并加以传播。因此，多年来，无政府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发展。一方面，它以独特的方式促进了社会变革，保持了其意识形态特征，例如在墨西哥革命、俄国革命、西班牙革命，甚至在巴西的 1917 年大罢工和 1918 年起义中。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无政府主义呈现出某些特征，从意识形态特征中退缩出来，将其转化为一种抽象概念，仅仅成为对社会进行批判性观察的一种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无政府主义模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历史中找到了参照物，同时也失去了为社会变革而斗争的特点。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这一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不再是被剥削者争取解放的工具，而是一种爱好、一种好奇心、一种思想辩论的主题、一种学术小天地、一种身份、一群朋友等等。对我们来说，这种观点严重威胁到无政府主义的根本意义。

从马拉泰斯塔 (Malatesta) 与反对组织的个人主义者论战^[2]，到路易吉·法布里 (Luigi Fabbri) 早在 20 世纪初就对无政府主义受到的资产阶级影响提出批评^[3]，再到默里·布克金 (Murray Bookchin)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试图提出警告，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注意到并批评了无政府主义受到的这种灾难性影响：

除非我错得离谱——我希望我错得离谱——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和革命目标正在遭受损耗，以至于无政府主义一词成为下个世纪优雅的小资产阶级词汇的一部分——不服管教、叛逆、无忧无虑，但却令人愉快地无害^[4]。

我们主张无政府主义恢复其最初的意识形态特征，或如我们之前所定义的，“与行动直接联系的概念体系……政治实践”。为了重拾这一意识形态特征，并将自己与当代无政府主义阵营中的其他思潮区分开来，我们主张社会无政府主义，并因此证实了马拉泰斯塔和法布里的批评，确认了布克金所指出的二分法；即当今存在着一种以社会转型为目标回归斗争的*社会无政府主义(social anarchism)*，以及一种放弃社会转型方案和参与当代社会斗争的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lifestyle anarchism)*。

对我们来说，**社会无政府主义**是这么一种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工具，其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自我管理和社会联邦主义。为此，它推动无政府主义者有组织地重返阶级斗争，目标是夺回我们所说的

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我们认为，正是在被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中，无政府主义才得以蓬勃发展。如果正如内诺·瓦斯科 (Neno Vasco) 所说，我们必须把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撒在最肥沃的土地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片土地就是发生在民众动员和社会斗争中的阶级斗争。布克金 (M. Bookchin) 试图将社会无政府主义与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他断言：

社会无政府主义与注重生活方式的无政府主义、新情境主义对狂喜的调用以及小资产阶级自我日益矛盾的主权是截然不同的。两者在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定义原则上完全不同。^[5]

另一位当代激进分子和思想家弗兰克·明茨 (Frank Mintz) 在评论其著作《社会无政府主义》(Anarquismo Social) 的书名时强调说：“这个书名毫无用处，因为这两个词暗含联系。同样，它也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在斗争之外可能存在一种非社会的无政府主义”^[6]。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无政府主义必然与阶级斗争强相关**。

在我们将社会无政府主义视为“支持日常斗争的基本工具”^[7]的愿景中，我们还需要澄清我们对阶级的定义。虽然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当今社会的核心和绝对相关的，但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者选择工厂工人作为革命的独特和历史性的主体，是轻视所有其他类别的被剥削阶级，同时也是潜在的革命主体。专制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概念仅仅局限于产业工人这一范畴，并没有涵盖历史上发生的统治和剥削关系的现实，甚至也没有涵盖这个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关系。正如它没有涵盖对过去和现在的革命主体的识别一样。

从澄清这一阶级概念的需要出发，我们在被剥削阶级阵营中纳入了其他类别，这些类别在很大程度上在历史上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关注，它们能够也应该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促进社会变革的进程。这种对阶级概念的定义并没有改变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无政府主义行动的主要阵地，而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目标：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变革，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心对边缘的统治关系的变革。根据鲁道夫·德容 (Rudolf de Jong) 的分类^[8]和我们自己最近的斗争历史，我们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出发，将所有被剥削阶级概念化。因此，这个群体包括：

- a. 与中心完全疏远和隔绝的文化和社会；完全没有“融合”，在中心眼中是“野蛮”的。例如，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
- b. 边缘地区与中心地区相关，属于中心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同时又试图保持自己的特性。他们受中心地区支配，其生存受到中心地区经济扩张的威胁。按照中心地区的标准，他们是“落后”的、不发达的。例如，墨西哥和安第斯国家的原住民社区。这一类中的其他例子——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子类 b.1——是小农、技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生存受到中心进步的威胁，他们仍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 c. 曾经属于中心的经济阶层或社会经济体系，但在中心的技术革新和社会经济发展之后又回到了边缘地位。例如，临时无产阶级、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人和长期失业大军。
- d. 在经济意义上处于中心地位，但在社会、文化和/或政治意义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工人阶级、新兴工业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妇女、黑人、同性恋者。
- e. 政治性质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的关系：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关系、资本与外围的关系等。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种关系与上述经济关系平行发展——或者说，e.1 组：新资本主义统治、内部殖民化和剥削。

在接受这一分类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其局限性，因此将被剥削阶级定义为受中心支配的边缘地区。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把理论上处于边缘地区，但实际上建立了对其他地区的统治关系，从而成为新的中心的个人视为这组被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所有被剥削阶级的斗争都必须具有革命性的视角，这样它们才不会仅仅寻求使部分边缘地区成为新的中心。

从这一定义出发，关于社会变革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或改良主义）的继承者历来使用这种思维方式；另一种是自由意志，无政府主义者使用这种思维方式。

专制主义者，包括一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将中心视为一种手段，并将其政治导向中心。对他们来说，中心（指国家、政党、军队、控制地位）是解放社会的工具，而“革命首先意味着夺取中心及其权力结构，或者建立一个新的中心”^[9]。当把工业无产阶级定义为历史主体时，专制主义者的阶级概念本身就是以中心为基础的——在上述定义中用字母“d”对其进行了描述——而排斥和边缘化了处于边缘的其他类别的被剥削阶级，例如农民阶级。

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不认为中心是一种手段，他们长期与中心作斗争，朝着所有边缘的方向建立自己的革命模式和斗争策略——这一点可以用上述定义中从“a”到“e”的字母来解释。也就是说，在阶级斗争活动中，无政府主义将传统社区、农民、失业者、就业不足者、无家可归者和其他经常被专制主义者忽视的群体视为被剥削阶级的组成部分。“这样，真正[感受到]制度影响、因而[迫切需要]废除制度的人就会参与斗争”^[10]。无政府主义者从基层发起边缘社会运动，并寻求建立一个人民组织，以团结一致的方式打击现有秩序，创建一个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级不再有意义。在这场斗争中，无政府主义者利用的手段本身就蕴含着未来社会的萌芽。

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变革背后的社会力量的概念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更为广泛……与马克思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并不赋予工业化无产阶级特定的角色。在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工人和穷人、所有被压迫者、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边缘群体或地区的人，他们都是社会变革革命斗争中的潜在因素^[11]。

有了这种革命力量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肯定，“一切都表明，正是在边缘地区，在‘边缘’，革命的火焰才一直在燃烧”^[12]。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无政府主义必须与边缘地带保持长期接触，以寻求其社会变革项目。

巴西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媒介的丧失与重建

我们是一场大战的战士。

所有参战者都相互“理解”如何战斗，作出“承诺”，否则就无法统一行动。那些与他人一起“理解”这一点的人不再完全掌握自己的意志，他们只是被几条线牵制在已签署的契约上。

如果线断了，契约也就断了，如果“你误解了，停止共同战斗”，你就逃离了斗争，逃避了你的同志。

——何塞·奥蒂奇卡 (José Oiticica)

无政府主义于 19 世纪在巴西兴起，是一种破坏秩序的因素，对当时的起义（如 1848 年的普拉埃拉起义）、艺术和文化环境以及世纪末农业实验殖民地的经验都有一定的影响。塞西莉亚殖民地（1890-1894 年）是其中最著名的经历。本世纪还出现了关于罢工、工人报纸以及组织工人抵抗中心的首次尝试的报道。

我们称之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 (*social vector of anarchism*) 的出现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初，其驱动力是无政府主义在工会中的社会渗透，并在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达到顶峰。

我们称之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是指那些对无政府主义有重大影响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在其实践方面——不论其发生在哪个部门。这些作为阶级斗争成果的动员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它们是围绕着具体的要求问题组织起来的。例如，在工会中，工人为提高工资而斗争；在无家可归者运动中，他们为住房而斗争；在失业者运动中，他们为工作而斗争等等。然而，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融入社会的空间，无政府主义通过其影响力，利用直

接行动和直接民主，赋予最具战斗力和自主性的实践运动以社会变革的目标。无政府主义社会媒介中的动员是在社会运动中进行的，我们将其视为社会工作和积累的首选空间，而不是被引导的群众。

在巴西，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在 19 世纪末随着城市网络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而开始发展，随后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当然，工业的发展也使工人受到越来越多的剥削；他们在工厂里每天疲于奔命，工作条件不健康，工资很低，而且还雇用童工。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这些几乎无法忍受的剥削，出现了一些劳工组织、暴乱、罢工和起义——所有这些都变得越来越普遍。

巴西阶级斗争的激化是由 1900 年的马车夫罢工、1903 年的一系列罢工和 1904 年瓦奇纳起义所导致的起义所引发的。1903 年，里约热内卢州成立了阶级协会联合会 (*Federação das Associações de Classe*)。1906 年，在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 (*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 FORA*) 成员访问里约热内卢并与俄罗斯工人开展声援活动后，该联合会被转移到首都，并被命名为巴西地区工人联合会 (*Federação Operária Regional Brasileira - FORB*)。

到 1904 年，我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已经能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出现，“毫无疑问，是革命工团主义使无政府主义者在巴西的大型中心取得了第一个社会媒介”^[13]。1905 年，在圣保罗，鞋匠、面包师、木匠和帽匠成立了圣保罗劳工联合会 (*Federação Operária de São Paulo—FOSP*)，1906 年又成立了里约热内卢劳工联合会 (*Federação Operária do Rio de Janeiro—FORJ*)，1917 年成立了工人总工会 (*União Geral dos Trabalhadores—UGT*)，汇集了“抵抗工会[即激进的、战斗性的]”。1919 年，UGT 成为里约热内卢工人联合会 (*Federação dos Trabalhadores do Rio de Janeiro - FTRJ*)，1923 年，FORJ 重新成立。

1906 年 4 月，巴西地区劳工大会 (*Congresso Operário Regional Brasileiro*) 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该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届巴西劳工大会 (*Primeiro Congresso Operário Brasileiro*)，来自巴西多个州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大会通过了对法国革命工团主义的拥护，采纳了劳工中立、联邦主义、权力下放、反军国主义、反民族主义、直接行动和总罢工。第二次和第三次大会分别于 1913 年和 1920 年召开。1908 年，巴西劳工联合会 (*Confederação Operária Brasileira - COB*) 成立。

革命工团主义的选择是通过经济动员阵营和有趣的联邦制提案实现的，联邦制允许工会在联合会中自治，而工会（联合会）在联合会中自治。除此之外，这种模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采用也产生了国际影响。围绕短期问题动员起来的斗争手段是一种“**革命操练**”（*revolutionary gymnastics*），它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做好了准备。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在具体行动中，在团结一致中，在对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经验观察中，在冲突中，工人们将学到伟大的一课。他们说，这是获得意识形态原则的保证，而不是通过缺乏感性经验的空洞说教或手册，而是通过群众的革命实践和日常行动。^[14]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发生了一百多起罢工运动，这些运动主要与工资问题有关。在 1917 年至 1920 年期间，仅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间就发生了 200 多次示威和罢工。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工会中进行宣传，但并没有把工会局限在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工会是为工人服务的，而不是为无政府主义工人服务的——而是利用工会来宣传他们的思想。

自 1910 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社会革命的期望越来越强烈，最终导致了三次相关的动员。首先是 1917 年的大罢工，当时圣保罗的工人以无产阶级保卫委员会为中心组织起来，与饥荒作斗争，进行破坏活动，抵制克雷斯皮（Crespi）、马塔拉佐（Matarazzo）和甘巴（Gamba）工业的产品。罢工运动取得的胜利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和运动各部门赢得的工资增长。1918 年，动员活动继续进行，里约热内卢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起义。工人们占领了卡里奥卡（里约热内卢）工厂和圣克里斯托万坎波（Campo de São Cristóvão），举行罢工，起义者希望夺取政府大楼，并在市内建立里约热内卢第一个苏维埃。最后，在 1919 年，民用建筑工人工会（*União dos Operários em Construção Civil, UOCC*）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为整个行业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除此以外，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外，巴西其他州也举行了重要的动员活动：南里奥格兰德州、巴拉那州、圣卡塔琳娜州、米纳斯吉拉斯州、伯南布哥州、阿拉戈斯州、帕拉伊巴州、巴伊亚州、塞阿拉州、帕拉州和亚马孙州。

甚至还有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与工会动员一起开展，而且非常重要：受（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Francisco Ferrer y Guardia）原则启发的理性主义学校、社会中

心、工人剧院和其他举措，都是形成阶级文化的基础，是斗争时期工会的目标。

在这一斗争的关键时刻，还成立了两个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试图与工会运动合作。其中第一个是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盟 (*Aliança Anarquista do Rio de Janeiro*)，成立于 1918 年，因为需要一个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该组织在 1918 年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镇压的发生，该联盟被解散，重新回到了 1919 年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该党以自由意志为灵感。无政府主义联盟和共产党都将无政府主义中一个被称为“组织主义/组织二元论”的派别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该派别认为有必要区分行动层面——政治层面（意识形态上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层面（工会动员）。这些激进分子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与工会共同行动。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特定组织。

我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一直呈上升趋势，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无政府主义的危机与工会主义本身的危机并行发展。到了 1930 年代，无政府主义的危机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解散和这一社会媒介的丧失。对我们来说，无政府主义社会媒介的丧失是两个危机背景的结果：一个是形势的危机，另一个是无政府主义本身的危机。

1921 年《阿道夫-戈多法》(*Adolfo Gordo law*) 第三次修订案规定镇压和驱逐无政府主义者，1924 年至 1926 年期间还将激进分子驱逐到位于现阿马帕州的克利夫兰迪亚刑罚殖民地。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社会斗争也出现了低潮，1917 年俄国革命后，人们对斗争的结果感到沮丧。同样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工厂复苏，重新开始出口（包括出口到巴西），减少了城市中的工人队伍，1922 年成立的共产党开始壮大，从 1924 年开始与工会发生最激烈的争论，并与改革派结盟，提出参加选举作为政治表达的一种形式。最后，瓦加斯政府在 1930 年和 1931 年将工会与国家联系起来，并在 1932 年将其合法化，法律规定工会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并遵守国家制定的运作规则。

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综合了不同层次的活动。对许多激进分子来说，工会主义是社会的媒介，是行动的媒介，本应以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构成为目的，但最终却变成了目的本身。这种现象在无政府主义中已经引起了注意，并在 1907 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为马拉泰斯塔和莫纳特 (Monatte) 之间激烈争论的主题。莫纳特是“纯粹的工团主义”的捍卫者，他认为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非常相似，并认为“工团主义本身就足够了”^[15]。马拉泰斯塔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认为工团主义“是一个特别有利于传播革命宣传的阵

地，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与群众之间的接触点”^[16]。因此，马拉泰斯塔认为有必要开展两个层面的活动：一个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另一个是工会内部的社会活动，后者将成为嵌入的手段。

马拉泰斯塔和莫纳特的立场概括了巴西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一方面，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建立**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 (*specifically anarchist organisation*)，以寻求在工会中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将工会中的战斗性理解为他们的唯一任务，因此“忘记了组建能够支持革命实践的特定团体”^[17]。

我们对二十世纪初社会事件的立场与马拉泰斯塔一致，巴西的何塞·奥蒂奇卡 (José Oiticica) 也采取了马拉泰斯塔的立场，他当时将缺乏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视为问题所在。1923 年，他就警告说，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完全投身于工会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活动，将作为嵌入手段的工会主义与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混为一谈。对他来说，必须建立“工会之外的无政府主义联合会”^[18]，如 1918 年的联盟和 1919 年的党，尽管它们是这类团体或联合会，但不幸的是，它们不足以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

对奥蒂奇卡来说，正如我们已经部分提到过的，当时重要的是引导力量组建“封闭的”团体，由激进分子默示承担明确的行动纲领和承诺^[19]。他接着说，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力量的“集中化”不应与自由意志组织典型的“水平化”相混淆。随后，他提出了两个提高无政府主义行动效率的紧急措施：“挑选激进分子和集中力量”。最后他总结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统一行动”。^[20]

我们认为，缺乏能够为阶级斗争提供支持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当时最突出的表现是工会），也是无政府主义失去社会媒介的主要原因。由于意识形态组织没有沉淀下来，工会主义危机的背景最终延伸到了无政府主义本身。因此，社会层面的危机也注定了政治层面的危机，因为当时两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对我们来说，当时以工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层面有起有伏，有上升也有下降，这是正常的；而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恰恰是为了积累斗争的成果，有时是为了寻找其他的工作空间，其他的嵌入空间。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无政府主义组织，当社会层面——或其中的某个部分——陷入危机时，无政府主义者就无法找到另一个社会嵌入 (*social insertion*) 空间。

一旦失去了社会媒介，又没有专门组织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就不可能立即找到另一个嵌入空间……通过加入工会获得的声望很可能使他们相信，阶级社团的潜力是取之不尽的，甚至优于不断变化的环境。^[21]

因此，革命工团主义的危机也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媒介，他们开始“组织自己的文化团体并保存记忆”^[22]。

★★★

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RJ)要继承爱迪尔·佩雷斯 (*Ideal Peres*) 的战斗精神和源于其斗争历史的工作。Ideal Peres 是 Juan Perez Bouzas (或 João Peres) 的儿子，他是加利西亚移民、无政府主义者和鞋匠，从 1910 年代末开始在巴西无政府主义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是制鞋工匠联盟 (*Aliança dos Artífices em Calçados*) 和圣保罗工人联合会 (Federação Operária de São Paulo - FOSP) 的积极分子，曾多次积极参加罢工、抗议和示威活动。20 世纪 30 年代，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联盟 (*Liga Anticlerical*)，并于 1934 年果断参加了塞战役 (Battle of Sé)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在机枪扫射下击退了法西斯分子整体主义者 (Integralistas)。次年，无政府主义者还参与组建了全国解放者联盟 (*Aliança Nacional Libertadora, ANL*)，该联盟支持反法西斯斗争，打击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

Ideal Peres 出生于 1925 年，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已经丧失的危机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1946 年，他参加了里约热内卢自由意志青年团 (*Juventude Libertária do Rio de Janeiro*)、《直接行动》(*Ação Direta*) 和《火炬》(*Archote*) 期刊、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盟 (*União dos Anarquistas do Rio de Janeiro*)、巴西无政府主义大会 (*Congresso Anarquistas*) 以及巴西自由意志青年联盟 (*União da Juventude Libertária Brasileira*)。爱迪尔·佩雷斯曾参加过何塞·奥蒂奇卡教授研究中心 (*Centro de Estudos Professor José Oiticica - CEPJO*) 的相关活动，该中心开设了一系列以无

政府主义为“背景”的课程和讲座，1969 年被独裁者关闭、当时，理想被关押在前社会和政治秩序部 (*Departamento de Ordem Política e Social - DOPS*) 一个月，先是在加莱奥空军基地，后是在军事独裁政权的酷刑中心——巴劳德梅斯基塔路的宪兵营房。

20 世纪 70 年代，入狱后的爱迪尔 (Ideal) 在自己家中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其目标是吸引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的年轻，其中包括让他们与前激进分子接触，并与巴西的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联系。这个研究小组后来构成了自由意志研究会 (*Círculo de Estudos Libertários - CEL*) 的核心，由理想和他的伙伴埃斯特 · 雷德斯 (Esther Redes) 共同构想。CEL 于 1985 年至 1995 年在里约热内卢运作，在其附近（甚至在其内部）成立了其他团体，如何塞-奥蒂奇卡无政府主义团体 (*Grupo Anarquista José Oiticica - GAJO*)、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团体 (*Grupo Anarquista Ação Direta - GAAD*)、7 月 9 日无政府主义学生集体 (*Coletivo Anarquista Estudantil 9 de Julho - CAE-9*)、Mutirão 团体；此外还有《Libera. Amore Mio》(1991 年创办，至今仍在发行)、《乌托邦》杂志 (1988-1992 年) 和《Mutirão》杂志 (1991 年)。除此之外，CEL 还推动了各种活动、运动以及数十（甚至数百）场讲座和辩论。

1995 年 8 月，爱迪尔 · 佩雷斯逝世，为了纪念他，CEL 决定将其名称改为**爱迪尔 · 佩雷斯自由意志研究会** (*Círculo de Estudos Libertários Ideal Peres - CELIP*)。爱迪尔 · 佩雷斯自由意志研究会延续了爱迪尔 · 佩雷斯自由意志者研究会的工作，负责汇集里约热内卢的激进分子，并继续对其进行理论改进。此外，CELIP 还出版了《自由》(*Libera*) 一书，并通过该书与国内外的团体建立了联系。它就当时巴西和世界议程上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自由意志思考，并有助于传播巴西各团体的文章和新闻。讲座和辩论不断吸引新的激进分子，一些激进分子与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Federación Anarquista Uruguaya - FAU*) 的关系最终对 CELIP 内部正在发展的无政府主义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 1999 年里约热内卢自由意志学生全国会议 (*State Encounter of Libertarian Students of Rio de Janeiro, ENELIB*) 的共同组织者；参加了 2000 年在弗洛里亚诺波利斯举行的自由意志文化国际会议；并为圣保罗自由意志文化与行动研究所 (*Libertarian Culture and Action in São Paulo, ICAL*) 的活动做出了贡献。它还参与了石油工业工人的斗争，重新建立了无政府主义者与石油工业工会成员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 1992/1993 年，当时他们一起占领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ras) 总部大楼 (Edifício Sede da Petrobras - EDISE)，这是军事独裁统治后第一次占领“公共”建筑。2001 年，

无政府主义者和石油业工人的共同斗争再次爆发，2003 年，无政府主义者和石油业工人举行了为期十多天的集会，为被政治开除的同志争取特赦。除此之外，CELIP 还开展了一系列其他活动。

2002 年，我们发起了一个研究小组，以验证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在 2003 年 8 月 30 日成立了 FARJ。对我们来说，爱迪尔·佩雷斯的激进主义、CEL 的建立、其运作、更名为 CELIP 以及随后 FARJ 的建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当我们谈到寻求“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social vector of anarchism*)时，我们必然会提到爱迪尔·佩雷斯(Ideal Peres)发起的工作，他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与社会运动合作，以期将无政府主义从其自 20 世纪 30 年代危机以来一直受限的严格的文化领域中解放出来。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Ideal 和 Esther [Redes] 作为莱梅之友和居民协会(*Associação dos Moradores e Amigos do Leme - AMALEME*)的创始人和成员参加了一场社会运动。20 世纪 80 年代，里约热内卢出现了许多街区、贫民窟和社区协会联合会，理想参加了 AMALEME，试图影响该协会采用自我管理的做法，并与 Morro do Chapéu Mangueira 的贫困社区团结一致。1984 年，理想当选为协会副主席，1985 年当选为主席。他对社区协会的关注源于另一个协会，即劳罗·穆勒及周边地区居民协会(*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Lauro Muller and Surroundings, ALMA*)，该协会或许是第一个展现出战斗力和自我管理动力的协会，并最终影响了其他协会^[23]。

Ideal Peres 的激励和里约热内卢激进主义的发展表明了社会工作和无政府主义者融入的实际需求，这种需求在 1990 年代中期我们与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U*)接触后有所加深。通过 Libera 以及与巴西其他团体的接触，我们协助了 1996 年巴西无政府主义建设(*Brazilian Anarchist Construction, CAB*)的倡议，散发了一份题为“斗争与组织”的文件，该文件旨在支持创建组织团体，捍卫“especifista”无政府主义思想。可以说，巴西的所有无政府主义都受到了巴西无政府主义建设(*CAB*)和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U*)的影响，我们也不例外。

从那时起，社会嵌入和恢复媒介的想法就变得越来越大。巴西的历史和对无政府主义自身存在理由的战略性观察让我们越来越相信，**特定主义**(*especifismo*)是最适合我们目的

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形式。对我们来说，恢复社会媒介的道路必然要通过专门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能够区分活动的层次并参与阶级斗争。然而，与二十世纪初不同的是，当时阶级斗争的首选阵地是工会，而现在我们认为，工农主义可以是一种嵌入手段，但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手段。如前所述，今天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被剥削阶级，允许无政府主义者开展社会工作和加入其中：失业者、农民、无地者、无家可归者等。对我们来说，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组织良好，将使我们能够找到最好的路径，使无政府主义的这一社会媒介回归，无论它在哪里。

我们所有的实际反思都是为了思考一种能够恢复社会媒介的战略组织模式，因为这指向我们战胜资本主义、国家并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追求的只是斗争中的一个驿站：正如我们在成立之初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在此介绍 FARJ，不要求任何其他东西，只要求一个战斗驿站，以免正义而深邃的美好梦想夭折”^[24]。

统治与剥削的社会：资本主义与国家

一些人的财富是用另一些人的痛苦换来的。

——彼得·克鲁泡特金 (Piotr Kropotkin)

对于掌权者来说，敌人就是人民。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hon)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自中世纪晚期发展起来，并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在西欧确立。它作为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一方面是所谓的“资产阶级” (bourgeoisie) ，我们在本文中将称之为“资本家” (capitalists) ，他们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25] 他们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与工人签订合同。另一方面是被称为“无产阶级” (proletariat) 的^[26]，我们在本文中将把他们视为“工人”，他们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必须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维持自己生存的工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强调的，雇佣劳动者——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分析对象——对我们来说，今天只是被剥削阶级的一个类别。

资本家的目的是生产商品以获取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不关心社会的需要，它的唯一目的是增加企业主的利润。”^[27] 通过雇佣劳动，资本家向工人支付尽可能少的报酬，并从工人那里攫取他们劳动的全部剩余，即剩余价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为了增加利润，资本家必须拥有最低的成本，或者说花费尽可能少。他们以市场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出售商品，剩下的就是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差额——利润。为了控制成本，从而增加利润，资本家有各种办法，其中包括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支付给他们的工资。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造成了社会不平等，这是我们所处社会的一大弊端。蒲鲁

东在十九世纪研究这个问题时就已经确定了这一点：

我当时就断言，社会不平等的所有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1) 集体力量的私人占有；
2) 贸易中的不平等；3) 利润权或财富权。由于这三种侵占他人财产的方式本质上就是
财产的支配权，我否认了财产的合法性，并宣布其本质为盗窃^[28]。

对我们来说，正如蒲鲁东指出的那样，私有财产即是盗窃，因为它从雇佣劳动中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交给了资本家。这种财产“在通过高利贷剥夺工人的劳动之后，又慢慢地使他们精疲力竭而死亡”^[29]。

资本主义除了是一种制造和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外，它还建立在统治和随之而来的剥削的基础上。当一个人或一群人利用“他人（被统治者）的社会力量，进而利用他们的时间，以实现他们（统治者）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目标”^[30]时，统治就存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利用工人的劳动能力为资本家致富，因此是一种支配性和剥削性的制度，因为它“意味着有能力的权利依靠剥削外来劳动力过活，有权利剥削那些没有财产或资本、因此被迫将其生产力出售给这两者的幸运所有者的人的劳动力”^[31]。

资本和劳动力在市场上的这种关系对双方来说都不一样，因为资本家进入市场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工人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否则他们就有可能面临匮乏和没有最低生活条件的危险。这是一种“为利润而主动与为饥饿而主动之间的交锋，是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交锋”^[32]。

此外，失业还导致资本家在市场上遇到大量工人，因为工人的供应量大于需求量：

……“城市和乡村的贫民区到处都是可怜虫，他们的孩子在空盘子前哭泣。因此，工厂还没竣工，工人们就已经来找工作了。需要百人来，就有千人争”^[33]。

因此，对资本家来说，强加工作条件是合适的。对工人来说，他们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取代，不得不以最低的价格出卖自己。[...]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贫困状态，工人就会被迫以几乎为零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通过以几乎为零的价格出卖这种产品，陷入越来越大的痛苦之中”。^[34]

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资本主义结合了多种生产形式和社会阶层。农民尽管是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但仍然要服从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要求，这意味着需要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出售的基本生产要素。在竞争中，由于生产和技术方面的困难，他们与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相比处于劣势。还有一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传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工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也是被剥削阶级的一部分。

甚至有人说，资本主义不应该分为两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而是应该分为三个阶级；还有第三个阶级，称为“**管理者阶级**” (*managerial class*)，负责控制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方面，并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劳动的等级分工个人化。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这个阶级日益成为资本主义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维护的利益。如今，传统的资产阶级——企业主的身影越来越少；企业由经理人控制，企业主越来越多地是跨国集团，甚至是无人知晓的股东。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理阶层是资本集团的一部分，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统治阶级。

资本主义市场中还有其他参与者，如贸易和服务部门的工人，他们分销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或为其工作。这两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遵循着资本主义的逻辑，也在市场竞争中行事；他们往往使用雇佣劳动，维持着那些享受着资本与劳动之间这种不公正关系的成果并意图创造利润的企业主。

作为一种不间断再生产不公正的制度，资本主义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这种分离是继承的结果，也是教育的结果，因为富人和穷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因此：

……只要你为社会的不同阶层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教育，你就必然会有阶级，也就是说，少数幸运儿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而大多数人则遭受奴役和苦难^[35]。

新自由主义鼓励资本自由流动，但不鼓励人员自由流动，也不鼓励对工作条件进行比较，这使人们对整个“福利”条件提出了质疑。资本主义一直在寻求新的空间，对内和对外都在扩张，通过私有化创建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并通过广告等手段培育虚假的需求，这些都不符合社会的真实需求。“新自由主义理论，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削弱教育和卫生事业，加剧社会不平等，减少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39]

当代资本主义也是当今世界重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在利润逻辑的驱使下，私营企业负责将整个阶级等级制度转移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上。污染、森林砍伐、全球变暖、稀有物种的毁灭以及食物链的失衡只是这种关系造成的一部分后果。

随着社会统治而产生的等级制度、阶级、财产制度和政治体制，在概念上被转移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也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资源、物品和原材料，可以像种植园里的奴隶一样被无情地剥削^[40]。

巴西由于其历届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而完全融入了这一全球化的逻辑之中，因此也分担了这一资本主义新阶段所带来的全球性后果。

★★★

我们认为，国家是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集合，通过“政治、立法、司法、军事和财政机构等”而形成。^[41]；因此，国家比政府更为宽泛。国家自古代诞生以来，历经法老的埃及和罗马的军事奴隶制国家，无论现存的生产方式如何，始终是延续不平等的工具和消灭自由的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支配性制度的力量有强有弱，需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调整。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现代国家）起源于 16 世纪。

在中世纪，现代野蛮人以摧毁城市文明为目的，最终使所有那些曾经在自由主动和自由理解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人沦为奴隶。整个社会在服从地主的基础上被夷为平地，宣布教会和国家是个人之间的唯一纽带，只有这些机构才有权维护商业、工业和艺术等方面的利益。国家是通过统治手段建立起来的，代表社会说话，因为它被认为就是社会本身。

国家的特点是玩“双重游戏”，既向富人承诺保护他们不受穷人的侵害，又向穷人承诺保护他们不受富人的侵害。渐渐地，逐渐消亡的城镇、权力的牺牲品被交给了国家，而国家也发展了其作为征服者的角色，转而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寻求扩张和征服新的领土。国家对城市和城市地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16 世纪和 17 世纪期间，国家在城市地区的作用是

消灭城市的独立性，掠夺富裕的行会^[42] 的商人和艺术家，将对外贸易集中到他们手中并使之毁于一旦，夺取行会的全部内部管理权，将内部贸易以及所有物品的制造，甚至是微小的细节，都交给一帮官僚，从而扼杀了工业和艺术；控制地方民兵和整个市政管理；通过征税压榨弱者，使富人受益，用战争毁掉国家。^[43]

工业革命后出现了所谓的“社会问题”，要求国家制定援助计划，以尽量减少资本对劳动的影响。十九世纪末，作为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出现了一种更具干预性的国家概念，一方面寻求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则采取各种方法遏制当时已经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倡议的发展。

今天，国家有两个基本目标：第一，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第二，确保其合法性和控制。因此，今天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支柱。

国家扩大政治范围，充当资本主义的经济代理人，努力防止或尽量减少资本主义危机或利润率下降的影响。这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向经济的核心部门提供贷款、鼓励经济部门的发展、免除债务、改革进出口制度、对产品进行补贴、通过销售国有企业的产品获得收入等。援助计划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这些计划提高了部分人口的购买力，推动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此外，国家还制定法律，旨在保障资本家的长期积累，确保资本家对利润的渴求不会危及制度本身。

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注意到，仅靠镇压是无法维持一个体系的。多年来一直以这种方式维持的国家正在逐渐被改造，以确保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一个明确维护资本家立场的国家可能会激化阶级斗争，因此，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国家保持中立。在与统治阶级或资本主义本身的关系上，给它一个独立——甚至自主——的有机体的外表。国家始终以平息阶级斗争为目标，制定了有利于被剥削阶级的措施，因为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激进主义的机会就会减少。另一方面，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能够向国家施加有利于他们的措施，甚至牺牲资本家的利益。

与代议制民主一样，对国家而言，改善工人条件的措施始终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用来掩饰中立、独立和自治的理念。然而，这也只是一个教训，表明由于国家有义务保证这种合法性，有组织的工人往往有空间来实施对他们有利的措施。因此，有必要：

……从政府和资本家那里攫取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一切改善，使我们的斗争条件不那么困难，并增加自觉斗争的人数。因此，必须通过为未来铺平道路的方式夺取它们，而不意味着承认当前的秩序^[44]。

然而，我们应该牢记，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强大支柱，力图维持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和统治制度，那么国家除了维持其内部存在的阶级关系外，别无其他作用。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了资本家的保护伞，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工人只拥有“作为财富的武器，对国家没有任何期待；他们遇到的只是一个旨在不惜一切代价阻碍他们解放的组织”^[45]。

被剥削阶级试图改变制度的任何尝试都会遭到国家的严厉镇压。当意识形态不起作用时，镇压和控制就会随之而来。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在社会中的使用，它总是用暴力来执行法律，而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权，因此镇压和国家控制总是为了维持“秩序”。也就是说，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特权和统治阶级的统治。只要被剥削阶级稍有威胁的迹象，国家就会进行残酷镇压；其目的始终是延续以暴力为核心支柱之一的制度。

与专制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现在仍然相信的）相反，国家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有机体，它可以为资本家服务，也可以为工人服务。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写了那么多关于国家的文章，那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之间的共识——分歧在于国家。专制主义者支持夺取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将其作为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阶段——被错误地称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种形式，“其效果是直接和不可避免地巩固少数统治者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以及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奴役”^[46]。我们认为：

……任何国家，无论其形式多么民主，即使是最赤裸裸的政治共和国，仅仅在以人民代表之名行谎言之实的意义上，也无法给予这些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即自下而上地自由组织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受任何来自上层的干涉、监护或胁迫，因为每个国家，即使是最共和、最民主的国家，即使是伪人民的国家……也不过如此……从本质上说，如果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统治大众，因而也是少数特权阶层自称比人民本身更了解人民的真正利益，那就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了^[47]。

我们今天所坚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立场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把国家和资本主义一起摧毁。这是因为“谁说到国家，谁就必然说到统治，进而说到奴役；没有奴役的国家，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与国家为敌的原因”^[48]。国家自认为比人民自己更了解人民的需要，支持社会的等级管理形式，构成了其中的阶级对其他阶级（不属于国家的阶级）实施统治的手段。任何国家都以保护“公民”为借口，制造统治、剥削、暴力、战争、屠杀和酷刑的关系，并征服：

构成国家的各省市，作为自然群体，它们应享有充分和完全的自治。相反，[这些]省市不是像相关省市那样由自己治理和管理，而是由中央政权治理和管理，是被征服的人口^[49]。

与专制社会主义一样，代议制民主也认为可以通过国家进行变革。将我们参与政治的权利^[50]委托给一个进入国家以代表我们的政治家阶层，我们就等于将一个没有任何控制权的授权交给了一个为我们做决定的人：参与政治的阶层与追随政治的阶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裂。首先，我们已经可以肯定代议制民主在政治上的异化，因为它将人民与那些代表人民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议员、众议员、参议员、市长、省长等）分离开来。政治家对政治负责越多，人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就越低，他们就越疏远和远离决策。这显然会使人民沦为旁观者，而不是直接负责解决自身问题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在任何可能存在的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解放的首要条件就是消灭一切国家”^[51]。

“政治家”代表着党内外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等级和分离。政党要想当选，就必须在选票数量上占据优势，为此需要选出大量候选人。然后，政治家就被当作一种商品，在“选举市场”上出售；为了发展，政党不择手段——挪用资金、放弃纲领、与任何人结盟等等。

“政治家”不是根据民众的意愿从政，而是做出有利于政党和自身利益的决定，并越来越喜欢权力的滋味。毕竟，政治家和政党都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本身就是目的。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讨论已经受到限制——因为议会和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柱，因此不允许对其根源进行修改——甚至都没有触及，也从未成为优先事项；代议制民主是保守的，甚至限制了可能出现的微小进步。因此，我们决不能把政治交给：

这些人没有任何信念，他们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摇摆不定，可以通过承诺、立场、奉承或恐慌来施加影响——这一小撮无名小卒通过投票或拒绝投票来决定国家的一切问题。正是他们制定或搁置了法律。正是他们支持或放弃政府部门，改变政治方向^[52]。

这种对国家的批判与国家的某一种形式无关，而是与国家的所有形式有关。因此，任何指向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计划都必须以终结资本主义和国家为目标。尽管我们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支柱之一，但我们并不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国家就一定会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既不应该把自己与十九世纪的情况混为一谈，因为十九世纪的情况表明社会主义者之间在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为此，我们非常重视有关这一主题的著作——也不应该把自己与当时欧洲的情况混为一谈。我们知道巴西的国情是特殊的，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批判应用于今天的国家，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的现实是特殊的，世界经济的走向对我们生活的国家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后，有一点是肯定的：资本主义和国家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个统治和剥削社会的基础，构成了“文明世界所有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53]。因此，我们的理想仍然是“从经济剥削和国家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54]。

最终目标：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我们的心中承载着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此刻已然强韧生长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 (Buenaventura Durruti)

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反专制的社会，维护所有成员之间的自由、平等和团结。

——涅斯托尔·马赫诺 (Nestor Makhno)

但普遍革命是社会革命，是田野和城市人民同时进行的革命。

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必要组织起来——因为没有准备性的组织，最强大的因素也是无能为力和无效的。

——米哈伊尔·巴枯宁 (Mikhail Bakunin)

在对当前的统治和剥削社会进行简要分析之后，我们确认了两个我们认为是最终目标的目标：**社会革命**^[55]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的目标是摧毁剥削和统治性的社会。**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Libertarian socialism)** 赋予社会革命以建设性的意义。作为否定概念的“**摧毁**”和作为命题概念的“**建设**”共同构成了我们提出的可能的、有效的社会变革。“没有深刻而充满激情的破坏，没有创造性和富有成效的破坏，就没有革命，因为只有通过破坏，才能创造和诞生新的世界”。^[56]然而，仅有破坏是不够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在不对事物的秩序至少有一个或真或假的遥远想法的情况下想要进行破坏，而在他们看来，这种秩序应该取代目前存在的秩序”^[57]。

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可能结果之一，包括暴力改变既定的社会秩序，被我们视为结束

统治和剥削的唯一途径。它不同于雅各宾派和列宁主义者的政治革命，因为它不仅支持通过政治变革来改变“秩序”，而且支持通过国家来改变“秩序”，用一个指挥少数人的国家来交换另一个指挥少数人的国家。正如我们之前所强调的，对我们来说，国家并不是解放被剥削阶级的手段，也不应该由一个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的所谓先锋队通过革命手段从资本家手中夺走。像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大革命这样的政治革命，如果不是为了在国家内部产生平等而终结国家，就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其结局“必然是新的剥削，也许更明智、更虚伪，但并没有减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58]。

与政治革命不同，社会革命是由城乡人民通过*人民组织* (*popular organisation*) 的方式将阶级斗争及其与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力量关联发挥到极致而完成的。当人民组织的核心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大于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力量，并付诸实践，植入支持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的结构，消灭私有制和国家，建立一个完全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时，社会革命就发生了。正如巴枯宁反复强调的那样，社会革命将带来人民解放：

社会革命必须结束的正是这种旧的武力组织制度，把完全的自由还给群众、公社、社团和个人本身，一劳永逸地摧毁一切暴力、统治和国家存在的历史根源……[社会革命就是]废除一切剥削和政治压迫，无论是司法的还是行政的和政府的，包括通过在经济上平分所有财富来废除所有阶级……^[59]

社会革命并不是人民自发起义、建立新社会的“壮丽之夜”。不可否认，阶级斗争会产生一系列起义甚至暴动，这些自发事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事先没有进行紧张而艰苦的组织工作，这些事件就会过去，有时被剥削阶级会从中获益，但却无法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也无法建立新社会。人民组织的建设将培养被剥削阶级的斗争精神和组织能力，寻求社会力量的积累，并在其中纳入与我们希望建立的社会相一致的斗争手段。因此，**我们不把社会革命理解为简单的演变，也不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是标志着断裂的插曲，是有组织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决定的。**

我们强调，在这一革命进程中，使用暴力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不推行暴力，就能实现对资本家的没收，甚至摧毁国家。事实上，我们所处的制度已是一个以暴力为基础来维持的制度，而在革命时期，这种制度的恶化只会使革命者有理由使用暴力，主要是

作为对过去和现在所遭受的暴力的回应。“只有在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暴力侵害而必须使用暴力时，暴力才是正当的”。^[60] 统治阶级不会接受在实现社会革命的时刻强加给它的变革。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尽管我们既不是暴力的倡导者，也不是暴力的爱好者，但为了打击整个统治和剥削体系，我们必须使用暴力。

由于革命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暴力行动，它往往发展而不是摧毁暴力精神。但是，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革命是最不暴力的革命；它力图一旦不再需要通过武力来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时，就停止一切暴力。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暴力因素完全消失的社会，这一理想的作用是制止、纠正和摧毁革命作为一种物质行为所倾向于发展的暴力精神。^[61]

社会革命的暴力行动必须在没收资本家的同时立即摧毁国家，让位于在人民组织中经过考验的自我管理和联邦结构。因此，将“社会主义”作为在国家内部建立专政的过渡时期的专制概念，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继续剥削人民的另一种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予以坚决反对。

由于社会革命决不能只由无政府主义者来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参与到阶级斗争的进程中，以便能够将革命导向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专制主义者就会为了占领国家而摧毁解放经验，终结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的可能性，并建立比以前更专制的政权。因此，革命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为革命指明方向，他们就会致力于建立另一种统治和剥削制度。在阶级斗争中，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的文化应该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样人民在革命的时刻才不会被专制的机会主义者压迫；这将通过以阶级为基础的自治、战斗、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的实践来实现。这些价值观在人民组织中存在得越多，就越不可能形成新的暴政。

尽管我们完全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专政的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后会有一个适应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时刻。这可能仍然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期，因此必须依靠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只有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后期，即反革命的威胁已经过去、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全面运作之时，才会与社会组织合并。

当我们论述我们的社会革命构想时，甚至当我们思考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时，我们要明

确指出，我们并不试图事先绝对地确定革命进程甚至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将如何发生。我们知道，这种转变何时发生是无法预测的，因此，任何思考都必须始终从可能性、参考性而非绝对确定性的角度来考虑对未来可能性的战略预测这一方面。革命进程的特点取决于它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因此，这里对社会革命，特别是对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明确思考，不应被理解为公式化或预测一定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工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所带来的可能性有关。然而，一方面，我们不想过于自信，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对未来社会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可能的运作方式的讨论是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实际的革命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对我们来说，倡导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拟议的未来社会，意味着在政治项目中将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建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自由。对我们来说，“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就是奴役和暴政”^[62]，这种制度会堕落为专制政权，这一点我们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深有体会。同时，“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特权和不公正”^[63]，是在阶级和专制等级社会中继续统治和剥削的一种方式。因此，对我们来说，促进平等和自由的未来社会纲领只能是在自我管理和联邦制实践中形成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尽管自我管理和联邦制这两个词出现的时间不同[64]，但它们在今天却有着必然的联系，应被理解为相辅相成的概念。自我管理是一种管理形式，是一种组织模式，其中的决策由工人自己做出，无论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还是在他们生活的社区，他们都会受到决策的影响。联邦制是一种将自我管理结构联系起来的方法，使大规模决策成为可能。当代对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的解释是，前者是经济制度，后者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谈到自我管理和联邦制时，我们并不这样理解经济和政治的分离。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异化和结束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对我们来说，当今对工作的批判，包括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工作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内部工作的批判，而不是对工作本身的批判。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自由劳动(free labour)应成为工人的解放手段，他们通过自我管理，将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攫取的财富重新归还给自己。因此，劳动的社会化、劳动产品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劳动形式的社会化、劳动节奏的社会化，将有助于建立一种劳动模式，即“人在社会中的智慧行动，以个人满足为先入为主的目的”^[65]。在新社会中，所有有能力的人都需要工作，不再存在失业问题。

题，人们可以根据个人能力和性格从事工作。人们将不再因面临匮乏和无法达到最低生活条件的威胁而不得不接受任何东西。儿童、老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将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的所有需求都将得到满足。对于最乏味的工作或那些被认为不愉快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轮换或交替进行。即使是在需要一些专业人员协调的生产活动中，也有必要进行职能轮换，并致力于培训其他具有类似技能的工人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再可能因为拥有一种或多种生产资料而拥有权力或获得更高的报酬。这是因为私有财产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1) 没有人实际上是所有者，生产资料属于整个集体；和 2) 集体的所有成员都是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比例与其他人完全相同。“生产资料是人类的集体劳动成果，它们必须回到人类的集体中去。”^[66] 在集体所有制中，权利、责任、工资和财富不再与私有财产发生关系，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旧的阶级关系也必须消失。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统治阶级将不复存在，整个不平等、统治和剥削制度将不复存在。

在城市中，有不同类型的工人。首先是那些使用简单工具从事活动的工人，他们几乎没有分工，往往只需一个工人就能完成生产。对这类工人来说，集体劳动不是必需的，但却是可取的，因为集体劳动可以节省时间和劳动力，还可以帮助工人利用他人的技能提高自己。另外，还有一些工人在小公司或小工厂里使用相对简单的工具和机器进行集体劳动。最后，第三类是大公司和大工业的工人，这些公司和工业的分工非常细致，以高科技和大量资本投资进行大规模生产。对于后两类工人来说，由于工作本身的性质，集体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所有的技术、机器和工具都必须是集体的。因此：

因此，每个车间、每家工厂都将组织成一个工人协会，只要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平等和公正的原则得到落实，他们就可以自由地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一个行业需要复杂的设备和集体劳动，所有权也应是集体的。^[67]

在农村，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在大块土地上工作，这些土地必须像大公司和工厂一样集体化；另一种是农民更愿意拥有自己的土地，自己耕种。在这种混合经济中：

……革命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耕者有其田，农民不再为剥削者的利益而工作，剥削者也不再以他们的痛苦为生。有了这一伟大胜利，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如果农民愿意，他们可以将土地分割成单个地块，每个家庭分得一部分。或者，他们也可以实行土地公有制和合作耕种。^[68]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国家所有制是集体制（collective）。对我们来说，**集体制**（*collective ownership*）是由人民自我管理的，而不是由国家管理的，当国家集中所有权时——例如在苏联——国家只不过成为了一个继续剥削工人的国家雇主。但是，对于农民的个人财产，即那些自己耕种土地的人的个人财产的持续存在，更恰当的理解是，这种情况不是财产，而是占有。因此，财产始终是集体的，而占有则是个人的。占有是因为土地的价值在于使用，而不是交易。与土地的关系将以生产者的需求为导向，而不再是市场的需求。这种情况改变了一切，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类别。

在通往平等的道路上，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应与私有制的终结相辅相成，那就是终结继承权，目的是防止任何形式的积累对人生早期的起点产生影响。因此，真正的平等是一个目标，因为：

只要继承权存在，就会有世袭的经济不平等；不是个人的自然不平等，而是人为的阶级不平等，而这将始终必然转化为发展和知识分子文化的世袭不平等，并将继续成为所有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源泉。^[69]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经济是由工人和消费者共同完成的。工人创造社会产品，消费者享受社会产品。在这两种以分配为中介的职能中，人民负责经济和政治生活，决定生产什么，消费者消费什么。工人和消费者组织起来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地方机构是工人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

委员会（*Councils*）是社会机构，是人民表达其政治和经济偏好、实行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的工具。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在委员会中决定和实施。

每个工作场所都可以由一个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来管理，在这个委员会中，

所有工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责任，并平等地决定其管理，因为这里没有等级之分。必要时，可以按员工、团队、小部门或大部门、工作地点或行业成立更小的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中，工人和其他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员可以做出所有决定。

消费者可以组织起来，成立社区内的消费者委员会。这样，个人被组织成家庭，家庭被组织成街区委员会，然后是邻里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将负责向生产者指出他们希望消费什么，因为我们认为，必须由需求来指导生产，而不是相反。

工人委员会组织生产，消费者委员会组织消费。显然，这一解释旨在对未来自我管理社会可能面临的现实和问题起到指导作用；但是，一旦进入这一新的环境，消费者也将是工人本身，因此，委员会的任务将更容易完成，因为利润不再是生产关系中的核心。

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委员会可能仍未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因此应尽快消除这种分离。有人认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很重要，因此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激励，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许多工作，主要是那些涉及体力劳动的工作，是完全不愉快的、艰苦的和异化的，一些工人完全忙于这些工作，而另一些工人则致力于从事愉快的、令人愉悦的、刺激性的和智力方面的工作，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阶级制度肯定会重建，不再以私有制为基础，而是以指挥的知识分子阶级和执行命令的体力劳动者阶级为基础。

为了结束这种分离，工人委员会可以为每个工人制定一套均衡的任务，这套任务对所有人都是等同的。这样，每个工人都将负责一些令人愉快和振奋的任务，包括脑力劳动，以及其他更艰苦和更异化的任务，包括体力劳动。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做所有的事情，而是每个人都在做一系列的工作，这些工作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程度是相同的。例如，在实践中，学校里的一名工人在部分时间里既是教师，又是清洁工。或者一个人部分时间从事工业研究，其余时间帮助从事生产的体力劳动。另一个人则可能一直从事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的工作。

很明显，这个方案是简化过的，但其理念是，每个委员会的所有工人都按照用于执行任务的时间和这些任务的程度（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比例，从事相同程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重要的是，各委员会之间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水平也要相同，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工人就能均衡地完成与另一个委员会相似的任务。如果某个委员会最终只有体力劳动，那么工人就必须在一个以上的委员会工作。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委员会之间，我们都应该在每个工人所从事的工作中寻求同等水平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些工作可能有一项、两项或多项其他任务。这显然意味着生产率的下降，但我们稍后会看到未来社会的其他要素将如何弥补这一点。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消除劳动分工，而是要确保人们承担一系列合理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经过适当培训的……每个人都有一系列任务，这些任务共同构成了他们的工作，因此，平均而言，整套任务的全部影响就像所有其他工作的影响一样……每个工人都有一份工作。每项工作都有许多任务。任务与工人相适应，反之亦然。

[70]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报酬的目标是遵循“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然而，我们知道，要落实这一原则，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就必须充分发挥作用，实现丰产。在此之前，可以根据劳动或努力来获取报酬——这可以理解为为了集体利益而做出的个人牺牲。按劳取酬或按付出劳动取酬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报酬，并可以选择如何使用这些报酬。有些人倾向于获得一两件东西，有些人则倾向于投资于休闲、自由时间、压力较小的工作等。这种模式更接近于十九世纪在国际工人协会工作的联邦主义者所倡导的古典集体主义。

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一个集体主义运作的案例，使用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格言，在有可能适用共产主义原则的时候，则是“各取所需”。事实上，这“已成为次要问题，因为财产问题已经解决，不再有资本家占有群众的劳动”^[71]。

市场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自我管理的计划系统** (*self-managed planning system*)，定价由工人和消费者委员会以及促进这种互动的联合会和协会共同完成。这种计划模式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计划经济的专制形式。它将使工人和消费者自己能够完全决定分配，从而消除竞争问题。

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切，技术的作用至关重要。有些自由意志倾向认为，技术本身就蕴含着统治的萌芽，与此不同，我们认为，没有技术，就不可能发展自由意志社会主义。随着技术的出现，而且技术的使用有利于劳动而不是资本，生产率肯定会提高，从而大大减少人们的劳动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从事其他活动。这些技术也可以被视为“科学在生产中的奇妙应用……其使命是解放工人，减轻人类劳动[并构成]文明人理应感到自豪的进步”

^[72]。显然，我们知道技术有好有坏，因此，社会：

因此，社会不需要大规模拒绝先进技术，而是要转变它们，真正需要进一步发展[符合]生态原则的技术，这将有助于社会与自然界的新和谐。^[73]

未来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应考虑使用符合环境的技术，满足社会生态学 (social ecology) 的要求。

捍卫这种生态意识并不意味着人类将受制于自然法则体系，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不应受制于自然。显然，我们也不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支配关系应该继续下去。相反，它必须尽快停止，让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

生态意识应从革命决裂之前的斗争时期以及未来社会本身发展起来，并以克鲁泡特金提出的互助关系理论为基础。正如 Reclus 所说，这种发展的前提是“我们人类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自然会意识到自身的存在’”。

人类有别于其他自然元素和其他物种，他们与周围的一切建立了社会关系，因为他们有能力思考自己，有能力对现实提出理论，并凭借这些能力成功地极大地改变了周围的环境。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资本家开采自然资源的方式使自然资源无法以自然速度再生。在未来社会中，这种情况将不复存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带来的人类发展应强调物种与自然之间互助关系的重要性。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的生态方案与“保护主义”和“原始主义”截然不同。与前者不同，因为这意味着维持阶级社会和自然的完全商品化。与后者不同，是因为我们认为“反文明”建议是完全荒谬的，它寻求的是一种浪漫的回归，回到遥远的过去，或者更糟糕的是，是一种全人类的自杀，是对我们为维护和造福自然所做贡献的否定。

我们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和国家让位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时，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完全尊重社会生态学原则的社会。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自由意志社会主义重新协调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生态社会，那么除了由此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之外，我们的道德合法性也将受到威胁”^[74]。

随着有利于工人的技术的使用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束和劳动成果完全归工人

所有；随着充分就业的实现，工人将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由于平衡的工作任务会使劳动“非专业化”一些，自然会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其次是政治决策，这需要时间进行讨论和审议，而这必须在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和社区中进行。最后，剩下的时间——我们认为，随着这些变化，休息时间将比现在多得多——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做什么：休息、休闲、教育、文化等。

自我管理下的决策不必遵循特定的模式。工人和消费者委员会可以选择直接民主的最佳应用方式，横向讨论和审议是基础，明确阐述观点并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显然，大多数决策都不应采用协商一致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效率很低，尤其是在考虑大规模决策时，而且会给孤立的行为者带来很大的权力，他们可能会阻碍达成协商一致，或者对他们只是少数人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问题可以在适当的辩论之后通过投票决定，至于谁获得 50%+1 的选票，谁获得 2/3 的选票，等等，则是可变的。我们必须牢记，决策过程本身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我们还必须关注这一过程的敏捷性。

在决策过程中，自我管理和联邦制意味着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集体决策、必须授权的授权、职能的轮换和可召回性、信息的获取和平等的决策权。工人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都将把自我管理作为工作场所和社区的一种管理和决策形式。联邦制将把劳工和社区联系在一起，允许在大范围内做出决策。“联邦”源自拉丁文 *foedus*，属词 *foederis*，意为契约、合同、条约、公约、联盟^[75]，在联邦中，组织起来的人“为了一个或多个特定目标而彼此平等地联系在一起，其责任由联邦代表专门承担”^[76]。

联邦制内部的联系允许从最小的自我管理到最广泛的大规模决策。在工作环境中，联邦制将单位、小部门、大部门、工作场所甚至整个产业联系起来。在社区，联邦制将家庭、邻居、街区、邻里、城市、地区甚至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将由代表们来完成，他们将阐明和讨论委员会审议的立场。代表们的任务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他们代表的是委员会的集体立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立场，就像代议制民主一样。此外，代表的授权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随时撤销。由于“联邦制是等级制或行政和政府集权制的对立面”^[77]，我们认为联邦制将取代国家，并与自我管理的委员会一起，成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委员会作为自愿协会、

将在更大程度上取代国家及其所有职能。它们将是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由无穷无尽

的各种团体和各种规模和级别的联合会组成，有地方性的、地区的、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有临时性的，也有几乎永久性的，其目的无所不包：生产、消费和交换、通信、卫生、教育、相互保护、地区防卫等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一些日益增长的科学、艺术、文学和社会需求。^[78]

这样，国家和代议制民主就会消失，而自我管理和联邦制将取而代之；政治将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即人民中间的位置，不再有搞政治的和不搞政治的之分——因为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实现日常政治的将是社会成员本身。

意识应该与斗争的发展同步，并尽可能通过教育过程来激发。除了不相信为了革命必须对所有人进行教育之外，我们还认识到，在社会革命的时刻，人民的意识水平越高越好。社会应该越来越多地朝着自由意志的方向发展其文化，而这不仅应该发生在社会革命之时和革命之后，还应该发生在斗争、人民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之时。不可否认的是，意识形态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引入大众想象的文化，必须一点一点地消除，而这将通过长期的大众教育过程来实现。种族和性别偏见、父权制、个人主义等立场必须在斗争过程中、社会革命时刻甚至革命之后尽可能地予以打击。根据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自我管理和联邦制必须在实践中为这一进程做出贡献。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在全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活动中投入大量资金，鼓励“教学（应该）在所有方面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必须是整体的”^[79]，为男女儿童和成年人提供理论和实践知识。

因此，我们相信，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制度将被终结——再也不会有人靠剥削他人获得的社会力量来积累权力——新制度将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平等与自由为支柱。这种平等将通过建立集体所有制、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平衡的任务组合、同工同酬、自我管理的计划、集体决策以及与偏见和歧视的持续斗争来实现。自由既与统治和剥削制度有关，也与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有关。自由是集体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取决于其他人的自由；“自由包括充分发展每个人潜在的物质、智力和道德潜能”^[80]。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将带来一种被所有人忽视的丰裕：“人性之丰裕，使万民得其自由与安乐”^[81]。

组织和社会力量

……十个、二十个或三十个人，只要理解力强，组织有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就能轻松地扛起一百个、两百个甚至更多的人。

——米哈伊尔·巴枯宁 (Mikhail Bakunin)

在此之前，我们讨论了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组织，试图描绘出“我们在哪里”；以及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组织，试图明确“我们想要到达哪里”。为了完成关于组织的讨论，有必要对社会运动和以及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进行一些扩展；这两个不同层面的行动将寻求回答[问题]：“何从此岸达彼岸”，完成我们永久战略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如马拉泰斯塔的精神概括：“……组织作为当今和未来社会生活的原则和条件；无政府党的组织和人民权力的组织”^[82]。

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实现的社会变革必然要通过人民组织的建设，通过逐步增强其社会力量，直到有可能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并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那一刻。此外，我们还认为，人民组织必须与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同步发展，后者应影响人民组织，并赋予其所需的特征。今后，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其中的每一个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假定，如果没有组织和社会力量的逐步发展，就无法思考这一必要的转变。

我们将当今社会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果，甚至是以阶级斗争为形式的长期冲突的结果；前者得到加强，即设法拥有比后者更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建立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和国家对其他政治力量施加压迫，这些政治力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抵抗。

这种抵抗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有的构成或大或小的政治力量，有的则不构成政治力量。“抵抗可以是被动的（当行为者对压制他们的权力没有任何行动时），也可以是主动的（当

权力遭到被压制者的报复时);可以是孤立的(具有个人特征),也可以是明确的(集体力量)”。

[⁸³]. 被动的抵抗并不构成政治力量, 孤立的抵抗也没有什么社会力量。因此,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主张积极的、有组织的抵抗, 在组织上寻求社会力量的永久增长。为了构建这种抵抗, 有必要与那些与我们的社会变革提议相一致的人结盟。

如果我们想向前迈进, 如果我们想做一些比我们每个人永远孤立无援的事情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可以与哪些同志意见一致, 与哪些同志意见相左。当我们谈到行动、运动和方法时, 这一点尤为必要。

我们今天所说的“秩序”或现状就是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组织, 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考虑其他政治力量的威胁。组织涣散、组织不力或孤立无援意味着无法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构成足够的抵抗, 因此也就无法显著增强组织的社会力量, 而组织的目标必须是以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和国家。我们可以说, “谁不把自己组织起来, 谁不寻求他人的合作, 谁不在互惠和团结的条件下提供他人的合作, 谁就必然会使自己处于劣势地位, 并在他人按其方式运作并对其有利的社会机制中成为一个无意识的齿轮”^[85]。事实上, 无组织、组织不力和孤立最终会支持资本主义和国家——因为它们不允许构建必要的社会力量。如果不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力量关系或长期冲突, 就会导致“秩序”的再生产。因此, “如果我们不寻求明确的组织和联合, 我们最终将无法在斗争中发挥任何影响力, 从而也无法在当今社会中发挥任何影响力”^[86]。因此,

那些没有办法或没有足够发达的意识与那些有共同利益和情感的人自由地组织起来的人, 就会遭受由其他个人建立起来的组织的压迫, 这些个人一般都组成了统治阶级或集团, 以便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削他人的劳动。少数特权阶层对大众的压迫由来已久, 其原因就在于大多数人无法与其他工人达成一致并组织起来, 共同生产、享受并最终抵御那些想要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孤立无援, 独自行动或想独自行动, 不与他人相互理解, 不做好准备, 不把个人的微弱力量团结成一个强大的团体, 那就意味着注定自己无能为力, 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没有效率的小行动上, 很快就会失去对目标的信心, 陷入完全的无所作为^[87]。

在社会层面——社会运动的层面，人们应该建立和发展群众组织——难以积累社会力量，导致这一层面的自在自发性无法实现一系列预期的社会变革。在政治层面——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层面，我们应该发展**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 (*specific anarchist organisation*)，但却很难影响社会层面，使其拥有足够的方式方法。孤立和个人主义导致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无法以理想的方式存在，既无法衔接人民组织，也无法衔接无政府主义组织。除了组织涣散之外，组织不力和孤立也是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阻碍因素，因为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大量的组织工作才能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组织是指各种力量的协调，或者说是“与一个共同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方式方法的结合”^[88]。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人民组织的方式方法，使其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并通过社会革命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这是人民组织的目标。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为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寻找途径和方法，使其能够建立人民组织并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具有理想的性质，并通过社会革命实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其目标。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两个层面的组织。首先，我们将讨论社会层面，社会运动在这一层面开展，我们必须在这一层面建立群众组织。然后是政治层面和特定/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发展。

当我们谈到社会力量时，重要的是要明确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我们认为，每个人作为社会主体，都会自然而然地拥有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用来实现其目标的能量。这种力量因人而异，甚至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也会有所不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个人经常会利用一些工具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力。许多东西都可以用来增强社会力量，例如：武器、信息、培训、适当的技术、资源优化、说服、机器等。然而，最重要的手段是组织；组织可以是专制的，通过统治的方式，也可以是自由意志的，通过自由联合的方式。

在专制组织中，不同主体的社会力量（例如在拥有军队的国家中，或在拥有领薪劳工的公司中）被异化，使他们处于相对于组织（在这些情况下是国家和老板）的支配地位，并使他们为不同于自身目标的异己目标做出贡献。这正是当前制度的社会力量的构成方式，即通过异化不同的代理人，使他们为资本主义的目标做出贡献，而这些目标与他们的目标并不相同。在自由意志组织中，是自由联合或反专制组织产生了社会力量的增长——它总是与其他工具联系在一起。

采取自由联合形式的组织对于我们的社会变革计划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当个人共同努力

时，他们的社会力量就不仅仅是个人力量的总和，而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我们来看蒲鲁东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两百名工人在几个小时内就把卢克索的方尖碑竖立在基座上；你认为一个人可以在两百天内完成同样的任务吗？”^[89]当然不是，因为“工人们的联合与和谐、他们的努力的汇聚与一致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90]。在上面的例子中，工人的组织给了他们一种集体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取得比个人成果的简单总和更大的成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想实施我们的社会革命纲领，自由合意是根本，因为只有通过自由合意，我们才能积累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所需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这种反专制的组织形式中，无论是在群众组织层面还是在无政府主义组织层面，社会力量都必须获得必要的永久性增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每当许多人自由联合起来从事一项集体工作或行动时，都必须有一定的纪律，这种纪律不是自动的，而是自愿的，是反映出来的，完全符合个人的自由。这种纪律不外乎是所有个人为了共同目的而自愿达成的一致意见。在行动的那一刻，在斗争的过程中，角色会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自然分工，由整个集体来评价和判断：有些人指挥和命令，有些人执行命令。但是，任何职能都不是僵化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更不是与某个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等级和晋升是不存在的，昨天的指挥官可能是今天的下属。没有人可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或者说，即使他们被提升了，也只是在下一秒就会像大海中的波浪一样跌落，永远回归到健康的平等水平^[91]。

显然，这种纪律不能“沿袭专制模式，无论是在压迫成员……方面，还是在……收费方面，都应考虑到尊重和道德……我们非常关注如何将我们在这里提倡的自律与军事纪律区分开来，军事纪律本质上是剥削和压迫，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与我们所熟知的其他专制主义并无不同”^[92]。为了将专制主义者所宣扬的纪律与我们所倡导的纪律区分开来，我们选择使用自律一词，并申明“自律是自我管理组织的动力”^[93]；对我们来说，自律与承诺和责任一道，是建设旨在增强社会力量的反专制组织所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这种自律在人民组织中较少，而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则较多，因环境而异。在社会动荡较大的时期，对这种自律的需求会增加。在低谷时期，自律的必要性则会降低。

对我们来说，正如我们所强调的，人民组织作为一种积极而明确的反抗形式，其目标是

逐步增强其社会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并通过社会革命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力量的增长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最主要的是被剥削阶级的组织，尽可能多的人和良好的组织水平——这必然意味着自律、承诺和责任。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那样，无政府主义特定组织的目标是“建立群众组织并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具有理想的性质，并通过社会革命实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为此，专门/特定组织必须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积极的无政府主义少数派组织，具有高度的自律性、奉献精神和责任感。从这个角度来看，“组织不仅不会产生权威，反而是对抗权威的唯一良方，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于积极、自觉地参与集体工作的唯一途径”^[94]。

社会运动与人民组织

只有苦难者才能消灭苦难。

——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 (Ricardo Flores Magón)

组织人民的力量以实现[社会]革命，是那些真诚渴望自由的人的唯一目的。

——米哈伊尔·巴枯宁 (Mikhail Bakunin)

支持各种人民组织是我们基本思想的必然结果，因此，应成为我们纲领的组成部分。

——艾力格·马拉泰斯塔 (Errico Malatesta)

社会运动的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通过社会革命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我们将其理解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真正主角。我们还提到，社会运动发展的层面，以及我们必须寻求建立和增强人民组织 (*popular organisation*) 的社会力量的层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层面。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讨论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预期特征和行动方法，以及社会运动如何促进人民组织的发展建设。

在讨论这一社会层面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人民的可能性，他们必须是我们提出的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不可否认，在被剥削阶级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但我们知道，只有通过组织，这种力量才能脱离可能性的阵营，成为真正的社会力量。那么，问题就来了：

诚然，[人民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基本力量，这种力量毫无疑问优于[政府的]力量，也优于统治阶级的[力量]总和；但没有组织，基本力量就不是真正的力量。有组织的

力量相对于人民的基本力量的这种无可争辩的优势，正是国家力量的基础。因此，问题不在于他们（人民）是否能够站起来，而在于他们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组织，使他们有办法取得胜利——不是偶然的胜利，而是长期的、最终的胜利。^[95]

从组织起来并将其实际应用于实践开始，这股力量成倍增长，为打击资本主义和国家提供了真正的机会。这是因为“我们拥有正义和权利，但我们的力量仍然不够”^[96]。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有被剥削阶级组织的社会力量不断增强，才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社会变革。

为了建立一个能让我们达到预期目的——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巩固胜利的组织，我们主张建立和发展一种我们称之为人民组织 (*popular organisation*) 的模式。

首先，我们认为组织符合我们之前的定义，即“各种力量的协调或‘具有共同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方式方法的联合’”。我们也已经说过，组织能使人民的社会力量倍增，只有通过组织，我们才能提供一个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反对派。我们主张的这种组织模式是被剥削阶级成员自由联合的成果。

通过联合，他们（工人们）自我教育，相互分享，并通过自己的努力结束这种致命的无知，而这种无知正是他们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联合，他们学会了自救、自知、互助，并最终创造出比所有资产阶级资本家和所有政治势力加在一起还要强大的力量。^[97]

其次，我们证明这种组织是大众性的，使其具有阶级斗争的特点。换句话说，在这种组织模式中，必须动员整个被剥削阶级。因此，让所有受资本主义影响最严重的阶层参与进来是当务之急。当组织具有阶级性时，就会激发和增强阶级斗争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人民组织是自下而上、从“边缘到中心”、在现行制度的权力中心之外建立起来的。

人民组织是通过人民斗争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不是自发运动的成果，尽管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的许多表现形式都是自发产生的。它之所以必要，还因为我们不相信——与十九世纪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会走向自己的终结，或者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然演变的结果。在我们看来非常清楚的是，我们必须将组织模式视为斗争的工具，否则资本主义和国家就不会不复存在。

我们认为，人民组织是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基层运动汇聚的结果，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支持各种类型的组织和运动，将这种支持理解为我们最基本思想的结果。这些组织和运动在过去被称为“群众运动”，但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最终赋予了“群众”一词“群众的棋子”的含义，是一种没有结果的运动，应该由一个垂直化的党组织中的先锋队来指挥和引导。也就是说，专制主义者从等级制度的角度来对待群众运动，试图统治群众运动。

我们认为，社会和民众参与社会变革进程至关重要。群众运动可以称为社会组织、民众运动，也可以称为社会运动——我们今后将使用这一术语。

社会运动是在捍卫或促进社会既定目标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和/或实体的联合体。这些运动可以发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也可以打着各种不同的旗帜，展示运动周围的人们的需要和共同的事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今社会为社会中最大的一部分人提供了痛苦和匮乏的处境，而这往往成为一种联合因素，使捍卫人民利益的组织得以存在。

通过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成立的组织，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压迫环境，并从与老板[或统治阶级]的对立中开始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习惯于集体斗争和团结，并能够赢得与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存在相适应的改善。^[98]

社会运动是由必要性、意愿和组织构成的三要素的结果。这三要素促使世界各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巴西也不例外。这里有无地者、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社区运动，也

有争取负担得起的优质交通的运动。还有可回收垃圾收集者运动、原住民运动、学生运动、人权运动、劳工运动、女权运动、黑人运动、同性恋运动、人民委员会运动、艺术运动、文化运动、环保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它们产生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统治和剥削；其中许多运动是阶级斗争的成果。

然而，寻求建立人民组织，甚至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社会运动并不多。它们中的许多都充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和价值观，而且还经常宣传这些特征和价值观。这些运动中的大多数，我们可以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它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这些运动中的大部分运动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获得短期利益，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运动之间没有适当的衔接，各自开展自己的斗争，相互之间没有衔接。因此，它们甚至没有指向人民组织建设的起点。这表明，虽然有许多社会运动，但事实上，它们的特点和行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我们认为的适当方式。所选择的手段并不能达到我们所倡导的目的。

我们所捍卫的、我们认为有助于我们的政治项目的社会运动，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和行事方式。

它们是最强大的，有良好的组织，有最多的人专注于他们决定优先开展的斗争。因此，无地者运动应该包括所有愿意为土地而斗争的人，无家可归者运动必须包括所有愿意为住房而斗争的人，等等。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运动不应该把自己束缚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不相信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运动，也不相信任何其他特定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因此，来自各种意识形态的人们必须“适应”我们准备创建或发展的社会运动。对我们来说，无政府主义社会运动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只会分裂被剥削阶级，甚至是那些有兴趣为某一特定事业而奋斗的人。也就是说，推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力量必须是必然性，而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任何哲学或政治理论都不得作为基本依据和正式条件出现在纲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也不应自由讨论所有政治和哲学问题……”。^[99]

虽然我们认为社会运动不应[被]纳入无政府主义，但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必须尽可能在社会运动中传播。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目标是什么。现在，我们只想说，我们所倡导的社会运动不是也不应该是无政府主义的，而是无政府主义的沃土。

我们对宗教问题的看法也是如此。虽然在政治层面，我们持反宗教立场，但我们认为，在社会层面，我们不应坚持这一问题，阻止有宗教信仰的被剥削阶级成员进行斗争。被剥削阶级中的许多人都有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在运动中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妨碍这些人的斗争。社会运动中有许多进步的宗教团体，它们是左翼广泛阵营的一部分，有可能与之合作。社会运动“必须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一系列简单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上，所有工人，无论[他们的政治和宗教选择]是什么，至少是严肃的工人，即遭受严重剥削和痛苦的人，都是而且必须是一致的”^[100]。

社会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自治，这主要是相对于国家、政党、官僚工会、教会等而言的。社会运动必须自主决策和行动，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受对其实行或试图实行统治的组织的影响。因此，那些想要领导、命令或促使社会运动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人，不应对社会运动施加影响，因为他们不是为社会运动的集体利益而奋斗，而是奉行“**为自己服务是为他人服务的最佳方式**”(*use the maxim that serving yourself is the best way to serve others*)的格言。

社会运动不应与政治家或国家的任何部门挂钩，因为我们知道，当他们来寻求帮助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党派政治利益寻找一个“基底”，或寻求平息运动，建立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对话。我们清楚地了解政党的专制理念，知道他们的利益始终是利用社会运动，无论是改良主义政党还是革命政党。首先，他们参与选举，将社会运动视为选票来源。其次，他们寻求“群众运动”，以此作为他们希望成为的先锋队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希望领导和指导社会运动，认为自己高于社会运动，并认为[自己]是启蒙者，会带给被剥削阶级带来觉悟。政党成员往往是知识分子，他们比人民自己更想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其他试图控制的组织，如教会和官僚工会，也无助于社会运动。

所有这些人都应从社会运动中剔除，因为他们维护的不是社会运动的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社会运动不需要老板、领导或想利用它的人。社会运动需要的是那些愿意支持它、与它一起斗争，而不是为它而斗争的人。这是一个因生存需要和促进真正团结的事业所拥有的尊严而合法化的地方。^[101]

社会运动需要的是愿意支持他们的人，无论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支持社会运动的人与其他激进分子的条件并不完全相同，这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工作的人支持失业工人的斗争，有住房的人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斗争，等等，都是正义的。即使是来自中产阶级的人，如果他们是有道德的人，也可以甚至应该向最受剥削的阶层靠拢并提供支持。这种声援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对社会运动非常重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鼓动中产阶级成员与人民并肩作战是一种道德责任。他说：

……所有拥有知识和才能的人，如果你们有心，就来吧，你们和你们的同伴，把它们奉献给最需要的人。要知道，如果你们不是以主人的身份，而是以斗争的同志的身份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在新的地带鼓舞自己；与其说是教导，不如说是构想群众的愿望，猜测和制定这些愿望，然后不懈地、持续地努力……使它们变成现实——要知道，只有到那时，你们才过上了完整的生活。^[102]

这种支持社会运动的候选资格应取决于那些打算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人的态度。无论是支持者，还是组织上合法的激进分子，都必须表明他们更愿意倾听而不是发言。他们必须了解那些组成社会运动、并肩战斗的人们的处境和情况，与他们共同成长，而不是以专制和垂直的方式来定义他们的方式和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者或激进分子就会明白，最重要的是将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群体的现实相对照，而不是试图将社会运动简化为他们意识形态的确定性。

此外，当我们谈论自治时，我们必须牢记，对我们来说，自治并不意味着没有意识形态斗争，甚至也不意味着缺乏组织。当你鼓励“非-意识形态”、频繁的自发性；当你放弃计划

和革命纲领——通常称之为自治——时，你就为统治阶级、官僚和专制主义者打开了空间，留下了空地，他们将占据这些空间。

社会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战斗性** (*combativeness*)。我们说社会运动必须具有战斗性，是指社会运动必须通过强加其社会力量来建立自己的征服，而不是依赖于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社会阶层的恩惠或善举。战斗性还表现为在国家之外捍卫阶级斗争的姿态。我们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强大支柱，因此，我们不认为社会运动能够在国家内部开展政治活动，而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国家对社会运动所采取的做法总是一种收编社会运动的方式，是为了达成某种“社会契约”，旨在平息阶级斗争的情绪，以确保制度的合法性。无论社会运动的暴力程度是高是低，事实上，它们都应始终保持战斗性，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本身对抗。

相对于代议制民主，我们也支持将直接行动作为政治行动的一种形式。社会运动不应寻求信任那些在国家内部运作的政治家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我们知道，代议制的机制会改变所有进入其中的人，即使是善意的，也不允许民选政治家代表被剥削阶级采取行动。即使是“左翼”政治家也会混淆手段与目的，他们混淆而非澄清社会运动；因此，这不是解放社会运动的最正确手段。当社会运动本身，

在对当前环境不断做出反应的过程中，不寄希望于人、权力或外部力量，而是……创造自己的斗争条件，从自身汲取行动手段……因此，直接行动是反抗精神的明确而纯粹的具体化：它将阶级斗争具体化，使之从理论和抽象领域进入实践和现实领域。因此，直接行动就是生活在日常中的阶级斗争，是对资本主义的不间断进攻。^[103]

这样，社会运动就不会把自己的行动委托给政治家，而是自己主动去做，实践国际工人协会 (IWA) 的座右铭：“**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业**”。争取这种解放的斗争必须有策略地进行，根据情况的需要采取或多或少的暴力直接行动。当需要采取暴力行动时，必须始终将其理解为一种回应，一种对我们所生活的统治和剥削制度的自卫。

直接行动是社会运动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因为

我们申明，我们所倡导的政治并不具有党派的含义，而是管理公共事物、为所有人服务的含义。政治是由人民创造的，他们组织得当，能够有效地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所倡导的政治是今天作为工人斗争的政治，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反对剥削和压迫，我们是这些剥削和压迫的受害者。正是在社会动员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前景。^[104]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运动并不是为了在国家或其权力机构中拥有权力而战。它们总是在国家之外组织起来，主张将政治权力归还给人民。因此，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谁占据了国家，而在于国家本身。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他团体和组织所倡导的人民权力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人民权力理解为被剥削阶级组织不断增长的社会力量，而这些组织又与资本主义和国家不断发生争执，那么我们同意这一观点。然而，也有人为人民权力辩护，认为人民权力(*popular power*)是脱离基层的先锋、等级制度、专制党派、对国家的要求和各种官僚机构的支持。如果人民权力指的是第二种模式，那么我们的观点就完全不同了。

除了将直接行动作为一种政治方式之外，社会运动——按照我们对社会运动的理解——如果自诩为重大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就有必要将直接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当所有参与社会运动的人都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时，直接民主就会在社会运动中发生。通过这种方法，以平等的方式（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在横向集会上做出决策，并在集会上对问题进行讨论和审议。在会议之外，没有讨论和审议问题的人或团体；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发号施令、唯命是从的上司。

以这种方式行使直接民主，可以比作前面所解释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运作。换言之，

社会运动通过自我管理的原则进行内部协调，并在必要时通过联邦制进行联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以这种方式行事，是在我们的斗争手段中加入了为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而持有的立场，这印证了“**目的即手段**”(*the ends are in the means*)的格言。即使是领导人和承担的职能也是临时的、轮换的和可召回的。

在这种社会运动模式中，需要有道德和责任感的激进行为。道德是正确的激进行为的指南，它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原则为基础，支持合作、团结和互助。它还指导激进分子的行为不伤害他人，鼓励支持，不允许采取分裂或不公平内斗的姿态。责任是一项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原则，它鼓励社会运动激进分子发挥主观能动性，承担责任并履行责任——这将防止少数人承担过多的任务——鼓励他们采取与战斗精神一致的态度，以最佳方式为社会运动做出贡献。

团结和互助也是社会运动中应鼓励的原则。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应鼓励被剥削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摆脱孤立，寻求自我联合，与其他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世界的人联合起来，人们就建立起了阶级团结。这种团结是通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联合而形成的社会运动，甚至是一个社会运动与另一个社会运动的联合，以建立人民组织并战胜资本主义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承认国家的局限性，因为社会运动应表现出阶级利益而非国家利益的团结。当社会运动以阶级利益为指导时，它们就是国际主义的。

同时，社会运动也是发展文化和大众教育的首选空间。文化作为被剥削阶级的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是大众教育的主体。所有被动员起来的人都会发展自己的学识，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形式、语言和经验来诠释斗争精神。由于不存在完整的知识，因此这种教育是通过激进分子之间的交流过程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老师和学生之分，所有人都是老师和学生。每个人都在学，每个人都在教。这样，通过对话、辩论和经验交流，就可以构建一种尊重人民文化和增强激进分子能力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对媒体、学校和其他再生产手段每天传播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比较。

此外，斗争经验所提供的“革命操练”(*revolutionary gymnasium*)在带来短期收益的同时，也将负责协助这一教育过程，为通过自由本身寻求自由的实践经验做出贡献。

社会运动所取得的短期成果，即所谓的改良，将成为减轻斗争者痛苦的途径，同时也将传授组织和斗争的经验。因此，我们的理解是，“我们将以开始从敌人手中一点一点夺取他所占领的土地的同样精神，去夺取或征服最终的改革，以取得更大的进步”^[105]。我们相信，在为改革而斗争的过程中，社会运动不会成为改良主义者——那些把改良理解为目的的人。即使是在为改良而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也可以坚持革命实践，反对改良主义，因为“如果我们反对改良主义，并不是因为局部的改良不引起我们的兴趣，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改良主义不仅是革命的障碍，甚至也是改良的障碍”^[106]。

这句话为我们认为在社会运动中至关重要的另一个关键特征留出了空间：革命的长远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想法是，社会运动除了有其特定的旗帜（土地、住房、工作等）外，还可能以革命和建设新社会为目标。我们的理解是，短期和中期的斗争是对这种长期视角的补充，而不是排斥。从长远角度看，运动有更大的征服能力，因为目标越遥远，征服就越大——第一次征服并不是斗争的终点。许多没有长远目标的社会运动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为无地者提供土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等）就是斗争的终点。对我们来说，这只是第一步，即使实现了这一步，也应围绕影响我们社会的其他问题激发其他斗争和动员。正是这种观点也为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使他们对阶级调和与收编的企图保持警惕。这种观点还鼓励团结和互助，因为被剥削阶级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支离破碎的，而是一个为新社会而奋斗的整体的一部分。因此，社会运动捍卫的是一种革命性的长远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希望用一个建立在人人平等公正和人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取代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少数人压迫剥削绝大多数人、特权、无所事事和保护所有这些美好事物的权威基础上的社会……简而言之，它需要的是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在这种组织中，每个人都能找到平等的机会发展自己、教育自己、思考、工作、行动并享受作为一个人的生活，而不受自然和个人特点的影响。^[107]

另一个必须提及的重要问题是，社会运动往往是被剥削阶级自发行动和动员的结果。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也明白，我们将永远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在极端情况下，部分民众会出于不同的原因进行反抗或动员：谴责不公正现象、应对来自体制的攻击、获得食物和居住场所等等。一方面，我们主张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始终支持这些自发的民众动员。必须在斗争中追求组织目标。因此，当自发性发生时，我们不应质疑自发性，而应参与到斗争中，努力催化各种力量，以达到必要的组织化程度。社会运动的这种动力自然包含着高度的自发性，它与不同的社会环境（镇压、立法、政治力量的变化等）相互作用，自然会使社会运动出现起伏。有时，现实环境会使斗争更加激进和持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会出现难以表达、气馁、恐惧等问题。也就是说，自然会有起伏。

在某些时期，通常是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类伟大胜利的前兆，一切似乎都在加速前进，一切都充满力量：思想、心灵、意志，一切都步调一致，一切似乎都在征服新的领域。因此，它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来，就像一股电流，将最遥远的个人凝聚在相同的情感中，将最不同的思想凝聚在共同的思想中，将相同的意志铭刻在所有人的心中……但也有其他阴郁的时代，绝望而致命，一切都透着颓废、衰败和死亡的气息，表现出公共和私人良知的真正消退。在重大历史灾难之后，总会出现这样的低潮。^[108]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正确评估背景，并以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当背景指向波动时，我们必须全力出击，提供一切必要的组织。在形势低迷的时候，我们必须懂得如何面对问题，“保持火焰的燃烧”，并等待时机重新动员起来。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打破个人的孤立状态，创造并鼓励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运动的发展。这是我们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在此之后的第二步，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各种社会运动联合起来，形成我们通篇所称的人民组织，即社会运动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持续斗争中的汇合。

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组织的激进化程度和社会力量，我们认为有可能实现社会革命，从而构成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我们认为被剥削阶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群众……没有他们的有力帮助，革命的胜利将永远不可能实现”^[109]。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

如果[革命者]缺乏行动的指导思想，他们就只能是一艘迷失在大海上的船。

——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 (Ricardo Flores Magón)

在我看来，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建立在完全自主、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因此也必须建立在个人和团体的完全责任基础上；建立在那些认为联合起来实现共同目标是有益的人之间的自由协议基础上；建立在遵守已接受的承诺、不做任何违背已接受的计划的事情的道德责任基础上。

——艾力格·马拉泰斯塔 (Errico Malatesta)

在本文中，我们有时会讨论 **专门的/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specific anarchist organization*) 以及我们对它的期望。正如我们之前所定义的，它的目标是“建立群众组织并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具有理想的性质，并通过社会革命实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此外，我们将其理解为政治层面的活动。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是无政府主义个人的团体，他们通过自己的意愿和自由协议，为明确的目标共同努力。为此，它使用各种形式和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或至少朝着这些目标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将无政府主义组织视为“……拥有共同目标并努力实现该目标的个人集合体；他们自然会相互理解、联合起来、分担工作并采取一切适合这一任务的措施”^[110]。通过无政府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以便将革命政治付诸实践，并设计出指向最终目标——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手段——工作方式。这种追求最终目标的政治实践应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建立一个能够完成无政府主义任务的组织，不仅在准备社会革命的时候，而且在革命

之后。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联合无政府主义的所有革命力量，并立即关注群众为社会革命做准备的问题，以及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问题。^[111]

该组织建立在兄弟协议的基础上，无论是内部运作还是外部行动——其内部不存在支配、剥削或异化关系——这就构成了一个自由意志组织。无政府主义特定/专门组织 (specific anarchist organisation) 的职能是协调、汇聚和永久性地增强无政府主义激进活动的社会力量，为坚实而持续的斗争提供工具，这是追求最终目标的基本手段。因此，

……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首先是讨论，然后是收集革命的手段，最后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历史的时刻来临时，这个整体以其手段为武器，以其团结为力量，能够扫除世界上的一切畸形和暴政……组织是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手段，是详述思想纲领和既定方法的一种手段，是团结旗帜的一种类型，是在了解自己可以依靠的人并意识到自己可以支配的力量之后，开始战斗的一种手段。^[112]

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有明确的战略战术和政治路线——通过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以及战略和战术的统一来实现这一点。这种路线明确的组织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将无政府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并在社会层面上发展他们的政治实践——这是积极的少数派组织的特点，因为社会层面总是比政治层面大得多。当积极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阶级斗争中开展社会工作时，这种政治实践就形成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设法影响与其合作的社会运动时，这种政治实践就形成了。作为活跃的少数派，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得当，在实现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就会构成一股更大的社会力量，并有更大的机会展开社会嵌入。除了社会工作和嵌入之外，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还开展其他活动：理论的生产和再生产、无政府主义宣传、政治教育、战略的构思和实施、政治和社会关系以及资源管理。因此，我们可以说，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活动有：

- 社会工作和嵌入 (*Social Work and Insertion*)

- 理论的生产和再生产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ory*)
- 无政府主义宣传 (*Anarchist Propaganda*)
- 政治教育 (*Political Education*)
- 战略的构思和实施 (*Conce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 社会与政治关系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资源管理

这些活动可以以或多或少公开的方式进行，但始终要考虑到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之所以说或多或少公开，是因为我们相信“人们应该公开地做大家都同意应该知道的事，秘密地做大家都同意应该隐藏的事”^[113]。在镇压较少的时候，无政府主义组织公开活动，进行尽可能大的宣传，并试图吸引最多的人。在镇压加剧的时期，如果“例如，政府禁止我们发言、印刷、集会和结社，而我们又没有力量公开反抗，我们就会试图秘密地发言、印刷、集会和结社”^[114]。

在这项因社会环境而异的工作中，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始终捍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因为我们将其理解为这些利益的政治表达。对我们来说，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如果不是最纯粹、最忠实地表达民众的本能，那就什么也不是。如果它们不符合这些本能，它们就是错误的；而且，只要它们是错误的，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但是，如果这些思想是本能的忠实表达，如果它们代表了人民的真实思想，那么它们就会很快渗透到造反群众的精神中去；只要这些思想遇到了人民精神的道路，它们就会很快走向全面实

现。^[115]

专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被理解为被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表达，它并不代表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也从未将自己凌驾于被剥削阶级之上。它不会取代被剥削阶级的组织，而是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为他们服务的机会。

在这种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政治实践中，无政府主义组织以《原则章程》(*Charter of Principles*)为指导。这些原则是指导所有政治实践的道德主张和概念，两者都是不可讨价还价的，为无政府主义行动提供了模式。“与这些原则保持一致的假设是决定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真实性的因素”。^[116]就我们而言，2003 年的《原则章程》^[117] 规定了九项原则：自由、伦理与价值观、联邦主义、自我管理、国际主义、直接行动、阶级斗争、政治实践与社会嵌入以及互助。

首先，我们坚持自由原则，确认“争取自由的斗争先于无政府状态”。与巴枯宁的思想一样，我们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在集体自由中才能得到最终体现”，因此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案。因此，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建议。追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就是为自由而不懈奋斗。对我们来说，另一个绝对核心的原则是伦理和价值观，它使我们的所有实践都建立在无政府主义伦理的基础上，这是一个“不容讨价还价的激进承诺”。通过伦理，我们倡导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以及相互尊重。

我们主张**联邦制和自我管理**(*federalism and self-management*)作为非等级和水平化组织的原则，通过互助和自由结社来维持，并假定 IWA 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这些原则还将指导未来社会各个层面的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由工人自己来执行。在强调斗争需要自我管理的同时，我们申明，“即使生活在当前过时的制度下，[自我管理]也为实现平等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可能”。

通过坚持国际主义，我们强调了斗争的国际性，强调了我们必须以阶级亲和力而非国家为纽带。一个国家的被剥削者必须在另一个国家的被剥削者身上看到斗争的伙伴，而不是敌人。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和对国家的推崇，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越感，强化了种族中心主义和偏见——这是走向仇外心理的第一步。每个人，无论其国籍如何，都是平等的，都应享有自由。

直接行动是建立在**水平主义**(*horizontalism*)基础上的一项原则，它鼓励工人的主人翁

精神，反对代议制民主，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代议制民主在政治上是异化的。直接行动将人民置于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之上，“将工人和被压迫者与政治行动的中心联系起来”。

此外，我们选择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将自己定义为捍卫被剥削者的工人组织，并为消灭阶级社会和建立一个奴隶与主人不复存在的社会而奋斗。因此，我们承认并优先考虑阶级斗争。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与资本主义的罪恶作斗争，为此必须与被剥削者并肩作战，因为阶级社会的后果在这里变得更加清晰和明显。

政治实践和社会嵌入的原则强化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只有与被剥削阶级在一起，无政府主义才能蓬勃发展。因此，无政府主义组织应寻求与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建立联系，无论这些斗争在何处发生。我们申明，无政府主义组织与“社会、文化、农民、工会、学生、社区、环境阵营等任何表现形式”的互动，“只要是在为自由而斗争的背景下”，都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化。

作为《章程》的最后一项原则，互助鼓励团结斗争，鼓励与所有真正为公正和平等世界而奋斗的人保持兄弟般的关系。它鼓励被剥削者之间的有效团结。

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组织力图以建设性的方式影响社会运动，提出建议，同时远离个人和团体的负面影响，这些个人和团体不是维护人民的利益，鼓励人民成为自身解放的主角，而是利用人民实现其他目标。我们知道，政治家、政党、工会以及其他专制组织和个人——如教会、贩毒等——构成了人民建设的障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渗透到社会运动中去，试图利用社会运动中的人数优势：在选举中寻求支持、为专制权力项目奠定基础、获取金钱、征服信仰、开辟新市场等等。专制组织和个人并不想支持社会运动，而是利用社会运动来实现他们（专制组织和个人）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与社会运动激进分子的目标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专制者试图建立一种对社会运动的支配关系。

任何一个组织过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看过社会运动工作方式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知道，如果没有一个连贯的组织，能够在持续的政治空间争夺中给予无政府主义者必要的力量，那么专制者就会成为霸权，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就会完全失败。无政府主义者不构成必要的社会力量，这就提供了两种可能性：要么被专制者利用，成为他们实施专制权力纲领的工具（又称“袖子”）；要么干脆被清除。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专门组织起来的，而是在事件发生后离开的。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时，他们不会施加必要的影响，甚至不会产生一点社会力量。虽然他们不会过多干涉，但他们被允许参与社会运动。

第二种情况是，孤立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施加一些影响，或者用专制主义的理解，他们开始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被驱逐、除名或中伤。他们被专制者“打得落花流水”。没有必要的组织，他们就无法在社会运动中维持自己的定位，更无法施加所期望的影响。

这是因为当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一个适当的组织时，就有可能建立专制或不那么自由的组织。在讨论关于政治空间的长期争议时，我们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在社会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监督权或任何特权地位。恰恰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当我们想要影响社会运动使用自由意志实践时所发生的内部斗争。

我们认为，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政治真空。因此，从我们的立场占上风的那一刻起，就必然意味着专制主义者影响力的减弱，反之亦然。例如，当看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正在为一场使用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的运动而奋斗时，政客和党派就会反对，除非有一个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能够融入社会并为这些立场而奋斗，否则专制主义立场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当我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得当时，我们就不会落后于事态的发展，而是能够在社会运动中标明我们的立场并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进而实现真正的嵌入。正是通过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我们才能够在千变万化的社会运动中为我们想要开展的工作进行适当的组织。

无政府主义组织应该是我们努力和宣传的延续；它必须是指导我们日常战斗行动的自由意志顾问。我们可以以它的纲领为基础，在其他阵营中，在所有我们可以渗透并开展活动和行动的特殊斗争的特定组织中，例如，在工会、反军国主义社团、反宗教和反教派团体等中，传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特殊组织(special organisation)同样可以作为无政府主义者集中（不是集中制！）的场所，作为我们之间达成一致、相互理解和尽可能完全团结的领域。我们越团结，我们被拖入不一致的危险就越小，或者说，我们从斗争的动力转向战斗和小规模冲突的危险就越小，而在战斗和小规模冲突中，其他与我们完全不一致的人可能会束缚我们的手脚。^[118]

因此，无政府主义组织除了要对其在不同阵营中的政治实践负责外，还要在这些阵营中增强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力量。在这些空间中存在的各种力量中，无政府主义者应该脱颖而出，实现自己的立场。

这种在不同阵营中的政治实践要求无政府主义组织将自身划分为阵线(*fronts*)，即开

展社会工作的内部团体。一般来说，采用这种方法开展工作的组织建议发展三个基本阵线：工会、社区和学生。与此不同的是，我们认为阵地的划分不应根据这些预先设定的嵌入空间，而应基于组织的实际工作。根据我们的理解，不应该有义务在这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此外，可能还有其他有趣的空间需要专门的阵线。

每个组织都应寻找更有利于其社会工作发展的空间，并从这一实际需要出发建立自己的战线。因此，如果有学生部门的工作，就可能有学生阵线。如果有工会工作，就可能有工会阵线。但是，如果开展了其他工作，例如农村运动或城市运动等，阵线也应按照这种划分。也就是说，与其只有一个与农村和城市社会运动合作的社区阵线，不如建立一个农村运动阵线和另一个城市运动阵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支持**动态阵线**(*dynamic fronts*)的模式，这种模式考虑到了专门/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内部分工，以便以最佳方式切实开展社会工作。

这些阵线在各自的工作领域负责创造和发展社会运动，确保无政府主义者占据政治空间——长期存在争议的空间——并在这些运动中发挥应有的影响。

就我们组织而言，我们发起的社会工作分为两条阵线。一条是“**社区阵线**”，包括法比奥-卢斯社会图书馆 (Biblioteca Social Fábio Luz - BSFL)、里约热内卢社会文化中心 (Centro de Cultura Social - CCS-RJ) 及其社区工作、马克斯-达科斯塔研究中心 (Núcleo de Pesquisa Marques da Costa - NPMC) 和爱迪尔·佩雷斯自由意志研究会 (Círculo de Estudos Libertários Ideal Peres - CELIP) 的管理工作。另一个是“**占领阵线**”(*occupations front*)，它参与了城市占领活动和无家可归者国际主义阵线 (Frente Internacionalista dos Sem-Teto - FIST)。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离开了国际无家可归者阵线，继续从事占领工作，并将一些占领者和许多其他失业者聚集到失业工人运动 (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Desempregados - MTD) 中。这一运动在“占领阵线”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占领阵线”就更名为“**城市社会运动阵线**”(*urban social movements front*)。同样，由于我们认为有必要，我们从农村社会运动、生态学和农业的实际工作出发，建立了第三条阵线：“**农业生态阵线**”(*agro-ecological front, 无政府主义与自然*)，该战线由本组织开始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认为各条战线都能适应实际工作环境。我们将举例说明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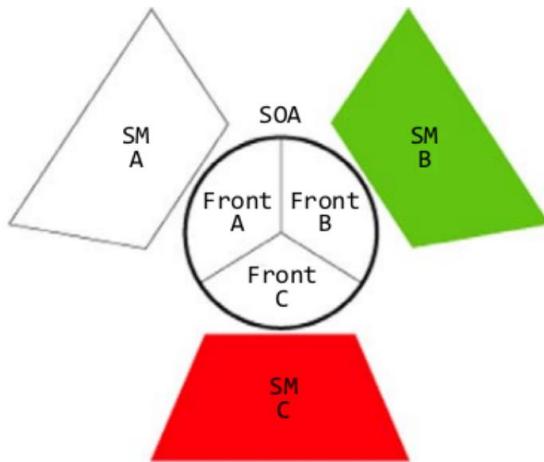


Diagram 1

图 1

图 1

SAO 是专门的/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分为阵线 A、B 和 C)，SM 是社会运动，
SAO 内部分为阵线，每个阵线在一个确定的 SM 或 SM 部门中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假
定 SAO 与三个 SM 或三个 SM 部门合作，它就将自己分为三个阵线开展工作。A 阵线
与 SMA 或已确定的 SM 的 A 扇区一起工作。B 阵线与 SMB 或确定的 SM 的 B 扇
*区合作，依此类推。举个实际的例子：SAO 可以分为工团主义阵线 (*syndicalist front, A*)、社区阵线 (*community front, B*) 和学生阵线 (*student front, C*)，每个阵线都将*
在一个 SM 中开展工作。A 阵线在工会中行动，B 阵线在社区中行动，C 阵线在学生运动
*中行动。就我们而言，我们的 SAO 如今分为三个阵线：*城市社会运动 (urban social**

movements, A)*、*社区 (community, B)* 和*农业生态 (agro-ecology , Anarchism and

**Nature, 无政府主义与自然, C)*。每条战线都在一个或多个社会运动中开展工作。A 阵线*
在无家可归者运动和 MTD 中，B 阵线在社区运动中，C 阵线在生态学和农业的农村运动
中。

无政府主义组织除了在内部划分阵线以开展社会工作外，还在内部和外部运作中使用我们称之为“同心圆” (*concentric circles*) 的逻辑——这种逻辑深受巴枯宁主义组织模式的启发。我们采用这种运作逻辑的主要原因是，对我们来说，无政府主义组织需要保留不同的行动实例。这些不同的行动方式应能加强组织的工作，同时又能让组织汇聚有准备、有高度

献身精神的激进分子，以及同情组织理论或实践的近似者——他们可能或多或少有准备，或多或少有献身精神。简而言之，同心圆旨在解决一个重要的矛盾：无政府主义组织需要足够独立，以便拥有有准备、有决心、政治上一致的激进分子，同时又要足够开放，以便吸引新的激进分子。

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于它们没有按照同心圆的逻辑运作，也没有落实这两种行动方式造成的。一个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并对组织工作感兴趣的人，尽管并不深入了解政治路线，是否应该加入组织？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感兴趣的门外汉应该加入组织吗？你如何看待不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广义“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应该加入组织吗？还有那些已经做了重要工作，但现在想接近组织，但不想参与组织长期活动的老成员？还有那些很少能抽出时间参与活动的成员？问题很多。出现其他问题的原因是对社会工作的实施存在疑问。该组织是否必须在社会运动中以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工作中，它能否与其他非无政府主义的个人、团体和组织结成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倡导的共同点是什么？如何与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一起开展社会工作并保持无政府主义身份？如何确保无政府主义在与社会运动接触时不丧失其特性？在这一点上也有许多问题。

同心圆旨在为该组织的每个激进分子和同情者提供一个明确的位置。此外，同心圆还旨在促进和加强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社会工作，最后，建立一个吸收新激进分子的渠道。

在实践中，同心圆的逻辑建立如下。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能或多或少地在内部、前线和公共活动中阐述、复制和应用该组织的政治路线。此外，激进分子也应或多或少地协助制定组织的战略战术路线，并完全有能力复制和应用这一路线。激进分子在组织中承担着内部职能——无论是执行、审议还是特别职能——以及社会工作方面的外部职能。激进分子在组织内部承担的职能坚持自我管理和联邦制，或横向决策，所有激进分子都有相同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在特定情况下，还进行授权，并有必要的授权。必须非常明确规定代表的职能，使他们“不能代表协会行事，除非协会成员明确授权他们[这样做]；他们只能执行成员决定的事情，而不能对协会的前进方向发号施令”^[119]。此外，职能应该轮换，以赋予每个人权力，避免职位或职能固化。

专门的/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可以只有一个激进分子圈子，所有激进分子都在同一场合，也可以有多个圈子——标准由集体确定。例如，这可以是一个人加入组织的时间，也可以是他阐述政治或战术战略路线的能力。因此，新加入的激进分子或制定路线能力较弱的激

进分子可能会被分在一个较外部（较远）的圈子里，而制定路线能力较强、经验丰富的激进分子则会被分在另一个较内部（较近）的圈子里。圈子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但我们的想法是，越是“内部”或越是接近的激进分子，就越能制定、理解、复制和应用组织的方针。越是“内部”的激进分子，他们的承诺和活动水平就越高。激进分子为组织提供的越多，组织对他们的要求就越高。是激进分子决定自己的承诺程度，他们根据这一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审议。因此，激进分子决定自己的承诺程度，承诺越多，决定越多。承诺越少，决定越少。

这并不意味着承诺多的人的立场比承诺少的人的立场更有价值。这意味着他们参与了不同的决策机构。例如，忠诚度较高的人在大会上发言权和投票权，大会确定了组织的政治和战略路线；忠诚度较低的人不参加大会，或仅作为观察员参加，他们参加的是每月一次的大会，大会确定了路线的战术和实际应用。

因此，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你可能会有一个或多个圈子，这些圈子应始终根据激进分子的承诺程度来确定。在不止一个级别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清楚这一点，所有激进分子都必须了解改变级别的标准。因此，是由激进分子来选择他们想去的地方。

下一个圈子更加外部，远离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核心，不再是组织的一部分，但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支持者层级**(*level of supporters*)。这个机构或实例旨在将所有在意识形态上与无政府主义组织有亲近感的人聚集在一起。支持者负责协助组织开展实际工作，如出版小册子、期刊或书籍；散发宣传材料；帮助编写理论或进行背景分析；组织社会工作实践活动：社区活动、帮助开展培训工作、后勤活动、帮助组织工作等。通过这种支持，与无政府主义组织及其工作有亲和力关系的人可以与其他激进分子接触，加深对组织政治路线的了解，更好地了解组织的活动，加深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等。

因此，支持者层级在帮助无政府主义组织开展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力求拉近与感兴趣者的距离。这种接近的未来目标是让其中一些支持者成为组织的激进分子。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并通过实际工作确定那些有兴趣加入该组织且具备适当成员资格的人。加入组织的建议可以由组织的激进分子向支持者提出，反之亦然。虽然每个激进分子都可以选择自己对组织的承诺程度以及他们想要加入的组织，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目标始终是在更内部的圈子里拥有最多的激进分子，他们的承诺程度更高。

让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假设一个组织已经决定在内部开展工作，有两个层次的承诺——或者说两个圈子。新战士进入时是“**激进分子**”(*militant*)级别，当他们在组织中工作

六个月并成为有准备、有决心的激进分子时，就转为“正式激进分子”(*full militant*)级别。假设这个组织也决定设立一个支持者层级。组织的目标将是根据每个人与组织的亲和力，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将他们转为激进分子，并在六个月后——一旦做好准备——转为正式激进分子。我们举例说明在实践中如何做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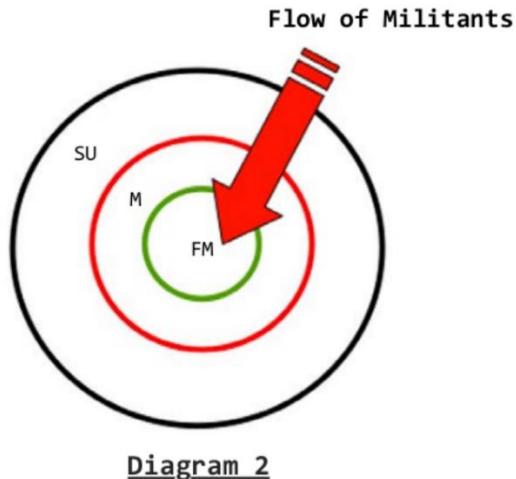


图 2

图 2

SU 是支持者的级别，M 是激进分子的级别，FM 是正式激进分子的级别，目标是红色箭头所示的流程——从 SU 到 M，从 M 到 FM。有兴趣的人可以跟着这个流程走，没兴趣的人可以留在自己感觉更好的地方。例如，如果一个人只想提供零星的支持，而不想提供更多的支持，那么他可能希望始终留在 SU。这里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所有工作意愿都应被组织利用。这不是因为一个人时间少，也不是因为他们宁愿在必须拒绝的时候提供帮助，而是因为在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必须为所有希望做出贡献的人留出空间。“成绩是永不落空的选拔标准。激进分子的能力和效率，从根本上说，是衡量他们执行任务的热情和应用程度的标准”。^[120]

同心圆的逻辑要求每个激进分子和组织本身对每个级别的承诺都有非常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因为，一个人不能随便对自己不会遵守的事情做出决定。例如，一个每月只参加

一次活动并提供零星捐助的支持者，就不能决定必须每天遵守或开展的规则或活动，因为他们是在为其他激进分子而不是为自己做决定。

在自由意志团体中，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是，由那些偶尔做出贡献的人决定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由更多的长期成员来承诺或执行。例如，时不时出现的激进分子很容易就想制定组织的政治路线，因为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是必须遵循这一路线的人。

这些都是不相称的决策形式，其中一个人最终决定了其他人颁布的东西。**在同心圆模式中，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都可以就自己可以并应该在事后做出承诺的事情做出决定。**这样，支持者只决定他们将参与的事情是正常的。同样，该组织的激进分子决定他们将执行的任务也是正常的。因此，我们的决定和他们的承诺是相称的，这意味着该组织有明确的加入标准，明确规定哪些人可以参加，哪些人不可以参加，以及激进分子的承诺程度如何。

一个重要的加入标准是，所有加入组织的激进分子都必须同意组织的政治路线。为此，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有表达这一路线的理论材料——对于那些尚未加入组织的人来说，可以不那么深入地表达，而对于那些已经加入组织的人来说，可以更深入地表达。当有人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工作感兴趣，表现出对近似的兴趣时，你应该让这个人成为你的支持者，并给予他们必要的指导。作为支持者，他对政治路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组织的实际工作有了亲近感，他可能会表示有兴趣加入组织，或者组织可以表示有兴趣让支持者成为激进分子。在这两种情况下，支持者都应得到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长期指导，向他们提供理论材料，深化他们的政治路线。一名或多名熟知这一路线的激进分子将与他们讨论疑虑、辩论并作出澄清。在确保支持者同意组织的政治路线并征得双方同意后，激进分子就会融入组织。重要的是，在初始阶段，每个新战士都要有另一个老战士的指导，由后者为他们指明方向并做好工作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无政府主义组织都必须关注对支持者和激进分子的培训和指导，以便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承诺的程度。

这种同心圆的逻辑同样适用于社会工作。通过它，无政府主义组织以最合适、最有效的方式开展社会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分为不同的阵线来开展实际工作。为此，有些组织倾向于与社会运动建立直接关系，而另一些组织则倾向于通过**中介社会组织**（我们可以称之为倾向团体，*grouping of tendency*）来展示自己。

参加倾向团体意味着接受一套定义，不同思想渊源的同志可以共享这套定义，但如果要寻求最起码的真正的行动一致性，这些定义都有一些不可或缺的排除项（例如对改良主义者而言）。（……）相互协调、植根于最有战斗力的人民群众的倾向团体（……）是比后者[群众层面]更高的层面。^[121]

倾向团体将自己置于社会运动和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之间，将在某些实际问题上具有亲和力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激进分子聚集在一起。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有些无政府主义组织倾向于直接在社会运动中展示自己，而不需要倾向团体，而另一些组织则倾向于通过倾向团体来展示自己。这两种情况各有利弊，每个组织都必须确定最佳的行动方式。由于我们在社会运动中倡导的观点更偏重于实践而非理论，因此与倾向团体合作可能会很有意义，这种团体可以吸纳认同我们在社会运动中倡导的部分或全部立场（权力、阶级斗争、自治、战斗性、直接行动、直接民主和革命观点）的人，他们将帮助我们增强捍卫这些立场的社会力量。

与上图相同，我们的想法是，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在这一中间层次（倾向团体）中寻求嵌入，并通过它展示自己，在社会运动中开展工作，寻求社会嵌入。我们再次说明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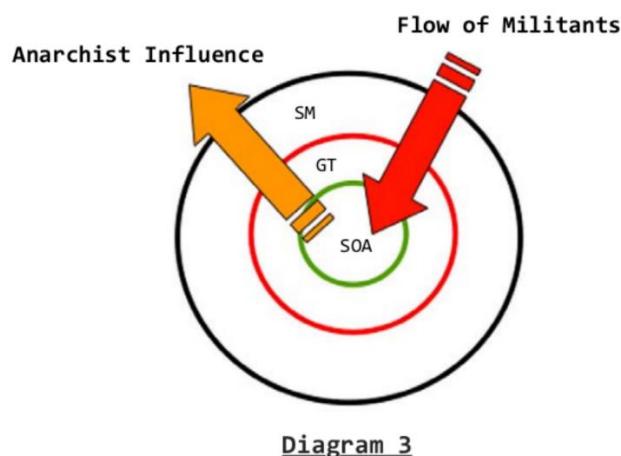


Diagram 3

图 3

图 3

SAO 是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GT 是倾向团体，SM 是社会运动。

第一条流——SAO 的影响力——试图通过 GT，再从 GT 流向 SM。让我们来看几个实际例子。希望在工会中开展活动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可能会与工会运动中捍卫某些特定旗帜（革命观点、直接行动等）的其他活动家组成一个倾向团体，并通过这一倾向影响工会运动或其开展活动的工会。或者，无政府主义组织可能会选择与无地运动合作，并为此将社会运动中捍卫类似立场（自治、直接民主等）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倾向团体。通过这种倾向团体，无政府主义组织在无地者运动中采取行动，并试图以这种方式对其施加影响。

这种组织形式旨在解决我们在活动中发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例如，当我们认识一些非常敬业的活动家时；他们是主张自我管理、自治、基层民主、直接民主等的革命者，而我们却因为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与他们合作。这些积极分子可以与倾向团体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共同捍卫他们在社会运动中的立场。

图中第二个箭头表示激进分子流动的目标。也就是说，在这个工作计划中，目标是将社会运动中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实际联系的人带入倾向团体，并从那里将有思想联系的人带入无政府主义组织。与上图相同的是，如果一个激进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大的实际亲和力，但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他们一定是倾向团体的成员，并将成为开展社会工作的基础。如果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亲和力，他们可能会更接近甚至加入该组织。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目标不是把所有积极分子都变成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学会以最合适的方式与每一个积极分子合作。在拥有共同利益的同时，激进分子可能会改变他们在圈子里的立场（从社会运动转向倾向团体，或从倾向团体转向无政府主义组织）。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共同利益，每个人都会在他们认为更合适的地方采取行动。

无政府主义组织采用的决策程序是尝试达成共识 (*consensus*)，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使用投票。与某些自由意志团体和组织不同，我们认为不应强制要求达成共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除了共识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决策形式，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就越不可行之外，它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将巨大的权力赋予了孤立的人。在一个由 20 名激进分子组成的组织中，一个人可能会阻止达成共识，或者即使 19 人中有一个人赞成另一个

人的立场，你也必须有一个“中间派”，这个“中间派”会以一种非常不相称的方式考虑唯一的反对者。为了使决策过程具有适当的效率，同时又不给孤立的行为者过多的权力，我们选择了这种试图达成共识的模式，而在无法达成共识时，则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如果分歧是在组织的内部产生的，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分歧是围绕着小问题、实际方式或特殊情况出现的……那么，少数人或多或少都会倾向于按照多数人的方式行事”。^[122] 在投票表决时，组织中的所有激进分子，即使是那些被淘汰的人，都有义务服从获胜者的立场。这一决策过程用于建立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以及战略和战术上的统一。这些我们稍后再谈。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强调，对于我们想要进行的斗争而言，我们必须结束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克服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基于特定理论和战术立场的组织，并引导我们坚定地理解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立场”^[123]。

还必须补充的是，激进分子在投票决定时必须运用常识。他们应该仔细观察那些与投票议题最接近的激进分子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比那些不接近的激进分子的立场更重要，尽管它们在投票中的权重是一样的。投票时，与投票议题无关的激进分子很容易决定其他人必须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谨慎行事，应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所有参与讨论的成员都失去了投票权，不得不执行其他人的决议。

同样，在做出决定时，“必须为所有讨论留出大量空间，必须认真分析所有观点”^[124]。审议之后，“责任[划分]，成员正式负责执行”，因为“组织自己什么也不做”。然后，“所有经过审议并属于组织责任的活动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由其成员执行”，为了执行这些活动，“需要在激进分子之间划分活动，始终寻找一种能够很好地分配这些活动的模式，避免将任务集中在更积极或更有能力的成员身上”。“从激进分子为组织承担一项或多项任务的那一刻起，他就有义务履行这些任务，并对组织负有重大责任……这是激进分子与组织之间的承诺关系”。

此外，我们认为，“自律是自我管理组织的动力”，这也适用于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并再次重申这一点。因此，“每一个承担责任的人都必须有足够的纪律来执行责任。同样，当组织确定了要遵循的路线或要完成的任务时，个人的自律才能使集体决定的事情得以实现”。我们注意到：

我们还要求纪律，因为如果没有理解，如果不协调每个人的努力，采取共同和同步的

行动，就不可能取得实际的胜利。但是，纪律不应该是奴性的纪律，不应该是对领导人的盲目崇拜，不应该是对总是说不要干涉的人的服从。革命的纪律是与所接受的思想相一致的，是对承诺的忠诚，是感到有义务与斗争的同志一起分担工作和风险。^[125]

“我们认为，为了使我们的斗争结出丰硕的果实，组织中的每一个战士都必须具有高度的献身精神、责任感和自律性”。^[126] “正是意志和积极的承诺使我们日复一日地致力于发展本组织的活动，从而克服障碍，为我们的长期目标铺平道路”。^[127] 最后，我们应该知道，“责任和组织纪律不应让人感到恐惧：它们是社会无政府主义实践的旅伴”^[128]。

这一立场引入了激进分子与组织之间的共同责任关系，即无政府主义组织“将对每个成员的革命和政治活动负责，就像每个成员将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革命和政治活动负责一样”

^[129]。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社会工作和嵌入

社会工作和嵌入 (*Social work and insertion*) 是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 (*specific anarchist organisation, SAO*) 最重要的活动。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将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对立起来的社会中。让我们牢记，我们的斗争是为了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实现这一新社会的途径是通过社会运动的斗争、将社会运动纳入人民组织以及通过社会革命。为此，整个过程必须在被剥削阶级内部进行，因为他们才是我们所倡导的社会变革的真正主角。

因此，如果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指向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如果我们把被剥削阶级理解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变革的主角，那么无政府主义除了寻求与这些阶级互动的途径之外别无他法。为此：

无政府主义不能再继续被困在边缘思想的束缚中，也不能再继续只由少数小团体在其孤立的行动中宣称。无政府主义对处于斗争中的人类群体心态的自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要想自觉地吸收这种影响，现在就应该掌握新的手段，开始社会实践之路。^[130]

在阶级斗争中，被剥削阶级总是与统治阶级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或多或少会以自发的方式表现出来，或多或少会以有组织的方式表现出来。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矛盾产生了一系列被剥削阶级的表现形式，我们认为这是播撒无政府主义种子的最佳土壤。内诺-瓦斯科 (Neno Vasco) 在谈到播种者时用了一个比喻，说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在最肥沃的土地上播种。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对我们来说，这片土地就是阶级斗争的阵线。

既然我们打算在阶级斗争中播下我们的种子，既然我们认为被剥削阶级是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主角，我们就假定，无政府主义要实现其最终目标，被剥削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解释这一观点时，我们并不是将这些阶级奉为偶像，甚至也不是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是强调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参与是绝对核心的。因此，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始终与人民在一起”^[131]。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寻求与被剥削阶级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Social work)** 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阶级斗争中开展的活动，使无政府主义与被剥削阶级产生互动。社会工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层面赋予了一个社会层面，一个没有社会层面的无政府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躯体。通过社会工作，无政府主义能够实现其作为我们时代斗争的动力的功能。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社会工作有两种方式： 1.) 与现有社会运动持续合作 2.) 创建新的社会运动。

自我们成立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社会运动是我们活动的首选领域，正如我们在《原则章程》中申明的那样：“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RJ)建议立即开展工作，不进行中间调停，以嵌入社会运动领域的各种现实情况”^[132]。如上所述，我们将**社会运动**理解为“由必然性、意志和组织构成的三要素”的结果。因此，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努力激发运动的愿望和组织，而这种运动的基础主要是被剥削阶级的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由于“没有自己权利的意识，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由于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这种信念……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奴隶”^[133]。在这一动员过程中，我们必须鼓励这种感觉和信念。从那时起，需求问题就成为了核心问题，因为正是通过这个问题，动员才得以实现。很少有人愿意为一个只会带来长期结果的想法而奋斗。因此，为了动员人民，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困扰他们并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具体问题。要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拥护：

……我们必须开始同他们交谈，不是谈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普遍难题，也不是谈论造成这种难题的一般原因，而是谈论他们日常和私人的特殊不幸。有必要向他们谈谈他们的职业和工作条件，确切地说，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职业和工作条件；谈谈他们日常工作持续时间和强度，谈谈他们工资的不足，谈谈他们老板的恶行，谈谈他们食物的匮乏，谈谈他们无法适当地养育和教育自己的家人。在向他们提出消除不幸和改善处境的方法时，没有必要过早地谈论总体目标和革命目标……首先，只需向他们提供他们的自然常识和日常经验无法忽视、也无法拒绝的有用的目标。^[134]

同样，在动员过程中，你可以提出人们没有工作、没有住处等问题。因此，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作用就是解释**必要性** (*necessities*)，并围绕这些必要性进行动员。无论是创建社会运动还是与现有运动合作，中心思想始终是围绕必要性进行动员。

社会运动是被剥削阶级动员起来的实例，因此，正是这些运动导致了他们的政治实践。他们的政治实践是通过“任何以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与政治权力机构、国家、政府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对抗]关系为目标的活动”^[135]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支持机构发展起来的。政治实践力图使人民与压迫他们的制度力量进行斗争，因此，政治实践煽动人民与这些力量对峙，“捍卫和扩大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提出符合人民普遍利益或部分利益的建议的能力”。政治实践也可以是“暴动，作为对我们想要改变的状况进行暴力质疑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建议，这些建议考虑到民众面对权力机构的要求，能够提出解决一般和具体问题的办法，并要求这些机构能够采纳这些建议，使其对整个社会有效”。

社会运动必须通过其政治实践，将自己的一切征服强加给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力量。人民自己必须通过组织和意志，要求、实施和实现一切必要的改善、征服和自由。这些要求必须是永久性的，并逐步增加，每次都要求更多，并寻求被剥削阶级的全面解放。

无论争取直接改良的斗争的实际结果如何，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斗争本身。正是通过斗争，工人们学会了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懂得了雇主和政府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不联合起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就无法改善自己的条件，更不用说解放自己了……如果他们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生活得更好。他们会挣得更多，工作更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会突然感到有更多的需求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就会被迫研究失败的原因，认识到需要更加团结、更加努力；他们最终会明白，要想稳操胜券、稳中求胜，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136]

社会运动的政治实践转化为争取短期利益的斗争，在取得胜利甚至失败的情况下，都会给激进分子带来意识增强的教育意义。

特殊/专门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政治实践也是如此。我们在前面说过，我们把无政府主义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里，“是一套思想、动机、愿望、价值观，是与行动有直接联系的概念结构或体系——我们称之为政治实践”。社会工作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政治实践的主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它与组织成社会运动的被剥削阶级互动，使无政府主义退出小圈子，并在阶级斗争中广泛取代其思想。

除此之外，对我们来说，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社会工作不仅仅是简单地与社会运动互动，还必须在实践中设法影响它们，使它们具有某些运作特征。我们把通过无政府主义实践影响社会运动的过程称为社会嵌入(*social insertion*)。因此，当无政府主义组织与社会运动一起创造或发展工作时，它就有了社会工作，而当它设法用无政府主义实践影响运动时，它就有了社会嵌入。

社会嵌入的目的不是将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化”，使其成为无政府主义社会运动。与此相反，它试图赋予社会运动某些确定的特征，使其能够走向人民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并指向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它力图使社会运动走得尽可能远。

我们不想“等待群众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来进行革命；我们更坚信，如果我们不首先用暴力推翻使他们处于奴役状态的制度，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由于我们需要群众的支持才能建立起足够的物质力量，为了实现我们的具体目标，即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彻底改变社会机体，我们必须接近他们，接受他们的现状，并作为群众的一部分，让他们尽可能地走得更远。当然，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实践中真正努力实现我们的理想，而不是满足于在沙漠中说教，以满足我们知识分子的骄傲。^[137]

我们记得，我们曾主张这样一种立场，即社会运动中应该有意识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中应该有社会运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与社会运动互动，试图影响社会运动，使其具有尽可能自由和平等的形式。^[138] 虽然我们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运动视为不同层次的活动，但我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互补和辩证的关系使得无政府主义影响社会运

动，而社会运动也影响无政府主义。当我们谈到社会嵌入时，我们指的是无政府主义在社会运动中的影响。在这方面，尽管我们坚持政治（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社会（社会运动）两个层面的分离，但我们并不认为政治层面对社会层面应该有等级或支配。我们也不认为政治层面的斗争是为了社会层面或在社会层面之前进行的，而是与社会层面一起进行的——这是一种伦理关系。无政府主义组织作为活跃的少数派，在其活动中与被剥削阶级一起斗争，而不是为他们或在他们面前斗争，因为“我们不想解放人民，我们希望人民解放自己”^[139]。我们将进一步详细讨论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作为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对社会运动的影响的社会嵌入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我们所说的“影响”的含义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对我们来说，“影响”是指通过说服、建议、榜样、指导、见解和实践来改变一个人或一群人。首先，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社会本身就存在着影响者和被影响者之间的多重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放弃对他人施加影响，就意味着放弃社会行动，甚至放弃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正趋向于不存在”^[140]。即使从反权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健康的。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自然界），每个人都必须以最积极的方式干预他人的生活——在每个人的特殊本性允许的范围内，以最有力的方式进行干预——这是最高条件。拒绝这种相互影响，就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死亡。当我们要求大众获得自由时，我们并不打算取消任何个人或群体对他们施加的自然影响。^[141]

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影响必须来自我们试图赋予社会运动的特征。此前，在讨论社会运动和人民组织时，我们曾更详细地讨论过这些特征。因此，我们现在并不关心再次详述它们。我们只想再一次简要地指出，我们必须在社会运动中坚持的特征是什么。它们是：权力、阶级斗争、战斗性、自主性、直接行动、直接民主和革命观点。

社会运动必须是强大的，但不能陷入意识形态，因为将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强加于社会运动，“除了完全缺乏思想、目标和共同行动之外……必然会导致共同的无能”^[142]。他们应该以阶级斗争为导向，走阶级路线，即寻求被剥削阶级的广泛参与并支持阶级斗争；他们应该是战斗性的，通过社会力量的强加来建立自己的征服；他们应该相对于国家、政党、官僚工会、教会以及其他官僚和/或专制机构而言是自主的，可以自行决定并采取行动。

此外，他们必须使用直接行动作为政治行动的一种形式，与代议制民主相对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优先考虑人民组织的主导作用，争取尽可能少的调解，并确保必要的调解不会导致出现与相关人员分离的独立决策中心”^[143]。社会运动还必须使用直接民主作为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在横向集会中进行的，所有激进分子都能以平等的方式有效地做出决定。直接民主不给“任何形式的特权，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特权……并构成一个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成员的可召回性立即得到保障，因此，代议制民主所特有的习惯性政治不负责任现象在这里没有存在的空间”^[144]。最后是革命观点，它“应通过在社会运动的怀抱内外开展工作的革命者的不断努力而在社会运动中引入和发展，但这不可能是社会运动功能的自然和正常表现”^[145]。

无政府主义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嵌入是通过影响来实现的，它应该指向斗争的联系和人民组织的创建，以永久性地增强其社会力量。

无政府主义组织在开展社会工作和社会嵌入时应注意一些问题。

动员必须主要通过实践来进行，因为正是在斗争中，人民才会注意到他们能够赢得越来越多的胜利。这“比[工人]从他的同志那里得到的口头解释要好得多；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快就能认识到所有的事情，现在他的亲身经历已经与其他成员的亲身经历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了”^[146]。对我们来说，动员和影响的过程除了斗争的客观方面外，还要通过主观方面，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实践表明，要动员和影响社会运动，不仅要利用理性和目标方面，还要利用情感和主观方面，即在斗争中自然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友谊或关系。同样重要的是，要在邻里、社区、运动、工会等中找出对他人有影响力的人（面向基层并被他们认可的地方领导人），并将工作重点放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对于协助基层动员、发挥无政府主义影响力、甚至融入倾向团体都非常重要。通过这种方式，动员最终成为一种“转换”，需要注意的是：

……你只能改变那些感到需要改变的人，那些在本能中或在他们所处地位的苦难中，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已经拥有了他们想要给予的一切的人；你永远不会改变那些不感到需要任何改变的人，甚至不会改变那些希望离开他们所不满的地位，但由于其道德、

智力和社会习惯的性质而被迫在一个与你的想法不同的世界中寻求地位的人。[147]

在这一动员过程中，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无论如何都应始终以道德的方式行事，尽量不与社会运动建立等级关系或支配关系；讲真话，绝不欺骗人民，并始终支持与其他激进分子的团结和互助。同样，无政府主义者也应该有一种主张性的姿态，寻求建立运动，促使运动向前发展，而不仅仅是提出批判性的立场。

即使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立场并不占多数，也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阐明自己的主张。在与等级运动接触时，无政府主义组织应始终牢记，它感兴趣的始终是社会运动的基层。因此，对于任何类型的工作，组织都不应该接触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和掌握权力结构的人，而应该接触普通的积极分子，他们通常受到领导者的压迫，构成运动的边缘而非中心。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激进分子必须非常熟悉他们的工作环境，在他们建议开展社会工作的社会运动中保持持续的存在。对所处“地形”的了解对于了解政治力量的作用、谁是潜在盟友、谁是对手、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都至关重要。为了使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与社会运动中的其他积极分子充分融合，使他们得到认可、具有合法性、被倾听、被需要、受到欢迎，持续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在战略框架内，我们可以理解，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开展社会工作，因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人，我们必须煽动和鼓励他们（工人）进行斗争，并与他们一起斗争”^[148]。在煽动和鼓励人民的同时，我们必须寻求什么时候确认，确保社会运动以最自由和最平等的方式进行。有了对社会运动的社会嵌入，我们就必须把斗争联系起来，建立群众组织。这样，我们就能刺激社会力量的永久性增长，让被剥削阶级为社会革命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人民在道义上和物质上为这一必要的征用做好准备；我们的目标是在革命的鼓动给我们提供机会的情况下，尽可能多次地尝试和恢复这一尝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149]，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在其社会工作和嵌入方面的职能是成为“**社会斗争的引擎**”。“它既不取代社会斗争，也不代表社会斗争”^[150]。我们认为可以构建这样一个引擎，“首先在巴西、拉丁美洲，特别是在里约热内卢，激进地参与日常的群众运动斗争”。^[151]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理论的生产和再生产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理论的生产和再生产。我们将理论理解为“[一套]相互之间连贯衔接的概念……一种工具，[它]用来完成一项工作，用来生产我们需要生产的知识”^[152]。理论既是战略构思的基础，也是组织开展宣传的基础。战略旨在提高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工作效率，而宣传在推广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意义上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将这套连贯一致的概念——理论——理解为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以完成特定的工作。因此，“如果理论不能为我们提供对政治实践有用的新知识，那么它就是无用的”^[153]。

理论在无政府主义特定组织中产生时，将概念形式化，以便使组织：1) 理解其所处的现实，2) 对社会转型过程的目标做出预测，3) 确定将采取的行动，以便将这一过程付诸实践。我们称之为战略纲领，并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

在寻求对所处现实的理解时，理论会对信息和数据进行整理，将对所处历史时刻的理解以及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特征的定义正式化。也就是说，它对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所处的现实进行了全面的诊断。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除了一般的阅读之外，还要根据自己行动的地区进行思考；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采用不正确的方法论（“引进”其他时代和其他背景下的现成理论）。然而，对我们来说，理论并没有结束。正是通过它，无政府主义组织对社会转型打算在资本主义制度上打下烙印的目标做出了预测。今天，我们只能从理论的角度来思考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变革的革命进程，因为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

因此，理论组织了定义向未来社会转型的概念以及社会本身，这是特殊/专门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最终目标。理论还定义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应如何在其所处的现实中采取行动，以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我们今天所做的关于社会转型完整过程的反思都是理论上的反思，因为尽管已经付诸实践，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只是部分实现了过程开始阶段的步骤。其他步骤是未来的事情，今天也只能从理论上加以思考。

理论在宣传过程中也非常重要，因为要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就必须连贯地阐述各种概念。除了在实践中进行更广泛的宣传外，理论在其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理论被用于宣传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再现将过去正规化，其目的是深化意识形态层面，使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更加广为人知。它也可以与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通过理论材料的传播来解释我们对当前社会的批判、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以及社会转型的过程。同样重要的是，理论生产的目的是更新过时的意识形态方面，或寻求使意识形态适应具体和特殊的现实。理论宣传的整个过程是将人们聚集在我们事业周围的基础。产生和传播的理论越多，无政府主义在全社会的渗透就越容易。

我们知道，**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当我们在工作中使用正确而明确的概念时，实践就会更加有效。“如果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理论]路线，就不会有有效的政治实践”^[154]，组织的政治意愿就很有可能被削弱。

除此之外，我们并不认为无政府主义组织要采取行动，就必须先有一套深刻而成熟的理论。事实上，有些组织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大问题在于解决无政府主义理论，几乎是数学上的解决。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强调理论对于有效的实践非常重要，但我们并不认为在没有与实践进行具体和长期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的理论能结出任何有希望的果实。那些远离斗争或很少从事社会工作的知识分子——那些自以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理论并找到了理论问题的明确答案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理论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验证理论是否有用；实践必然会对理论有所贡献。我们并不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认为有了理论就一定会有高效的实践。如果这种理论不是在与实践充分和长期接触的情况下构建的，那么它的用处就会非常小。

当我们在本文的导言中以“要有效地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付诸实际行动”^[155]为小标题时，我们指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要想获得连贯而有效的理论成果，除了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理论成果之外，别无他法。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总是理论决定实践。我们认为，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从理论中实践，从实践中理论。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对我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化，那是因为我们在日常实践中对其进行了“检验”，验证了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哪些是当前的，哪些需要更新。我们知道，“在实践中，理论往往是另一回事”，这首先适用于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中，并不是所有已经产生或正在产生的理论都能为我们想要的实践服务。这也适用于意识形态含量较低的方面，如对形势的分析、对正在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的评估等，它们甚至可以是有趣的理论，但如果它们在实践中找不到连贯性，就不会为

我们服务。

我们对实践的重视赋予了社会工作和嵌入过程以绝对的重要性。它使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经受考验，让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好地思考其可能性和视野，更有计划性，脚踏实地地行动，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去生活。正因如此，社会工作和嵌入能让我们更精确地执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所有理论生产。

从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将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理论方式理解为不断地理论、实践、评估理论并在必要时重新制定理论、理论、实践，如此循环往复。

许多无政府主义组织将理论仅仅定义为对其所处现实的理解。这样，他们就把理论与意识形态分开了，第一种理论是“一套彼此连贯的概念”，只用于阐述我们所说的“战略的第一个问题”，即“我们身在何方”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可以归结为寻求对所处现实的更深刻理解。我们同意这一点。不过，我们认为，正如上文所述，理论还有助于回答战略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即“彼岸何在”；以及“何从此岸达彼岸”。

因此，在这一战略框架中，理论并不局限于第一个问题，还试图回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此外，这种与战略有关的理论必然包含意识形态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与意识形态尽管是不同的概念，但却不能截然分开。理论必然包含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也必然包含理论的内容。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根据对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在工作中实现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与理论的统一。这种统一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决策过程实现的，其目标是确定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理论和意识形态），这条路线必须指导该组织的所有活动和行动，而这些活动和行动“无论是在整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应与该组织确定的路线保持一致”^[156]。我们认为，不可能在工作中使用多种理论和意识形态概念，否则就会造成长期的冲突和低效的实践。缺乏这种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就会导致缺乏衔接，甚至在一系列概念中出现相互冲突的衔接，其结果就是不正确、混乱和/或低效的实践。

有了这条明确的政治路线，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行动，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大家都知道应该修改这条路线。如果理论和思想路线不明确，出现了问题，就很难知道需要修改什么。因此，只有明确了这条路线，组织才能在理论上得到发展。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宣传

无政府主义组织还致力于无政府主义宣传。“宣传不是，也不可能，而是不断地、不厌其烦地重复我们在各种生活环境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157]因此，我们把宣传理解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因此也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一项基本活动。宣传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无政府主义，吸引人们支持我们的事业。宣传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活动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活动。它应该以有组织的方式持续进行。

“组织的宣传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就像宣传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所有其他假设一样。”^[158]宣传要有力量，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偶尔一次的宣传不足以让人们了解无政府主义，更不足以吸引人们。因此，我们的第一点主张就是宣传必须持续不断。

除此以外，宣传不应孤立地进行，因为就像所有不协调的活动一样，它缺乏应有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组织——可以理解为实现目标而协调各种力量——会使个人工作的成果倍增，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宣传工作。当我们有了组织，我们的宣传工作——无论是理论宣传还是实践宣传——的成果就会成倍增加，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单个力量的简单总和。因此，我们提出的第二个论断是，宣传工作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因为这样才能取得成倍的效果。

随意的、孤立的宣传往往是为了鼓动自己的良知，或者仅仅是为了通过讨论来缓解激情，这样的宣传收效甚微，甚至一无所获。在群众所处的不一致和苦难的条件下，有那么多的力量反对他们，这种宣传在其努力积累并产生丰硕成果之前就被遗忘了。随意播下的种子要想发芽生根不能不考虑其所在的地理环境^[159]

我们认为，专门的/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持续的、有组织的宣传。首先，在理论、教育和/或文化领域，开展课程、讲座、辩论、会议、研究小组、网站、电子邮件、戏剧、公告、报纸、杂志、书籍、视频、音乐、图书馆、公共

活动、广播节目、电视节目、自由意志学校等。我们非常重视所有这些宣传，并认为这些宣传对于吸引人们、确保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建设性方案至关重要。这样，就有可能在人们心中形成反专制的价值观，激发他们的意识，使他们以更加批判的方式看待剥削和统治，从而寻求斗争和组织的替代方案。可以与这些人接触，加深他们的了解，让他们参与讨论，并组织他们采取行动。

这种大规模的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起到了社会“润滑剂”的作用，慢慢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文化，使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更容易进入社会。这种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会慢慢地改变人们的意识，使已经以文化形式传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更多的质疑，甚至减少复制。我们把意识理解为人们认识价值观和道德原则并加以运用的一种能力，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宣传活动对于意识的永久获得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消除偏见和资本主义文化，然后是让人们批判性地看待专制主义。最后，让其中一些人参与到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来。我们知道，任何像我们所建议的那样具有最终目标的社会变革进程，都将取决于大部分人是否接受，或者至少是“不拒绝”。而宣传，从理论、教育和/或文化的意义上讲，将为此做出重大贡献。因此，“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进行的宣传也是为未来社会做准备的一种表现方式：这是一种合作，目的是构建一种影响环境并改变其条件的方式”^[160]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这种宣传的局限性。

理论、教育和/或文化领域的宣传以提高意识水平为主要目标。因此，它旨在转变人们的观念。正因如此，我们看到这种宣传模式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意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统治会减少。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会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今天，主流媒体，甚至城市的发展、社区的分化等因素，都使得大规模的宣传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没有这些困难的时候，在无政府主义宣传非常强大的时候——有长期运作的文化中心、日发行量非常高的报纸——也不能保证社会转型。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我们在实现“群众性”宣传方面存在种种困难，意识的提高也不一定意味着组织和斗争，也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和统治的终结，甚至也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和统治的减少。我们可以说，在人人都有觉悟的假设情况下，我们仍将继续受到剥削和统治。因此，

……无论是作家、哲学家，还是他们的作品，甚至是社会主义报纸，都不构成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后者只有在明确的革命本能、集体意志和组织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存

在……——如果缺乏这种本能、意志和组织，世界上最好的书籍也不过是空洞的理论和无能的梦想。^[161]

因此，我们认为，除了在理论、教育和/或文化领域进行宣传外，我们还必须主要坚持在斗争和组织中进行宣传，即在社会工作中进行宣传，旨在社会嵌入。

通过在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范围内开展工作，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工作旨在以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来动员、组织和影响社会运动。我们始终牢记，无政府主义对运动的影响意味着要使它们具有我们所主张的特征：力量、阶级斗争观点、战斗性、自主性、直接行动、直接民主和革命观点。为了实现这种影响，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通过言语，主要是通过榜样来进行宣传^[162]。

我们把前面谈到的整个社会工作和嵌入过程理解为无政府主义组织应该开展的主要宣传工作。在斗争中，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是活跃的少数派，但他们创建社会运动，加入已有的运动，并尽可能地——总是以身作则——设法影响这些运动，使它们以最自由、最平等的方式运作。因此，这项工作就是：

进行自由教育，提高他们（工人）作为习惯于服从和被动的人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认识。因此，必须让人民自己行动起来，或者至少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出于本能和自我启发而行动起来的，尽管实际上是别人建议他们这样做的。^[163]

这样，无政府主义宣传就服务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整个工作过程，他们是社会运动中活跃的少数派，也是人民组织的实际创建者。

在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最有利于宣传的阵营。我们知道，最好的宣传是我们在形成阶级斗争的社会运动中实现的宣传。因此，在寻求短期利益的同时，在因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人们中间开展工作，我们认为有可能通过宣传播下我们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并将社会带入革命进程，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开辟道路。这并不是说其他选择不适合我们，而是我们必须始终思考“在哪里以及为谁进行宣传”。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政治教育、关系和资源管理

最后，我们将讨论一下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其他活动：政治教育、关系和资源管理。

政治教育是无政府主义组织运作的基础。在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政治层面上，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组织内激进分子的知识、理论和思想深度。它还为新战士提供支持，使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战士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尽可能小，从而使组织内部的高水平讨论不会受到这些差异的不利影响。一般来说，政治教育能促进组织的理论和思想发展，确保团结。对于专门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支持者激进分子来说，政治教育为理解其政治路线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政治层面的政治教育加深了对历史、当前和未来问题的认识，就像对其他意识形态潮流和社会运动的认识一样。政治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为激进分子开设的课程和培训书籍、教育研讨会、激进分子的自我教育等等。

在社会层面，在社会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组织也开展政治教育，促进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这种教育首先是为了动员人民。然后是教育基层激进分子，并给予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倾向团体。最后，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在倾向团体中行动的激进分子，并在思想上与他们产生共鸣，使他们融入无政府主义组织。这种社会层面的政治教育是激进分子政治化的基础。要使社会运动具有理想的特征，并使其指向人民组织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尽可能地使激进分子政治化，而政治教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际上，这种社会层面的政治教育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深化历史、当前和未来问题以及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运动知识；社会教育书籍和课程；讲座和辩论等等。

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政治教育在整个运动中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关系也很重要，同样分为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

在政治层面，无政府主义组织寻求与各地的组织、团体和个人建立联系，从而促进其实践。这种关系可能是有机的，也可能是正式的。无论哪种方式，重要的是要有合作伙伴，并以汇集不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大型联盟组织为目标。在社会层面上，它寻求了解社会运动并与之建立联系，或多或少地将自己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甚至与其他组织，如大学、委员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人权和生态组织等建立联系。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资源管理是通过自立项目进行的，这些项目由激进分子自己、其他人或甚至通过合作社等倡议筹集资金，是维持无政府主义组织及其所有活动的根本。虽然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逻辑，但当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中时，我们就必须为实现我们的活动筹集和管理资金。这些资金非常重要：用于开展社会工作（运送激进分子等）；用于购买书籍；用于印刷宣传材料（小册子、报纸、书籍、视频等）；用于组织结构（维护空间等）；用于旅行和其他活动。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与社会运动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区别。我们打算更详细地阐述一下我们对这两个层面的理解、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尤其是我们认为这两个层面能够相互联系的方式。

对我们来说，社会层面是社会运动发展的范围，我们必须在这一范围内寻求建立和增强人民组织的社会力量。社会层面以社会运动为主要行动者，但并不局限于社会运动。在这个层面上，当我们处理社会运动时，我们强调社会运动不应该与意识形态相适应，而应该围绕需要、共同的具体事业而形成。它们必须围绕具体而务实的问题组织起来，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设法改善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条件。社会运动可以组织起来，围绕土地、住房、工作等问题展开斗争，保护工人不受老板的侵害，要求改善社区，倡导许多其他问题。在这些运动中，必须包括所有对围绕这些问题开展的斗争感兴趣的人，以及如果斗争取得胜利将会从中受益的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社会运动越是组织起来，越是具备所需的特征（权力、阶级斗争、战斗性、自治、直接行动、直接民主和革命观点），它们就越能建立起群众组织，并永久性地增强其社会力量。我们明白，只有各种社会运动汇聚在人民组织的建设中，我们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和国家，通过社会革命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层面是我们打算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最重要的层面，没有社会层面，你所想到的任何变革除了产生新的剥削者阶级之外，可能都不会产生其他结果。因此，社会层面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角。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社会层面固有的一些特征最终使社会转型（社会运动——>人民组织——>社会革命——>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过程变得复杂。首先，由于与社会运动相互作用的各种政治力量以及社会运动本身，往往导致它们不具备实现这一转变过程所需的特征。

社会运动中的专制力量造成了许多困难：有的组织试图将运动意识形态化，导致运动软

弱无力；有的组织试图驾驭运动，导致运动为自己的目的（与运动的目的不同）运作；有的运动不寻求被剥削阶级的参与，最终成为脱离基层的“先锋队”；有的运动只在政府和资本家的帮助下运作；有的运动完全与政客、政党和其他专制团体捆绑在一起；有的运动希望选举候选人，只通过代议制民主参与政治；有的运动支持等级关系，即领导层决定，基层只服从；有的运动是改良主义运动；有的运动孤立无援，不愿与其他运动联系；有的运动不提供理论和形势分析，等等。

其他困难来自社会运动的实际运作。由于社会运动总是围绕着短期斗争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的最终目标很有可能只是在这些斗争中取得胜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许多社会运动就会变成改良主义运动，即以调整或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短期的斗争会使社会运动与革命斗争拉开距离。此外，由于这些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发形成的，因此不可否认，开展任何长期斗争都会遇到组织上的困难。“因此，自发性、群众的自发动员、积累起来的未解决的问题的反响，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和利用，就很难在改变权力关系方面超越政治层面”。^[164]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运动仍然会受到形势变化的影响，它们有时也会导致复员。这些退潮的过程也往往使他们在斗争中失去积累和学习。

也就是说，如果一方面社会层面应该是社会转型的主角，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的实现又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的理解是，这种变革将是政治层面对社会层面进行补充的结果。

政治层面是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发展的范围。与社会层面不同，政治层面是意识形态层面；是无政府主义层面。“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问题，只能在政治层面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而这需要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革命的政治组织**”。^[165]

这个政治层面必须与社会层面相互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就无法实现所期望的社会变革。因此，政治层面绝对需要社会层面，正如我们所说，社会层面是社会变革的主角。

无论是还是长期斗争，都不可能背离或远离群众。政治组织在组织和思想发展方面引导群众的自发倾向，始终起着绝对主要的作用。你不可能在旁观者或不顾人民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如果没有至少一大部分人的最初支持，就更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166]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旨在将革命政治付诸实践，构想实现最终目标（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手段，并始终以战略路线为基础采取行动。为此，无政府主义组织作为活跃的少数派，协调意识形态战斗活动，为社会层面的斗争提供催化。这一政治层面的主要活动是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互动时开展的社会工作。在这种互动中，政治层面试图尽可能地影响社会层面，使之以最自由、最平等的方式运作。我们已经看到，这可以直接发生在无政府主义组织与社会运动之间，也可以通过倾向团体来实现。从政治层面实现这一点（哪怕是部分实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可以说它实现了社会嵌入。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社会嵌入，才有可能建立起群众组织，并增强其社会力量，从而实现最终目标。因此，对我们来说，政治层面需要社会层面，社会层面也需要政治层面。

因此，有必要开展意识形态解释活动（并具备必要的要素），这种活动与其他层面的斗争（经济、军事等）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活动，显然不是指“灌输论”(*educationalist*)的意识形态说教，后者或多或少专指革命“理论”的传播，尽管我们要说明，这也有其重要性。意识形态活动不仅仅是传播理论知识。事实和实际的政治实践是整合革命意识的要素和关键因素……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结果是向人民展示胜利的前景、希望之旅以及对深刻革命变革可能性的信心……而这种“揭示”功能……是政治上有组织的少数人的功能，其意识形态水平无法在群众的自发实践中产生。这种意识形态水平意味着要克服自发性。^[167]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因为，政治层面在社会嵌入的影响过程中，试图赋予社会层面所期望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是社会层面所缺乏的——有些是由于专制政治力量的影响，有些则是由于社会层面自身的运作。

在与社会层面的互动中，政治层面应该为使运动不受意识形态的驱使而斗争；避免所有专制主义者的负面影响，防止他们利用社会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让被剥削阶级尽可能多地参与斗争进程，使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主角； 确保社会运动不依靠统治阶级的恩惠和援助生存，而是通过武力进行征服； 确保社会运动不与政客、政党和其他专制团体挂钩；确保社会运动不寻求在议会系统中选举代表，而是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 让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以最民主的方式讨论和审议所有问题；没有等级之分；社会运动利用其短期收益来建

立长期的革命计划；社会运动连接并建立群众组织；协助理论的阐述和生产以及对形势的必要分析；将自发性转化为组织性；在退潮的情况下，不失去斗争的积累和学习。

社会层面的特点是起伏较大，因为与政治层面相比，社会层面与形势的关系变化更大。因此，政治层面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确保在社会层面出现起伏（甚至是波动）时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斗争的积累。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政治组织也是积累国内和国际人民斗争经验的场所。这一实例可以防止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的知识被稀释”。^[168]在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特殊/专门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作用是**推动社会运动**。在退潮时期，它的作用是“**保持火焰燃烧**”，或**等待和准备新的行动机会**。

无政府主义并不渴望征服政治权力、专政。它的主要愿望是帮助群众走上真正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仅仅让群众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是不够的。还必须坚持革命的这一方向及其目标：以自由工人社会 (*society of free workers*) 的名义镇压资本主义社会。^[169]

因此，政治层面影响社会层面的过程就是为了确保社会层面具备所需的特征。如果这些特征已经存在，那么政治层面只是伴随；如果这些特征不存在，政治层面就会努力使其存在。

当我们把政治层面定义为**积极少数派的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 (*specific anarchist organisation of active minority*) 时，我们正在寻求一种与**专制先锋组织** (*authoritarian vanguard organisation*) 相反的含义。专制主义者虽然也提出了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区别，但他们认为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存在着等级和统治关系。因此，政治层面（专制党派）内部的等级制度和支配关系在其与社会层面的关系中再现。同样，专制主义者也理解意识的再生产，意识与政治层面的等级制度和支配关系共同作用，在他们的理解中，意识必须从政治层面进入社会层面，从“有意识”进入“无意识”。这就是政治层面对社会层面的等级和支配关系的运作方式。这种关系不是双向的，从政治层面到社会层面，反之亦然，而是单向的，只有政治层面到社会层面——最终成为政治思想的传输带。专制思想就是一个例子，它支持先锋队作为照亮人民道路的光束。在黑暗中，社会层面将依赖于政治层面的光明。我们从各种历史实例中了解到，在这种政治层面为社会而战的关系中，政治层面获得了特权地位。

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不解放人民，我们希望人民解放自己。我们不相信从上而下、以武力强加的美好；我们希望新的社会生活模式从人民的腹中涌出，与人类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并且能够随着人民的进步而进步。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所有的利益和观点都能在有意识的组织中得到伸张，并根据其重要性对集体生活产生影响。^[170]

对于任何一个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来说，社会和政治层面之间的关系必然意味着要认真讨论道德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假定：“无政府主义革命阵线将尊重支持它的强有力的原则，在尊重观点多元化和目标一致性的基础上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171]。

正是通过伦理，也只有通过伦理，无政府主义组织才不会成为一个专制（即使是革命）的政党。与所有其他意识形态不同，无政府主义的伦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关系上有着独特的立场。因此，对于任何希望与社会运动合作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来说，伦理都是绝对的核心。与先锋组织不同的是，政治层面的组织是积极的少数派，他们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与社会层面没有等级关系，也没有支配关系。对我们来说，正如我们所强调的，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辩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层面是社会层面的补充，社会层面也是政治层面的补充。

与专制主义者的观点相反，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发挥作用的水平主义伦理在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中得以重现。在与社会层面接触时，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遵循伦理行事，不寻求特权地位，不强加自己的意志，不支配、不欺骗、不疏远，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为社会运动而战，也不在社会运动面前战斗。它与社会运动一起斗争，甚至不超越社会运动的意图一步。

我们知道，从政治层面的伦理角度来看，没有不被集体点燃的火焰；没有前进，照亮人民的道路，而人民自己却在黑暗中落后。积极的少数派的目标是，用伦理（承诺）来激励，并肩作战，在需要和要求的时候给予声援。因此，与先锋队不同，积极的少数派是合法的。

支持社会运动的个人申请应取决于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人的态度。支持者，甚至是合法组织的积极分子，必须证明他们愿意倾听，而不是空谈。他们必须了解组成其行动

的特定社会运动的自然成员的生活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即一个组织）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与该组织共同成长，而不是以专制和垂直的方式确定其发展道路和形态。重要的是要记住，集体建设的过程始终是，而且首先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团体的正确准则得到遵守，支持者或激进分子才会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将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团体的现实相对照，而不是试图将社会运动简化为他们意识形态的确定性。^[172]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某种“草根主义/民粹主义”，认为社会运动所主张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运动所具有的特征与我们所希望的不同，更糟糕的是：它们不时地向右转移，维护资本主义甚至独裁的立场，就像法西斯主义那样。因此，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站在社会运动的前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我们应该站在社会运动的后面，追随他们的所有愿望。我们希望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当看到他们与我们认为对社会变革计划最正确的立场相去甚远时，我们就会在内部进行斗争，并试图影响他们，使其具有我们已经解释过的特征。

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群众永远是正确的，也不是说我们希望永远跟随他们的情绪变化。我们有一个纲领，一个要取得胜利的理想，这就是我们区别于群众、成为党人的原因。我们要根据它采取行动，推动它走上我们认为最好的道路，但由于我们的目标是解放而不是统治，我们要让它习惯于自由的主动性和自由的行动。^[173]

除此之外，与专制主义者相反，对我们来说，社会层面会影响政治层面，而且必须始终影响政治层面。也就是说，政治层面通过将其意识形态与社会层面的实践相比较，也会对无政府主义组织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认为，政治层面只有在与社会层面的实践接触之后，才有可能构想出一致的革命战略。因此，我们认为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双向联系对政治层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认为，在社会革命得到巩固和保障、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发挥作用之前，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之间的这种划分是必要的。届时，政治层面应融入社会层面。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战略、战术和纲领的必要性

专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制定战略。我们可以通过回答三个问题来定义战略：1.) 我们在哪里？2.) 我们想去哪里？3.) 我们认为如何才能离开我们所处的位置，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因此，**战略是对当前形势的诊断、对想要达到的目标的构想以及旨在改变当前形势、使其达到理想状态的一系列行动的理论表述**。我们还可以说，“我们把战略理解为一系列要素，它们以系统和连贯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指向伟大的最终目标……并将最终目标与具体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174]。

制定我们的社会转型战略正是我们在本文中要完成的任务。首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反思，描绘资本主义和国家，它们是统治和剥削社会的主体；然后，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反思，努力构想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最后，反思第三个问题，提出通过社会运动进行社会转型的建议，这些社会运动构成了人民组织，并与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不断互动。所有这一切都要优先考虑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所有这些理论材料的构思背后都有一个战略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战略被用来构思对当前社会进行社会转型的建议，力图将其引向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我们称之为永久战略；一种为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而制定的非常广泛的战略。

战略的构想也可以不那么宽泛，甚至是有限制的。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甚至是其激进分子旨在开展的任何行动，都可以从战略角度进行构思。例如，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阵线可以设想其工作“回应”上述三个问题：1.) 今天，我们没有加入某个社区的社区运动，而该社区正在蓬勃发展，我们认为可以在那里开展良好的工作。2) 我们希望在一年内能够定期开展社会工作，并加入一些活动。3.) 因此，我们将尝试接近这一运动，更近距离地了解它，并开始长期的社会工作实践，寻求社会嵌入。

同样，激进分子也可以提出政治自我教育的建议，同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 我在某个理论问题上存在缺陷，我认为这妨碍了我的战斗力。2.) 我希望在六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将为我的激进主义开辟更多的可能性。3.) 为此，我将首先与组织中经验更

丰富的同志交流，请他们指导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然后我将阅读所有材料，并提议与其他同志进行辩论，最后，我将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提交给组织，让同志们发表意见。

总之，组织中的每一件事，从最复杂到最简单，都可以而且应该有策略地进行。

在特殊/专门无政府主义组织中，战略制定问题的处理方法如下。应该始终对战略进行广泛讨论，包括上述三个问题。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应设法对其所处的现实进行诊断，制定最终的长期目标，最重要的是，确定不同时期和周期的斗争，每个时期和周期都有各自的目标。这条（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宏观”路线被称为战略，而宏伟目标（被称为）战略目标。然后，战略在更“微观”的路线（即战术）中被细化，战术决定了短期目标以及激进分子或激进分子团体为实现短期战术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显然，战术目标的实现应有助于接近甚至实现战略目标。

组织的战略战术路线确定后，行动计划也随之确定，每个激进分子都有明确的职能和要实现的明确目标。重要的是要设定完成行动的期限，并在每个阶段或周期结束时对结果进行评估。这些评估是通过对活动进展情况的评价来完成的，评估活动是否朝着我们想象的方向发展，我们是否在某些事情上做错了。总之，我们要看我们是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还是在远离目标。如果是前者，我们就会纠正错误，做出调整，并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前进。如果是后者，我们就改变战术行动，最终改变战略，在一定时间内再次执行相同的过程。正是这种前进、评估、追求、再评估等过程，使组织在战略上不断前进，在斗争中正确前进。因此、

……战略只提供一个时期的总体路线。将战略转化为行动的是具体体现在当前现实中的战术。由于战术方案是针对更精确、更具体、更直接的问题而制定的，因此可以更加多样、更加灵活。但是，它们不能与战略相矛盾。正如我们所说的，适当的战略战术构想必须考虑到实际情况及其所处的时期。^[175]

在对所处现实的判断和目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战略也应保持不变。“如果总体形势发

生了重大变化，就会改变组织的工作条件，如果组织想要有效地行动，就必须修改战略，以适应新的形势”。目标也是如此。如果目标发生变化，例如在革命后的形势下，战略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既要了解我们所处的实际情况，又要制定清晰明确的目标，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也是制定战略的基本要素，因为“在政治上，如果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目标，就不可能有诚实有益的实践”^[177]。对我们打算改造的当前社会的诊断以及“我们希望通过意愿或必然达到的目的”已经确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是根据具体情况找到能以最经济的方式更安全地达到预定目的的手段”^[178]。

战略路线正式成为指导该组织及其战士一切行动的纲领。“你们决不能放弃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已明确确立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因此，我们认为：

战略必须体现在行动纲领中，为一个时期或阶段确定总的指导方针。纲领必须植根于我们社会各阶层的现实。如果我们的战略不能与构成行动阶段的各种不同情况下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流畅的接触，那么它就无法前进和发展。^[180]

也就是说，战略方针的确立并正式纳入纲领，必须与实践相联系，使理论与知识相结合。这种联系也将使战略在战术上得以正确实施。纲领：

……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中所有激进分子的共同纲领……纲领并不是一套次要的东西，它可以将想法相似的人组合在一起（或者，往往不会将他们分开），而是一套分析和方案，只有那些相信它并选择传播这项工作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人才会采用。

^[181]

专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通过该纲领公布其社会变革战略方案。在指导该组织激进分子行动的同时，它也为其他不属于该组织的人标明了该组织的立场，将这套分析和方案公之于众。

这套战略、战术和方案为组织提供了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取得最佳效果。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都离不开纲领。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战略构想不可避免地包含意识形态成分。意识形态：

是政治行动的基本动力，也是任何战略的必然组成部分。每一种政治实践都有一定的动机和方向，而只有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地将其组织为意识形态，才能使人们清楚地辨别出这种动机和方向。^[182]

但是，我们不能混淆意识形态和战略。与意识形态相比，战略要灵活得多，因为它会根据社会背景和当前形势而变化。因此，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可能会有不同的战略，因为每个组织都在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情况下运作。说到战术，这更是一个真理。由于每个地方的社会构成不同，政治力量、政府立场、反动势力等也不同，在不同的背景和情境下，自然会采用不同的策略来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实践。例如，在有些地方和背景下，值得考虑将工团主义作为社会工作的空间，而在另一些地方和背景下则不值得考虑，等等。

我们之前说过，专门无政府主义组织应该在战略和战术上保持一致，这可以通过上文所述的决策过程来实现，即寻求共识，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选择投票，多数人获胜。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中的所有激进分子都必须服从获胜者的立场。与其他任何决策过程一样，问题被明确提出、辩论，并试图调和不同的观点。如果无法调和，组织必须总结主要建议并进行表决。这样，组织通过协商一致或投票的方式，决定对三个战略问题的答案。组织制定战术战略路线，每个人都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组织会定期评估这条路线，并重新制定。

我们强调，所有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意思。然而，在确定了优先事项和责任之后，每个战士都不能随心所欲。每个人都对组织负有义务，必须完成他们承诺的任务和被确定为优先事项的任务。显然，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我们必须始终努力协调每个人喜欢做的活动与组织规定的责任，但我们并不总是只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专门/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模式意味着，激进分子必须做他们不太喜欢的事情，或者停止做他们喜欢的某些事情。这是为了确保组织在战略上取得进展。按照战略推进使无政府主义组织成为一个连贯、有效的组织；一个致力于严肃、坚定的战斗性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激进分子做他们确定为优先事项的事情，并致力于以最有效的方式为巩固其战略目标做出贡

献的任务。许多无政府主义团体和组织采取不同的行动，有向左的，也有向右的，但都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共同的整体做贡献，这种相对常见的做法是不被接受的。与这种模式相反，有战略的实践：

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孤立地估计出现的一切，更不是因为进展不明显而气馁。它涉及设定目标并朝着目标前进。选择行动并确定优先次序，以支持这些目标。这显然意味着会有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活动，我们没有参与的事件。这些活动可能是重要的，甚至是壮观的，但如果不符合我们计划阶段的建议，它们就不算数。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将在符合我们目标的活动中处于绝对少数，或面临重大的复杂情况。选择我们最喜欢的活动或带来较少麻烦的活动是不正确的政治^[183]。

回到投票决定战略的问题上来，有必要说明的是，参与讨论的是组织，而不是某个人。因此，当一个战略问题通过投票决定时，无论每个人的投票结果如何，组织中的所有激进分子都有义务遵循集体确定的立场。这是我们所倡导的组织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立场，因为集体确定的立场不是建议，而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战略路线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组织意味着以共同的目标协调各种力量，并有义务不推动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的行动”^[184]。我们必须强调，加入一个组织的自由等同于脱离一个组织的自由，如果个人或少数人经常感到被多数人的决定所忽视，他们有分裂的自由。必须强调的是，战略决策，即使是通过投票做出的，也是集体决策，而不是组织内部的个人争议。

从战略意义上讲，这种团结将使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划船，并能使战斗力的成果倍增。这样，每个人都能对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以及如何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取得进展有一个相似的解读。

Especifismo：无政府主义组织、历史观点和影响

由于缺乏明显的、正常的并为每个成员所接受的组织，因此有可能建立起任意的、不那么自由意志的组织。

——路易吉·法布里(Luigi Fabbri)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especifismo”(特殊主义或特定主义)一词出现在巴西以来，围绕着这个词出现了一系列争论甚至混淆。过去有人说 especifismo 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们指责 especifista 组织是列宁主义党建论，等等。当我们把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RJ)定义为一个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时，我们更多的是在寻求在关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讨论中确定我们所支持的立场是什么。

特定主义 (especifismo)一词是由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Federación Anarquista Uruguaya - FAU*) 创造的，通过它，我们指的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概念，它有两个基本轴心：组织和社会工作/嵌入。这两个轴心是以无政府主义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不同行动（巴枯宁主义概念）和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马拉泰斯坦概念）这两个经典概念为基础的。因此，especifismo 一词除了是新近提出的概念外，还指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实践。除了这两个轴心之外，especifismo 中还定义了一系列其他组织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加以阐述。因此，especifismo 的两大经典参考文献是巴枯宁和马拉泰斯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其他重要的理论家，如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了他们的许多理论参考资料——但我们认为，对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讨论，巴枯宁和马拉泰斯塔的建议更适合我们的工作。

在下面的段落中，我们打算简要回顾一下我们在全文中，尤其是在最后一章中进行的一些讨论，并将它们与无政府主义中存在的其他立场进行定位和比较。我们认为，除了肯定我们所主张的立场——也就是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事情——之外，我们还应该对无政府主义中存在的其他组织（或无组织）概念进行一些兄弟般的批评，并根据一些选定的观点，将我们

的概念与其他概念进行比较。

与 *especifista* 组织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或许是我们所说的综合模式或综合主义 (*synthesis model, or synthesis*)。塞巴斯蒂昂·富尔 (Sebastien Faure) 和沃林 (Volin) 分别在两份名为《无政府主义综合》(*The Anarchist Synthesis*)的同名文件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正式阐述。在历史上和全球范围内，正是工人事业小组 (Dielo Trouda) 的《平台》(*Platform*) 确立了这一对比。我们打算继续参与这场关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辩论，尽管在我们看来，“**特定主义”**(*especifismo*) 比 “**平台主义”**(*Platformism*) 更为宽泛——尽管“平台主义”(后者) 具有重大影响。

综合模式主张一种无政府主义组织模式，其中包含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等），因此，它呈现出我们在下文中批评的许多特征。我们知道，其中一些特征与综合主义组织模式并无必然联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许多特征在这类组织中都有体现，主要是受个人主义的影响，但不仅限于此。我们认识到，在综合主义组织中也有致力于社会无政府主义的严肃激进分子，因此，我们不希望批评显得过于笼统。尽管我们从未质疑过这些组织是否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对我们来说，它们都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与我们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理解并不一致。

首先，在本文中，当我们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讨论 “**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specific anarchist organisation*) 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它们都不是 *especifista*。因此，*especifismo* 的含义远不止倡导无政府主义组织。

第一个区别在于对无政府主义本身的理解。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我们将无政府主义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即“一套与行动——我们称之为政治实践——有直接联系的思想、动机、愿望、价值观、概念结构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将对无政府主义的这种理解与另一种理解区分开来，后者纯粹是抽象和理论性的，只鼓励自由思考，不一定构想出社会变革的模式。仅从这种批判性观察生活的模式来思考无政府主义，它提供了一种审美自由和无尽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是这样构想的话，它并没有提供社会变革的真正可能性，因为它没有付诸实践，没有付诸行动。它没有寻求最终目标的政治实践。

Especifismo 主张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构想一种表现模式，通过社会革命将当今社会转变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将被剥削阶级组织成一个

人民组织，并要求使用暴力，主要是作为对现行制度暴力的回应。其他无政府主义思潮则反对暴力，认为社会变革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组织问题。对我们来说，组织绝对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构想出任何以实现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严肃的政治项目。

有些无政府主义思潮支持“反组织”(*anti-organisational*)甚至是自发主义的立场，认为任何形式的组织都是专制的，都是对无政府主义的反感。对这些思潮来说，成立一个办公室来协调集会就是专制的。无论如何，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斗争必须自发进行。如果有收获，也必须是自发的。斗争之间的联系必须是自发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和国家，如果被推翻，也是通过自发的动员完成的。也许，即使在最终的社会革命之后，事情也会自行发展，毫不费力地步入正轨。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事先组织是不必要的，还有人认为事先组织甚至是不可取的。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捍卫这些观点，他们愿意从事社会工作，却无法与专制力量打交道，在没有适当组织的情况下，最终沦为专制项目的劳工和“袖子”，或者因为无法在社会运动中获得空间而沮丧地离开。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我们将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视为活跃的少数派组织。因此，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聚集在一起，在社会层面上开展主要活动。在 *especifista* 模式中，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活动必然存在这种差异。

不同的是，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组织是一个广泛的团体，它联合了所有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是实现完全自主行动的汇聚空间。广而言之，在无政府主义中，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这种划分并没有被所有的思潮所接受，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理解是分散的，它可以是一个社会运动、一个组织、一个亲和团体、一个研究小组、一个社区、一个合作社等等。

甚至**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这一概念也曾在不同时期试图压制活动层次之间的这种差异，将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与工会主义混为一谈。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些以及其他将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化的尝试，- 这既削弱了社会运动（不再围绕土地、住房、就业等具体问题开展活动），也削弱了无政府主义本身，因为它不允许深化社会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它还会削弱社会运动，因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实现将社会运动中的所有激

进分子都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除非他们大幅削减和削弱社会运动。这样一来，甚至在看到社会运动中自然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但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时，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会感到沮丧，往往会对斗争退避三舍。因此，无政府主义往往局限于自身。

活跃的少数派无政府主义组织常常被其他无政府主义思潮理解为类似于独裁的先锋组织。正如我们已经明确指出的，当我们设想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分离时，并不是说我们希望走在社会运动的前面，也不是说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有任何等级或支配关系。

在实践无政府主义的首选空间方面也存在差异。我们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个空间就是阶级斗争。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不仅生活在社会中，而且生活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阶级的差异，我们似乎都无法否认，统治和剥削发生在我们社会的不同层面，而经济因素对此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无政府主义诞生于人民之中，这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应有之义，它的明确立场是支持在阶级斗争中处于长期冲突中的被剥削阶级。因此，当我们谈到“在哪里播撒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时，对我们来说，很明显，它必须在阶级斗争中，在资本主义矛盾最明显最突出的地方。

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支持无政府主义的这种阶级斗争倾向，更有甚者，还有人指责无政府主义是援助主义，{3}或想要“为穷人道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大多否认阶级斗争，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没有考虑到当今社会，因此可以说阶级已不复存在，或者说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我们从根本上不同意这些观点，我们认为，无论我们如何定义阶级，无论我们是更强调还是更不强调经济特征，等等。- 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背景和情况下，人们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更大。正是在这些背景和情况下，我们要优先考虑我们的工作。

当我们试图将无政府主义应用于阶级斗争时，我们坚持我们所说的社会工作，我们在前面将其定义为“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阶级斗争中开展的活动，使无政府主义与被剥削阶级产生互动”。我们也说过，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主要活动。我们认为，通过社会工作，无政府主义组织应寻求社会嵌入，即“通过无政府主义实践影响社会运动的过程”。

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为这项旨在社会嵌入的工作辩护。一部分人认为这不是当务之急，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专制的，这就比较复杂了。对于那些认为社会工作/社会嵌入不是当务之急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似乎其他活动对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会更有效——然而，

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说明。此外，至少从表面上看，由于没有制定战略，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实践中寻求的是宣传工作，非常局限于出版物、活动和文化。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这种宣传对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缺乏社会工作和嵌入的支持，这种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有了这种支持，宣传就会更加有效。因此，宣传，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教育/文化以及与社会运动的斗争。

无政府主义者不认为社会工作/嵌入是，也不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他们更喜欢在其他媒介上工作，远离阶级斗争，远离社会运动，远离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有些人说，作为社会成员，他们已经有了社会融入。他们往往成为宗派主义者，只与同龄人相处，将无政府主义“贫民窟化”。这就解释了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宗派主义，而这种情况在专门组织中所占比例要小得多。

比上述立场复杂得多的是反对社会工作和嵌入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立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由于他们往往不是穷人，他们往往不参与社会运动（例如，他们不是无地者），因此与贫困社区甚至社会运动合作是专制的，因为“他们来自这个现实之外”。对他们来说，一个有地方住的人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斗争是专制的；经常参加社区运动而不是来自社区是专制的；如果你不是流浪汉，支持他们的斗争也是专制的。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只有当你是“群众”，并且是运动现实的一部分时，与民众运动合作才具有合法性。由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通常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他们既不接近社会运动，也不接近阶级斗争。他们最终把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变成了“运动本身”，其特点是基本上属于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不寻求与社会和群众斗争接触，不与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接触。事实上，这种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在不寻求社会工作和嵌入时，必然会有两种结局。要么放弃社会变革的建议，要么把自己变成一个为人民而不是与人民一起战斗的团体——承担先锋而不是积极的少数派的地位。

对这些激进分子来说，社会工作常常被比作专制左派的“打入主义”——人们进入社会运动，使其对自己有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主张自发性，因为“从外部进入”、“将无政府主义纳入社会运动”是专制的。他们认为，思想应该自发产生。他们谴责讨论、劝说、说服、交流和影响，认为这些都是社会运动之外的，因此是专制的。

我们特定主义者 (especifistas) 也从根本上不同意这种反对社会工作和嵌入的立场。正如我们所解释的，对我们来说，无政府主义不应局限于自身，也不应回避社会运动和不同

意识形态的人。它应该像催化剂一样作为一种工具，作为我们时代斗争的动力。为此，无政府主义不应躲躲藏藏，而应直面现实，寻求变革。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向皈依者说教”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与非无政府主义者互动。

我们知道，阶级不是由出身决定的，而是由你在阶级斗争中所主张的立场决定的。因此，我们认为，支持社会运动，协助与你所处的现实不同的动员和组织，是任何致力于终结阶级社会的激进分子的道德义务。最后，我们认为，社会工作为无政府主义带来了必要的实践，对组织的理论和思想路线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这项活动对我们的理论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还能了解现实和无政府主义在斗争中的实际应用。没有社会工作的团体和组织往往会产生一种在实践中得不到支持的言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会出现极端激进和革命的言论——经常指责他人是改良主义者等。- 但这并没有超越理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especifismo 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是统一的，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是一致的。这条政治路线是集体制定的，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遵守它。由于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是非常宽泛的东西，具有非常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立场，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所有这些立场之间提炼出一条由该组织倡导和发展的思想理论路线。正如我们所强调的，这条路线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因为我们相信“要有效地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采取行动”。

对于不主张这种统一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主义组织可以采用不同的思想和理论路线。每个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团体都可能有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解释和自己的理论。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出现各种冲突和分裂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应该与社会运动合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专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些人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功能是增强个人的自我，而另一些人则坚决反对，等等。对我们来说，如果不能在一些“初始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实践，甚至无法组建组织。在没有思想和理论统一的组织中，是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在最简单的问题上都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最复杂的问题甚至都不会被讨论。巴枯宁说得好：“包容得多，团结得少”（“*who embraces much, tightens little*”）^[185]。重要的是：

要知道，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在这一点上的分歧要比一般人认为的深得多，这同样意味着不可调和的理论分歧。我这样说是为了回应我的好朋友们，他们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达成

一致，声称：“我们不应该制造方法问题！思想是唯一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团结一致，而不应该因为战术上的小小分歧而分崩离析”。相反，我早就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分裂，因为我们有意识地接近。在三四种思想——废除国家、废除私有制、革命、反议会主义——的共同体的表面掩盖下，每一种理论声明的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使我们无法在不起诉我们和不相互抵消我们的情况下走上同一条道路，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在不放弃我们所相信的真理的情况下保持和平。我再说一遍：这不仅是方法上的差异，更是观念上的巨大差异。^[186]

除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统一，特定主义者还主张战略和战术上的统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战略行动意味着要考虑到组织所采取的所有实际行动的项目，力求确认自己的位置、目标和方式。无政府主义将战略和战术统一起来，使规划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一致性成为组织的强大支柱。这是因为我们认为，缺乏战略会分散努力，导致许多努力付诸东流。我们提倡集体讨论前进方向的模式，并根据这一路径确定优先事项和分配给激进分子的责任。这些优先事项和责任意味着，每个人都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个人都对组织负有义务，必须完成他们承担的任务和被确定为优先事项的任务。显然，我们要努力使每个人喜欢做的活动与组织确定的优先事项相协调，但我们并不总是只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特别模式意味着我们必须做一些我们不太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停止做一些我们非常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组织按照战略行事，每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划船。

我们严厉批评那些不按战略行事的组织。对我们来说，在一个组织中，每个激进分子或团体都在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情，或者仅仅是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共同的整体做贡献，这样的组织是不可能开展工作的。一般来说，当各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在一个组织中时，如果没有战略上的亲密关系，就无法就如何行动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不可能确定行动方式，只有一个共识：事情必须继续下去。

一个团体认为自己应作为社会运动中的一个具体组织行事，而另一个团体则认为应优先考虑朋友间的社会交往、集体治疗，甚至是个人的崇高，并认为社会运动工作是专制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或独裁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构想一个组织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处理这些分歧，有两种方法：要么讨论问题，在争吵和压力中生活，这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要么干脆不触及这些问题。大多数此类组织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为了在行动中建立一定程度的协调，我认为，为了在趋向同一目标的人们之间建立必要的协调，必须规定一些条件：一些将每个人与所有人联系起来的规则，一些经常修订的约定和协议——如果缺少了这一切，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工作，较认真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一些人的努力会被其他人的努力所抵消。这将导致不和谐，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与宁静的信心。^[187]

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统一以及战略和战术上的统一是通过具体组织所采取的集体决策过程来实现的，这一过程就是试图达成共识，如果不可能达成共识，就通过投票——多数获胜。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组织都会通过获胜的决定。与此不同的是，有些组织只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往往允许一个人或其他人对涉及更多人员的决策过程施加更大的影响。这些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共识，害怕分裂，允许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在决策中拥有过大的权重，只为达成共识。有时，为了寻求共识，他们会花上几个小时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必须牢记，决策过程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每个人都有义务遵循同一条道路（这是 *especifismo* 的规则），这是组织对其战略的承诺，因为如果每次做出的决定都不能让某些激进分子满意，而这一方又拒绝执行工作，那么组织就不可能继续前进。在投票表决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某一时刻，一些人将赢得投票，并按照他们的提议开展工作；而在另一时刻，他们将输掉投票，并按照其他同志的提议开展工作。这种决策形式更重视集体讨论，而不是个人观点。

甚至在有利于专门/特殊组织的核心问题上也存在差异：组织内激进分子的承诺、责任和自律。在 *especifista* 模式中，激进分子的承诺程度很高。因此，激进分子必须在组织面前做出承诺并履行这些承诺。激进分子的承诺在激进分子和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组织对激进分子负责，而激进分子也对组织负责。激进分子对激进分子满意，激进分子也对组织满意。

缺乏承诺、责任和自律是许多无政府主义团体和组织的主要问题。人们聚集在一起，或多或少地参与活动，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经常参与决策，作出承诺却不履行承诺，或者干脆不作出承诺，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有很多组织都遵守这种缺乏战斗性的承诺。不可否认，正因为如此，这些组织“更酷”，但从激进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十分有效。对我们来说，

激进主义是为自由和平等社会而斗争所必需的，因此我们并不认为激进主义会永远“酷”下去。如果我们必须在一种更有效的激进主义模式和另一种更“酷”的激进主义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将不得不选择有效的激进主义模式。

对于具有战斗性承诺的工作，*特定主义(especifismo)* 保持了一个有承诺水平的组织。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我们主张同心圆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所有激进分子在组织中都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空间，这个空间由激进分子想要承担的承诺程度决定。他们想要承担的义务越多，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就越靠前，他们的议事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从支持者或倾向团体到专门/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都有明确的入会标准。只有在意识形态上与组织亲近的激进分子才能进入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

与 *especifista* 模式相反，还有其他一些组织，他们接纳激进分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将他们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不管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有什么概念。有些人在组织中略有参与，有些人则更加投入；有些人比其他人承担更多责任，而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审议权。因此，很多人都会商议自己不会去做的活动，也就是说，他们会决定其他人要做什么。当一个组织允许某人商议某事却不承担责任，或者允许他们承担责任却不履行责任时，就会出现那些商议者的专制主义，把工作推给其他同志。最后，在另一种模式中，每个人都以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参与，在他们认为应该参与的时候出现，很少强调战斗性承诺的问题。许多人在受到质疑时，声称自己是专制主义的受害者。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对我们来说，这种组织模式除了使责任心较强的激进分子不堪重负外，还让那些不按相同比例进行思考和工作的人产生了这种差异。

因此，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涵盖所有类型无政府主义者的伟大“保护伞”。这些宽泛的(不)定义显然将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纳入了组织，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应选择数量标准，而应选择激进分子的质量。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适当当地说明我们的真实特征，我们的追随者人数可能会更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拥护者的人数显然会减少，但至少他们会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认真的拥护者。^[188]

在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问题上也存在着相关的差异。*Especifismo* 意味着完全、绝对

地拒绝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因此，它与其他愿意与个人主义者合作的组织不同。对我们来说，无政府主义中有两种个人主义者。一种是过去比较常见的，喜欢单独行动的人，但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的项目。对于这些人，我们只需批评他们的无组织性，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的工作成果潜力化。另一种人放弃了社会主义项目，这种情况在今天更为普遍。他们以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批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批判，也没有在社会改造我们生活的现实方面开展任何活动。他们将自己置于简单的社会批判观察者的地位，从次要的思想家和参考文献中构建无政府主义，仅仅围绕批判。他们没有任何社会项目，更没有指向这个新社会的连贯行动。我们可能会问：

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对我们来说还剩下什么？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原则，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工人平等的自由社会：更有甚者，空洞虚伪的庸医鼓励对自己的生存感到不满的工人通过诉诸个人解决方案来参与其中，而这些解决方案据说是作为解放的个人向他们开放的。^[189]

因此，它们加剧了个人自由的作用，脱离了集体自由的个人自由仅仅成为少数人的自我享乐，他们通过资本主义中的特权可以负担得起这种享乐。实际上，个人自由只能存在于集体自由之中，因为他人的奴役限制了每个人的自由，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集体自由时，才能实现充分的个人自由。我们同意巴枯宁的观点：

我只有在其他人面前，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认为并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当我周围的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同样自由时，我才是真正自由的。他人的自由不仅不是对我自由的限制或否定，相反，它是我自由的必要条件和肯定。只有他人的自由才使我真正自由，这样，我周围的自由人越多，他们的自由越广泛，我的自由也就越大，越深刻……这样，我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所有人的自由的确认，从而延伸至无限。^[190]

对我们来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数百万人无法获得人类最基本必需品的社会中，寻求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认为纯粹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在世界上定位自己的方式，是

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于个人主义者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意味着成为艺术家、波希米亚人，意味着提倡开放的性关系或与不止一个伴侣的性自由，意味着穿不同的衣服，留激进的发型，行为奢侈，吃不同的食物，意味着个人定义自己，个人满足自己，意味着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韵律或理由的话语——享受美学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变得非政治化。我们从根本上不同意这一立场，并认为朝这一方向发展的影响对无政府主义是灾难性的，会使严肃而坚定的激进分子望而却步。最后，我们同意马拉泰斯塔强调的观点：

诚然，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意见一致，并将无政府主义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但我们不相信，在成员之间没有真正的共鸣和一致的情况下，靠让步和限制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组织会是健全的。不团结总比团结不好要好。^[191]

对我们来说，选择最合适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模式至关重要，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最合适的手段，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保持一致。如果我们提倡 *especifismo*（特定主义，一种无政府主义组织形式），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更适合我们今天打算开展的工作。我们知道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 *especifismo*，但我们不认为他们因此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只要求尊重我们的选择，就像我们尊重那些做出其他选择的人一样。

★★★

我们现在简要地谈谈 *especifismo* 的历史背景和影响。正如我们所见，*especifismo* 一词是由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U）提出的，直到 20 世纪末才传入巴西。然而，这个术语并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概念，而是要将一系列从 19 世纪开始形成的已有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概念重新整合在一起。拉美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特定主义”（*especifismo*）主张受到巴枯宁和马拉泰斯塔、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阶级斗争、征用者无政府主义(expropriator anarchism)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在拉丁美洲的背景下产生的。在以下段落中，我们将尝试从自己的概念出发，解释我们是如何理解 *especifismo* 的历史经验

的：在无政府主义组织方面，过去的主要经验对我们今天产生了影响。

Especifismo 的第一个历史参照是巴枯宁 (Bakunin)，他的组织理念构成了国际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IWA) 内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活动，并孕育了无政府主义。

国际工人协会是在法国工人协会的代表访问英国，与英国和流亡的德国工会领袖——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接触后建立起来的。从政治角度看，国际工人协会的组成似乎是异质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和蒲鲁东联邦主义者 (Proudhonian federalists)。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在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中占了多数，与其他思潮的成员结盟并控制了该机构。这种情况甚至在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以总委员会取代中央委员会之后依然存在。人们在那里看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受蒲鲁东启发的，还是巴枯宁的追随者，在协会的中央行政机构中都没有任何力量。他们在基层的影响力更大，这一点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体现。

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形成了两种倾向：一种是集中主义，一种是联邦主义。在专制集权派中，以马克思为理论和政治指导的共产主义者脱颖而出，他们将国际工人协会视为将无产阶级带入政治权力的工具。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机器，通过在专政下进行的中期重组，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自由意志联邦主义者* (*libertarian federalists*) 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社会革命，立即废除一切权力机构，并根据工人的职业、问题和利益，在工人自由和联邦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

这一基本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即国际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已清晰可见。反对专制主义者的是蒲鲁东互助主义者，他们在巴枯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之前就已经属于该协会的集体主义者的支持下领导了辩论。在洛桑 (1867 年) 和布鲁塞尔 (1868 年) 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迅速取代了互助主义，而在巴塞尔 (1869 年) 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在那些厌恶权威的人中占了绝对优势，巴枯宁的出席使集体主义得到了加强。在竞争阵营中，马克思虽然避免在大会上做出个人承诺，但通过委员会的纲领、报告、通讯和提案进行了干预。在巴塞尔，巴枯宁提出了反对继承权的提案。马克思反对他，但提案获得通过。

巴枯宁还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范围内，与其他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一起成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该联盟于 1869 年被接纳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会。我们将联盟理解为在国际工人协会（社会层面）内运作的一个特定的无政府

主义组织（政治层面）。同盟是一个活跃的少数派组织，由“最安全、最敬业、最聪明、最有活力的成员组成，一句话，由最亲密的人组成”^[192]。它的成立是为了秘密行动，以解决无法公开解决的问题，并在工人运动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同盟界定了社会和政治层面之间的关系：

同盟是国际的必要补充……但是，国际和同盟虽然最终目标相同，但同时追求不同的目标。一个国际的使命是跨越民族和国家的差异，跨越所有国家的边界，把劳动群众、千百万工人团结成一个巨大而紧密的整体；另一个同盟的使命则是为群众指明真正的革命方向。这两个组织的纲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因其各自的发展程度而有所不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国际的纲领，它也是同盟纲领的萌芽，但只是萌芽。同盟的纲领是对国际纲领的最终解释。^[193]

同盟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做法导致专制主义倾向试图孤立和诋毁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做法。巴塞尔大会后，对集体主义团体的攻击愈演愈烈。1870 年，马克思将总委员会的两封私人信件转发给国际工人协会各分会，严厉批评了巴枯宁主义的立场。他以此为次年的伦敦会议和 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营造了气氛，在伦敦会议上，马克思主义团体试图将征服国家政权的理论强加于人。在这次全会上，他敦促将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并获得了通过。到 1874 年，国际已不复存在。

马拉泰斯塔 (Malatesta) 是 especifismo 的第二个历史代表，他是加入巴枯宁联盟的激进分子，也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组织主义潮流 (*organisationalist current of anarchist communism*) 的代表人物。巴枯宁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在未来社会中按劳动时间进行分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继承了这一集体主义传统，自此主张按需分配。马拉泰斯塔的特点是在这一潮流中捍卫反对进化论和科学主义的立场，这些立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了很大一部分。马拉泰斯塔认为，未来不一定是确定的，只能通过积极的意志来改变，通过对事件的自愿介入来实现理想的社会变革。

马拉泰斯塔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个人主义，他主张一种完全建立在组织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保持着独特的作用。在政治层面上，马拉泰斯塔发展了他对特定无政

府主义组织的概念，他称之为无政府党 (*anarchist party*)^[194]：“我们所说的无政府党是指所有希望为实现无政府状态做出贡献的人，因此，他们需要设定一个要实现的目标和一条要走的路”^[195]。这个组织应该在当时所谓的“群众运动”中采取行动，并尽可能地影响他们，而工会则是无政府主义活动的首选阵地。马拉泰斯塔明确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的差异，即当时由工团主义构成的嵌入空间：

在我看来，工人运动不过是一种手段——虽然毫无疑问，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手段。但我拒绝把这种手段当作目的……而工团主义者则倾向于将手段转化为目的，并将各个部分视为一个整体。这样一来，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工团主义开始转变为一种新的学说，威胁到无政府主义的存在……过去，我曾感叹同志们将自己孤立于工人运动之外。今天，我感叹的是，在另一个极端，我们中的许多人允许自己被同样的运动所吞没。再次重申，工人阶级的组织、罢工、直接行动、抵制、破坏和武装起义本身只是手段，无政府状态才是目的。^[196]

马拉泰斯塔主张从意志出发寻求社会变革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正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应在阶级斗争中、在社会运动中采取行动，并与社会运动一起实现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他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为此，马拉泰斯塔力图创建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如意大利无政府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党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盟；以及在社会层面行动的组织，如意大利工会联盟 (*Italian Syndical Union, USI*)、劳工联盟和阿根廷的工会。另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路易吉·法布里 (Luigi Fabbri) 广泛传播了马拉泰斯塔的立场，他也为 *especifismo*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我们的概念中，墨西哥自由党 (*Mexican Liberal Party, PLM*) 激进阶段的马贡主义 (Magonismo) 也是 *especifismo* 的重要经验。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 (Ricardo Flores Magón) 是该党最活跃的激进分子，他于 1901 年加入墨西哥自由党——该党成立于一年之前。在波菲里奥·迪亚斯 (Porfirio Diaz) 独裁统治期间，墨西哥自由党和《再生》杂志都是政权的主要反对者。从 1900 年代后半期开始，墨西哥自由党开始激进化，发表了更具战斗性的言论，并在党内制造了紧张局势，清除了不太激进的分子。解放运动没有参加选举，只是作为当时自由意志革命者（不以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独裁统治为目标）的政治和横

向沟通空间，以结束迪亚斯政府，进而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墨西哥自由党成为秘密组织，在墨西哥各地组织了 40 多个武装抵抗团体，其中还有原住民成员，他们以争取社区权利和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闻名。激进化之后，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不同意用和平手段夺取迪亚斯的权力。

迪亚斯领导的 1910 年选举舞弊将引发墨西哥革命的爆发。马德罗被捕后，他在选举中的对手设法让自己连任。流亡到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马德罗制定了《圣路易斯计划》(San Luis Plan)，号召发动武装起义，同时宣布 1910 年的选举无效，拒绝接受迪亚斯的选举，并自任临时总统。许多反叛者响应了革命号召，其中包括在莫雷洛斯地区原住民人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Emiliano Zapata)，以及曾是偷牛贼和银行抢劫犯、长期以来受到杜兰戈和奇瓦瓦地区卑微民众认可的潘乔·维拉 (Pancho Villa)。他们团结在反再选举阵线中，每个团体都有相对的自主权和独立性。1911 年，在革命的浪潮中，在北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Industrial Worker of the World, IWW*) 的支持下，以马贡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下加利福尼亚地区，攻占了墨西卡利等重要城市。1 月底，他们成立了下加利福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Socialist Republic of Baja California*)，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马贡主义者还在新莱昂、奇瓦瓦、索诺拉、瓜达卢佩和卡萨斯格兰德斯等城市取得了胜利。

萨帕塔在莫雷洛斯组织的起义和“阿亚拉计划”构成了农民为革命而斗争的工具，始终受到“土地与自由”口号的鼓舞。萨帕塔和马贡主义者之间的这一重要关系的成果就是萨帕塔邀请马贡将再生计划带到莫雷洛斯。

此后，墨西哥陷入内战，并试图在 1914 年底成立国民大会。依次发生的事件，如维拉和萨帕塔企图攻占墨西哥城，卡兰萨召开制宪会议，随后当选总统并被暗杀，以及该国随后发生的冲突，最终构成了该国革命时期衰落的背景。

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俄国革命是 *especifismo* 的另一个重要历史参照。1917 年初，圣彼得堡的几个军团发生兵变，临时政府在议会的支持下成立，1905 年的苏维埃得以重生。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昭然若揭。在乌克兰南部，自 1905 年革命以来一直拥有强大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吉利艾波列 (Gulyai-Polye) 村农民成立了农民联盟，决定独立于政府为社会革命而战，寻求生产资料的自我管理。在彼得格勒，它要求工人控制工厂，而喀琅施塔得 (Kronstadt) 的水兵则扛着红黑相间的旗帜向城市进军，目标是建立苏维埃和自我

管理的共和国。10月，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士兵协同行动，攻占了冬宫。前者主张夺取国家机器，走向由全能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后者主张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共产主义，其形式是工人、农民和人民的苏维埃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逐渐开始否定、压制、阻碍并最终禁止自由意志思想和实践的传播。早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反对工人控制工厂，逼迫工人盲目听命于党，并逐步加强禁止反对党的措施。他们将劳工军事化，将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逐出苏维埃，强迫这些（苏维埃）服从党的中央权力，并禁止罢工。

在与白军的斗争中，乌克兰的马赫诺起义军不止一次地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在击败白军威胁后，马赫诺军队遭到了红军的攻击和迫害，幸存者被迫到其他国家避难。这是乌克兰自我管理的社会化进程的终结，布尔什维克以镇压的方式推翻了这一进程，转而在新的统治阶级领导下实行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组织形式和社会控制。喀琅施塔得水兵要求苏维埃代表重新通过选举产生；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团体获得自由；工会和农民组织恢复联合；释放政治犯；废除政治官员；以及所有人获得同样的食物，但他们却被布尔什维克杀害了。

尽管这场无产阶级和自由意志革命被布尔什维克篡夺和支配，因为他们夺取了国家机器，但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却因疏忽而犯下了罪过。多年后，在欧洲的俄罗斯移民在一份名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组织平台》(*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Libertarian Communists*)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了这一思考。马赫诺、阿尔希诺夫(Arshinov)等人在这份文件中正式阐述了他们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思考。这份文件就无政府主义者参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暴力社会革命以及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提出了重要见解。此外，《平台》还就从资本主义向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以及捍卫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平台》主张在政治层面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在社会层面的社会运动中采取行动，并强调了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少数积极分子的作用。此外，它还对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层面的组织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它是一份重要文件，在无政府主义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特殊主义/特定主义(especifismo)与平台主义(Platformism)是一回事。正如我们在本文中一直试图说明的那样，对我们来说，especifismo 比平台主义要广泛得多，其理论基础是巴枯宁和马拉泰斯塔的组织概念。对我们而言，《平台》既借鉴了这些作者的观点，又带来了新的贡献，因此应被视为对 especifismo 的贡献，但不是最重要的

贡献。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平台》的写作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进程中的军事行动经历，因此不应脱离这一背景。我们知道，《平台》中所表述的这种组织形式不应在非革命形势下完全适用。与其说它是一份讨论无政府主义在所有不同情况下的组织形式的文件，不如说它是对无政府主义军事行动讨论的贡献。

与俄国革命一样，我们也将 1936 年的西班牙革命作为参考。在那些年里，一场社会革命有效地展开了。从不公的经济结构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腐朽的等级观念到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一场革命的触角伸向了各个领域。而这一切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杰作。

朱塞佩·法内利(Giuseppe Fanelli)是一位与巴枯宁关系密切的同盟主义者(alliancist)和激进分子，他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带到了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 CNT*) 成立于 1910 年，是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的最大表现形式，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它一直在不断的镇压中起起伏伏，成为镇压的受害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 FAI*) 成立于 1927 年，是一个致力于革命活动的秘密组织，其目标之一是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中的改良主义思潮。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取得了霸权地位。

1936 年，人民阵线 (Popular Front，汇集了左翼政党) 在选举中获胜。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在战术上支持了人民阵线，因为这意味着释放被监禁的同志。有了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人民阵线的胜利才成为可能。然而，法西斯并未接受失败。1936 年 7 月 18 日，长枪党(Phalangist)政变运动爆发，其中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脱颖而出。革命的爆发由此拉开了序幕，使国家陷入了长达三年的内战。在第一阶段 (1936 年 7 月至 1937 年初)，无政府主义者是最突出的团体之一。激进分子在加泰罗尼亚等地区的行动堪称典范。在激烈而成功的集体化进程中，共和国机构变成了人民组织。工厂被占领，社会措施立即付诸实施，例如：男女同工同酬、免费医疗服务、生病时领取长期工资、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冶金、木材工业、运输、食品、卫生、媒体和娱乐服务以及农村财产都实现了集体化。为了打击法西斯势力，他们成立了民兵，在一些战线上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 (Buenaventura Durruti) 领导的纵队。

在第二阶段 (1937 年至 1939 年)，反革命的进展是毁灭性的。长枪党人得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大力支持。抵抗力量武器落后，人数众多。为阻止纳粹-法西斯前进而组建的国际纵队战士寥寥无几。此外，自由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他们

又一次洗手不干了。苏联的“支持”被证明是真正的“特洛伊木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由斯大林主义者推动的对无政府主义者和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Labour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 POUM*) 的追捕也在同时进行。那些试图重建国家基础的人（共和国的温和派、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摧毁了 CNT/FAI 取得的进步。共产党人开始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再次屈服于不利的环境：CNT 的一些成员最终加入了政府。

在巴西，我们可以说，由于 *especifista* 思潮事实上并未完全实现，我们的意识形态参考涉及到过去的一些倡议，以及我们认为在巴西近代史上同一思潮的其他签署者。我们了解到，从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开始，与“组织主义”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马拉泰斯塔的追随者，就努力将可能数量的同志组织起来，以期在战术协议和明确的团体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战略战术的组织。

正是这些人通过全国无政府主义最激动人心的倡议，于 1906 年召开了巴西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为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融入工会和社会生活创造了条件，除了合理的文字创作外，他们还成立了学校和剧团。在很大程度上，这股“组织主义”潮流还最终帮助筹备了 1918 年的无政府主义起义、创建了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盟 (*Anarchist Alliance of Rio de Janeiro*)、成立了以自由意志为特征的巴西共产党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以及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将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区分开来的事件。

在这第一阶段，Neno Vasco、José Oiticica、Domingos Passos、Juan Peres Bouzas、Astrojildo Pereira（直到 1920 年）和 Fábio Luz 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后来，在社会无政府主义沉睡了将近二十年之后，组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在《直接行动》 (*Ação Direta*) 杂志上重新出现，然后，随着 1964 年军事政变的完成，我们再次失去了这一阵营的主要力量，其代表人物是爱迪尔·佩雷斯 (*Ideal Peres*) 和自由学生运动 (*Movimento Estudantil Libertário, MEL*) 的学生。

最后，我们提倡的另一个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影响的拉丁组织是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Federación Anarquista Uruguaya - FAU*)，它成立于 1956 年，受到了阶级斗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巴枯宁 (Bakunin) 和马拉泰斯塔 (Malatesta) 的组织模式以及普拉塔河 (Plate River) 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为了发展一种直面拉丁裔问题的无政府主

义，FAU 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各条战线开展工作。它参加了全国工人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 of Workers, CNT）的工会活动，该工会采用非官僚模式，具有内部民主和阶级斗争倾向。在所谓的战斗倾向中成立了直接行动协会(*Direct action associations*)。随着 1967 年非法法令的颁布，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合会转入地下。

即使在这一秘密时期，在镇压和逮捕激进分子的情况下，FAU 仍设法在全国工人大会、学生运动和反对共产党（CP）合作主义的斗争中保持其工会活动。它发行了自己的出版物 *Cartas de la FAU* («FAU 来信»)。1968 年，工人-学生抵抗运动 (*Workers-Student Resistance, ROE*) 成立，这是一个采取对抗策略的群众性组织机构，学生和工会成员参与了工厂占领和学生示威活动。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发展群众组织的同时，工联还发展了其“武装组织”，即人民革命组织-33 (*Organización Popular Revolucionaria - 33, OPR-33*)，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破坏行动、经济征用、绑架人民特别痛恨的政客和/或老板、武装支持罢工和占领工作场所等活动。FAU 放弃了作为武装斗争范例的焦点主义(focalism)，避免了军事化，同时拥有了对民众的社会嵌入。1973 年独裁统治开始后，FAU 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大罢工上，这次罢工使国家瘫痪了近一个月。它开展秘密活动，多名激进分子被捕、遭受酷刑并被杀害。随着政治的开放，它重新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并按照我们今天所倡导的 *especifista* 模式开展工作，即在工会、学生和社区三条阵线上开展活动。

总之，我们对 *especifismo* 历史渊源的理解并非教条式的。我们有广泛的想法，从巴枯宁和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同盟主义者的想法开始，到马拉泰斯塔的概念及其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实践经验，以及马贡和墨西哥革命中的 PLM 的经验。我们还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的经验的影响，重点是乌克兰的马赫诺主义者和流亡的俄国人在组织方面的反思，以及围绕 CNT-FAI 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中的经验。在巴西，我们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组织主义”的影响，突出了 1918 年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盟和 1919 年(自由意志)共产党的经验。最后，FAU 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以及在与工会、社区和学生运动的阵线活动中都受到了影响。这一整套概念和经验为我们今天的 *especifismo* 概念做出了贡献。目前，*especifismo* 得到了拉丁美洲各组织的倡导，并在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了实际发展，即使没有这个名称。

说明和结论

敬工作的同志们！任务艰巨。大家干起来！

——艾力格·马拉泰斯塔 (Errico Malatesta)

第一届大会在激进分子之间团结一致的气氛中召开，完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大会为反思、评论、辩论和结论提供了适当的空间。所有积极分子的评价都非常积极。

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组织中不可或缺的老一辈和更有经验的激进分子，这样前几代人的激进知识才不会丢失，同时也是对新一代的培训和指导。大会向“老将”致敬，同时也欢迎“新将”的加入，因为这有助于将他们的长辈一直倡导的理念付诸实践。自 1970 年代、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以来一直参加斗争的本组织激进分子强调了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了激进主义的连续性，对我们来说，这种连续性始于胡安·佩雷斯·布扎斯 (Juan Perez Bouzas)，贯穿了爱迪尔·佩雷斯斗争的整个历史，通过自由意志研究会 (*Círculo de Estudos Libertários, CEL*)，后来成为爱迪尔·佩雷斯自由意志研究会 (*Círculo de Estudos Libertários Ideal Peres, CELIP*)，并于 2003 年组成了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RJ)。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将这段历史中不同人物的愿望付诸实践，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赋予这段历史以应有的延续性。

目前，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探索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寻求建立人民组织。我们正试图通过我们的三条战线来实现这一目标。

城市社会运动阵线 (*urban social movements front, 我们的老职业阵线*) 自 2003 年以来一直与里约热内卢的城市职业运动合作，延续了我们在 1990 年十年间与无家可归者运动合作的经验。目前，这一阵线还包括失业工人运动 (*Movimento de Trabalhadores Desempregados, MTD*) 的重建，该运动在全国各地为工作而奋斗，自 2001 年以来一直存在于里约热内卢。目前，MTD 正在恢复力量，重新集结和团结来自贫困社区的人们开

展斗争。此外，该阵线还与无地工人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MST）保持联系，并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为其提供政治教育课程。该阵线还与其他实体和社会运动保持密切联系并开展活动，如人民大会（Assembléia Popular - RJ）和无家可归者国际主义阵线（Frente Internacionalista dos Teto - FIST）。

社区阵线负责管理里约热内卢社会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 Social do Rio de Janeiro - CCS-RJ），这是我们在城市北部维护的一个开放式社会空间，举办了许多社区活动，如废物回收、为 Morro dos Macacos 贫困社区提供辅导和入学考试课程、戏剧讲习班、文化活动、庆祝活动和各种会议。该阵线还负责管理法比奥-卢斯社会图书馆（Biblioteca Social Fábio Luz - BSFL），该图书馆自 2001 年以来一直存在，并围绕该图书馆开办了马克斯-达科斯塔研究中心（Núcleo de Pesquisa Marques da Costa - NPMC），该中心成立于 2004 年，除了研究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外，还旨在为该组织提供理论支持。此外，社区阵线还管理着 CELIP，这是 FARJ 的公共空间，旨在举办讲座和辩论，以吸引那些对无政府主义新感兴趣的人。

名为“无政府主义与自然”（Anarchism and Nature）的农业生态阵线（*agro-ecological front*）在从事农业和社会生态工作的农村社会运动和团体中开展活动。它与无地工人运动（MST）、“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以及佛罗里合作社（Floreal Cooperative）和食品与健康胚芽中心（Núcleo de Alimentação e Saúde Germinal）等机构保持联系并开展合作。它在职业、学校和贫困社区举办教育讲习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农业、农业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生态扫盲和团结经济。它寻求让工人、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和学生参与其活动。

为了满足一个重要的需求，我们领导了一个“横向”项目，将各条战线都纳入其中，名为“人民大学”（UP-RJ）。事实上，这项建议是在反资本主义大众教育行动中提出的，其重点是社会变革，其策略是在社会运动中开展政治教育。其他“横向”工作还包括出版《自由》杂志（Libera）和《抗议》（Protesta）杂志！（与圣保罗无政府主义团体 Terra Livre 的同志们合作）；以及一些书籍，如 Frank Mintz 所著的《O Anarquismo Social》、迭戈·阿瓦德·德桑蒂兰（Diego Abad de Santillán）所著的《O Anarquismo Hoje da União Regional Rhone-Alpes e Ricardo Flores Magón》。最后，还有政治教育、关系、资源管

理等内部工作。

我们正在开展工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正如马拉泰斯塔曾经说过的那样，任务非常艰巨。认识到任重而道远，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变革工程的伟大，非但没有使我们气馁，反而成为一种不断增长的燃料，激励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日复一日地完成这项如此紧迫的任务。

我们希望这一简短的理论贡献能够有助于在各地建设激进的无政府主义。

为了社会无政府主义！

为了恢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媒介！

社会革命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1] Dielo Trouda "Plataforma organizativa por una Unión General de Anarquistas"。由弗兰克-明茨修订和更正的西班牙文译本。我们引用了直接从俄文译出的这一译文，因为我们现有的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均从法文译出）与俄文原文有若干差异。虽然这里文件的标题是西班牙文，但我们指的是翻译成英文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组织平台》(The 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

[2]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状态》(Anarquismo y Anarquia)。摘自《Pensiero and Volontà》，1925 年 5 月 16 日。摘自《Pensiero and Volontà》，1925 年 5 月 16 日： 弗农-里查尔

[3] Luigi Fabbri, "资产阶级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4] 默里-布克金："社会无政府主义或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不可逾越的鸿沟"。

[5] 同上。

[6] Frank Mintz, Anarquismo Social. 圣保罗: Imaginário/Faísca/FARJ/CATL, 2006 年, 第 7 页。

[7] FARJ. "A Propriedade é um Roubo". In: Protesta! 4. 里约热内卢/圣保罗: FARJ/CATL, 2007, p. 11.

[8] 正如作者所言, 这种分类并不打算穷尽所有关系, 有些类别是重叠的。作者还认为, "地区"一词更多地是指社会而非地理概念。鲁道夫-德容。"Algumas Observações sobre a Concepção Libertária de Mudança Social". 见 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O Estado Autoritário e Movimentos Populares». 里约热内卢: Paz e Terra, 1980 年, 第 305-353 页。原始分类见该书第 309 和 310 页。该书于 2008 年由 Faísca 出版社与 FARJ 合编再版, 书名为 "A Concepção Libertária da Transformação Social Revolucionária"。

[9] 同上, 第 312 页。

[10] FARJ. "Por um Novo Paradigma de Análise do Panorama Internacional". In: Protesta! 4!, p. 31.

[11] Rudolf de Jong. 同上, 第 324 页。

[12] FARJ. "Por um Novo Paradigma...". In: Protesta! 4!, p. 31.

[13] Alexandre Samis. "Pavilhão Negro sobre Pátria Oliva". In: História do Movimento Operário Revolucionário. 圣保罗: Imaginário, 2004 年, 第 179 页。

[14] 同上, 第 136 页。

[15] Pierre Monate. "Em Defesa do Sindicalismo". In: George Woodcock. Grandes Escritos Anarquistas. Porto Alegre: LP&M, 1998, p. 206.

[16] Errico Malatesta. "Sindicalismo: a Crítica de um Anarquista". In: George Woodcock. Op. Cit. p. 207.

[17] Alexandre Samis. "Anarquismo, 'bolchevismo' e a crise do sindicalismo revolucionário". (仍未出版)。

[18] José Oiticica 载于《A Pátria》, 1923 年 6 月 22 日。

[19] José Oiticica、Fabio Luz 和其他在里约热内卢激进化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一个名为 Os Emancipados 的无政府主义者特殊团体。

[20] Alexandre Samis. "Anarquismo, 'bolchevismo' e a crise do sindicalismo revolucionário»。

[21] 同上。

[同上。"Pavilhão Negro sobre Pátria Oliva". In: História do Movimento Operário

Revolucionário», 第 181 页。

[23] Felipe Corrêa. Anarquismo Social no Rio de Janeiro: breve história da FARJ e de suas origens. Lisboa: CEL/Cadernos d'A Batalha, 2008 年, 第 25 页。

[24] FARJ. "Manifesto de Fundação".

*** 使用 www.DeepL.com/Translator 翻译（免费版） ***

[25] 生产资料构成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指生产工具，如机械、设备、工具、技术；设施，如建筑物、仓库、办公室；生产中使用的能源，可能是电力、水力、核能、风能；以及运输工具。劳动对象是人类劳动赖以生存的要素，如原材料、蔬菜和动物、土地等。

[26] 无产阶级：除了后代或子女之外一无所有的人。

[27] Piotr Kropotkin. "As Nossas Riquezas». In. A Conquista do Pão: A Conquista do Pão. Lisboa: Guimarães, 1975 年, 第 28 页。

[28] Pierre-Joseph Proudhon. "2eme. Memoire sur la Proprieté". In: A Nova Sociedade. Porto: Rés Editorial, s/d, p. 35.

[29] 同上。O que é a Propriedade? 圣保罗: Martins Fontes, 1988 年, 第 159 页。

[30] Fabio López López. Poder e Domínio: uma visão anarquista. 里约热内卢: Achiamé, 2001 年, 第 83 页。

[31] Mikhail Bakunin. O Sistema Capitalista. São Paulo: Faísca, 2007, p. 4.

[32] 同上，第 14 页。

[33] Piotr Kropotkin. "A Expropriação". In. A Conquista do Pão: A Conquista do Pão», 第 62 页。

[34] Mikhail Bakunin. O Sistema Capitalista», 第 6-7 页。

[35] 同上。A Instrução Integral. 圣保罗：Imaginário 出版社，2003 年，第 69 页。

[36] Subcomandante Marcos. "Entrevista a Ignácio Ramonet". In: Marcos: la dignidad rebelde. 智利：Aún Creemos en los Sueños SA, 2001, p. 26.

[37] 同上，第 27 页。

[38] Noam Chomsky. O Lucro ou as Pessoas. Rio de Janeiro: Bertrand Brasil, 2002 年，第 136 页。

[39] 同上，第 36 页。

[40] Murray Bookchin. "生态宣言：毁灭的权力，创造的权力»。In: Letra Livre 31. 里约热内卢：Achiamé, 2001 年，第 8 页。

[41] Errico Malatesta. A Anarquia. 圣保罗：Imaginário, 2001 年，第 15 页。

[42] 中世纪存在的工匠、商人和艺术家的企业协会。

[43] Piotr Kropotkin. *O Estado e seu Papel Histórico*. 圣保罗: Imaginário 出版社, 2000 年, 第 64 页。

[44] Errico Malatesta. “‘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In: *Anarquistas, Socialistas e Comunistas*. 圣保罗: Cortez, 1989 年, 第 141 页。Livro em processo de reedição pela editora Scherzo.

[45] Piotr Kropotkin. "A Decomposição dos Estados"。In: *Palavras de um Revoltado*. 圣保罗: Imaginário, 2005 年, 第 30 页。

[46] Mikhail Bakunin. *Estatismo e Anarquia*. 圣保罗: Imaginário, 2003 年, 第 169 页。

[同上, 第 47 页。]

[同上, 第 212 页。]

[49] Pierre-Joseph Proudhon. "Crítica às Constituições"。In : Proudhon. 圣保罗: Ática, 1986 年, 第 87 页。

[50] 这里使用的 "politics" (政治) 一词, 在本文中还将多次使用, 可理解为: "源于……": "政治"一词源于形容词 polis (Politik), 意指所有与城市有关的事物, 因此也指城市的、公民的、

公共的，甚至社会的和交际的事物。Norberto Bobbio et al. Dicionário de Política. 巴西利亞：Editora UNB，1993 年，第 954 页。因此，我们并不把政治理解为通过代议制民主方式进行的政治。这里的 "政治 "是指有效地参与和决定社会问题，尤其是影响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理念是，选举领域之外还有政治。

[51] Mikhail Bakunin. Estatismo e Anarquia», 第 74 页。

[52] Piotr Kropotkin. "O Governo Representativo". In: Palavras de um Revoltado», 第 154 页。

[53] Mikhail Bakunin. Estatismo e Anarquia», 第 73 页。

[54] 同上。

*** 使用 www.DeepL.com/Translator 翻译（免费版） ***

[巴枯宁提出了社会革命的经典概念，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当我们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区分开来时，我们寻求的是同样的经典区分，即把政治革命视为只发生在 "政治 "层面、通过国家进行的变革。

[56] Mikhail Bakunin.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第 52 页。

[同上。"Protesta de la Alianza". In: Frank Mintz (org.). Bakunin: crítica y acción. Buenos Aires. Anarres, 2006, p. 33: Anarres, 2006, p. 33.

[58] 同上。"Cartas a un francés". In: Frank Mintz (org.). Bakunin: crítica y acción, p. 22.

[59] 同上。"La Comuna de Paris y la Noción del Estado" and "Estatismo e Anarquía". In: Frank Mintz (org.). Bakunin: crítica y acción, pp. Plínio A. Coêlho 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葡萄牙语翻译。Estatismo e Anarquia»一文的葡萄牙语译文见前述出版物，《A Comuna de Paris e a Noção de Estado》一文的葡萄牙语译文见出版物：米哈伊尔-巴枯宁。O Princípio do Estado e Outros Ensaios. 圣保罗：Hedra，2008 年。

[60] Errico Malatesta. "A Violência e a Revolução». In. Anarquistas, Socialistas: Anarquistas, Socialistas e Comunistas», 第 40 页。

[61] 同上。"Uma Vez Mais Sobre Anarquismo e Comunismo". In: Anarquistas Socialistas e Comunistas», 第 70 页。

[62] Mikhail Bakunin. Federalismo, Socialismo e Antiteologismo. 圣保罗：Cortez, 1988 年, 第 38 页。

[63] 同上。

[64] 无政府主义者自蒲鲁东开始使用 "联邦制" 一词, 蒲鲁东在 1863 年的 Do Princípio Federativo 和其他著作中正式阐述了他的联邦制理论。联邦制是二十世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的标志, 主要是那些在 IWA 中行事的人。不要将这种自由联邦主义与国家主义联邦主义混为一谈。自我管理 "一词是在一个世纪后, 即 20 世纪 60 年代才出现的, 用来替代自治、自我管理、自主等其他词。如今, 这两个词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互补性。

[65] Pierre-Joseph Proudhon. De la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 In: A Nova Sociedade», 第 26 页。

[66] Piotr Kropotkin. "As Nossas Riquezas». In. A Conquista do Pão: A Conquista do Pão», 第 30 页。

[67] James Guillaume. "关于社会组织的想法»。In. Daniel Guérin: Daniel Guérin. No Gods, No Masters. San Francisco: AK Press, 1998, p. 213.

[同上, 第 210 页。]

[69] Mikhail Bakunin. Federalismo, Socialismo e Antiteologismo», 第 37 页。

[70] Michael Albert. PARECON. 伦敦: Verso, 2003, pp. 关于复杂平衡任务的讨论, 见本书第 103-111 页。

[71] James Guillaume. 同上, 第 211 页。

[72] Mikhail Bakunin. Federalismo, Socialismo e Antiteologismo», 第 18 页。

[73] Murray Bookchin. "Um Manifesto Ecológico: o poder de destruir, o poder de criar". In: Letra Livre 31, p. 8.

[74] 同上。Sociobiologia ou Ecologia Social? Rio de Janeiro: Achiamé, s/d, p. 71.

[75] Pierre-Joseph Proudhon. Do Princípio Federativo. 圣保罗: Imaginário, 2001 年, 第 90 页。

[76] 同上。

[同上，第 91 页。]

[78] Piotr Kropotkin. "无政府主义"。In: 大英百科全书》。

[79] Mikhail Bakunin. A Instrução Integral》，第 78 页。

[80] 同上。"A Comuna de Paris e a Noção de Estado". In: O Princípio do Estado e Outros Ensaios》，第 114-115 页。

[81] 同上。"Moral Revolucionária". In. Conceito de Liberdade : Conceito de Liberdade. Porto: Rés Editorial, s/d, p. 203.

[82] Errico Malatesta. "A Organização I"。In: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 圣保罗，Imaginário，2000 年，第 49 页。在马拉泰斯塔看来，无政府主义政党与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是一回事。

[83] Fabio López López. Poder e Domínio: uma visão anarquista, 第 75 页。

*** 使用 www.DeepL.com/Translator 翻译（免费版） ***

[84] 路易吉-法布里。"无政府主义组织"。In: Italian Anarcho-Communism. São Paulo, Luta Libertária, s/d, p. 109。

[85] Errico Malatesta. "劳动群众反对政府和老板的组织"。见《革命文集》，第 39 页。

[86] FARJ. "财产是一种抢劫"。In: Protest! 4, p. 7.

[87] Errico Malatesta. "组织"。摘自《Pensiero e Volontà》，1925年5月16日。In: Vernon Richards. Op. Cit. pp.

[88] 同上：《组织 I》。见《革命文集》，第 51 页。

[89] Pierre-Joseph Proudhon. "1ere. Mémoire sur la Propriété"。见《新社会》，第 35 页。

[90] 同上。

[91] Mikhail Bakunin. "革命党的战术和纪律"。见：《自由的概念》，第 198-199 页。

[92] FARJ. "关于承诺、责任和自律的思考"。

[同上。]

[94] Errico Malatesta. "组织 II"。见《革命文集》，第 59 页。

[95] 米哈伊尔-巴枯宁。"组织的需要"。见《自由的概念》，第 136 页。

[日内瓦的双重打击]。圣保罗：Imaninário/ Faísca, 2007 年，第 94 页。

[同上，第 90 页。]

[98] Errico Malatesta. "无政府主义者与劳工运动”。摘自 Il Risveglio 1927 年 10 月 1-15 日。In: Vernon Richards. Op. Cit. p. 111.

[99] Mikhail Bakunin. "革命力量的统一和纲领.....»,《自由的概念》，第 163 页。

[100] 同上。"国际的政治学”，载于弗兰克-明茨（编）。Bakunin: crítica y acción, P. 85. 尽管巴枯宁是教士问题的激烈批评者，但他认为即使是宗教工人也应该参加工人运动。我们和他一样认为，宗教不应分裂社会运动。关于巴枯宁对上帝和宗教的批判，请参阅：Mikhail Bakunin. God and the State. 圣保罗：Imaginário，2000 年，以及 Mikhail Bakunin. 联邦制、社会主义和反神学»。

[101] Popular University. 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与人民组织»。里约热内卢：UP / MTD-RJ (出版中)。

[102] 彼得-克鲁泡特金。"致青年»,《起义者的话》，第 67 页。

[103] Emile Pouget. 直接行动»。

[104] FARJ. "里约热内卢，2006 年。

[105] Errico Malatesta. "无政府主义与改革»,《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第 146 页。

[106] 同上。"越糟越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第 67 页。

[107] Mikhail Bakunin. 双重日内瓦罢工》，第 92-93 页。

[108] 同上。"革命的一些条件"。自由的概念》，第 128-129 页。

[109] 同上。"好战教育"。见《自由的概念》，第 147 页。

[110] Errico Malatesta. "组织 II"。见《革命文集》，第 55 页。

[111] Nestor Makhno. "我们的组织"。In: Anarchy and Organisation. St Paul, Libertarian Struggle, s / d, p. 31.

[112] Luigi Fabbri. "无政府主义组织"。In: Anarco-Comunismo Italiano, pp.

[113] Errico Malatesta. "无政府主义宣传"。摘自《Pensiero e Voluntà》，1925 年 1 月 19 日。In: Vernon Richards. 作品，第 171 页。

[114] 同上，第 172 页。

[115] Mikhail Bakunin. "无产阶级的动员"。见：《自由的概念》，第 134 页。

[FARJ. "原则宪章"。]

[接下来七段中的引号指的就是这份文件。

[118] Luigi Fabbri. "A Organização Anarquista». In. Anarco-Comunismo Italiano, p. 116: Anarco-Comunismo Italiano», 第 116 页。

[119] 同上，第 124 页。

[120] Juan Mechoso. Acción Directa Anarquista: una historia de FAU. 蒙得维的亚： Recortes, s / d, p. 199. 梅乔索书中的引号指的是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U）的文件。

[121] 同上，第 190、192 页。

[122] Luigi Fabbri. "A Organização Anarquista". In. Anarco-Comunismo : Anarco-Comunismo Italiano», 第 121 页。

[123] Dielo Trouda. "El Problem de la Organización y la Síntesis notional».

[124] FARJ. "关于承诺的思考……"。本段和下一段中的不明引文指的是这篇文章。

[125] Errico Malatesta. "行动与纪律"。In: 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第 24 页。

[126] FARJ. "对承诺的思考……"

[127] 同上。

[128] Nestor Makhno. "论革命纪律"。In: 《组织与无政府状态》，第 34 页。

[129] Dielo Trouda. "无政府主义者总联盟组织纲领"。

[130] Nestor Makhno. "我们的组织"。In: 《组织与无政府状态》，第 32 页。

[131] Errico Malatesta. "无政府纲领"。In: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第 23 页。

[132] FARJ. "Carta de Princípios."

[133] Mikhail Bakunin. "革命的若干条件"。In: 《Conceito de Liberdade》，第 127 页。

[134] 同上。"Militant Education. In. Conceito de Liberdade, pp: Conceito de Liberdade, pp.

[135] FAU.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本段引文出自同一文件。

[136] Errico Malatesta. "Programa Anarquista. In: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第 18 页。

[137] 同上。"革命的目的"。In: 《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第 55 页。

[138] 在《Em Torno de Nosso Anarquismo》中，马拉泰斯塔强调：“尽可能地挑起运动，以我们的全部力量参与其中，赋予运动更多的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也就是说；支持一切进步力量；在无法获得最大利益时捍卫更好的东西，但始终保持非常明确的无政府主义特征。”见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第 80 页。

[139]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劳动群众的组织……”。见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第 80 页：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第 40 页。

[140] Mikhail Bakunin. “自由与平等”。In: G. P. Maximoff (ed.). Writing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II.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0, p. 9.

[141] 同上。

[142] 同上。“Tactics and Revolutionary Party Discipline. In : Conceito de Liberdade》，第 192 页。

[143] FAU。"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144] 同上。

[145] Errico Malatesta. "Los Movimientos Obrero y los Anarchists。摘自《新乌曼尼塔》，1922 年 4 月 6 日。见： Vernon Richards. 作品，第 114 页。

[146] Mikhail Bakunin. "Militant Education. In. Conceito de Liberdade, p. 146:

Conceito de Liberdade», 第 146 页。

[147] 同上。"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In: Conceito de Liberdade, p. 146:
Conceito de Liberdade», 第 110 页。

[148] Errico Malatesta. "Programa Anarquista." In: Conceito de Liberdade, p. 110.
In: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 第 18 页。

[同上, 第 17 页。]

[150] FAU.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151] FARJ. "Carta de Princípios." [151] FARJ.

*** 使用 www.DeepL.com/Translator 翻译（免费版） ***

[182] Juan Mechoso. 同上, 第 197 页。

[183] FAU. Resoluciones Sobre el Tema Estrategia.

[Errico Malatesta。"A Organização II"。In: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 第 59-60
页。]

[185] Mikhail Bakunin. "Programa Revolucionário e Programa Liberal". In :
Conceito de Liberdade», 第 189 页。

[186] Luigi Fabbri. "A Organização Anarquista". In. Anarco-Comunismo: Anarco-Comunismo Italiano», 第 104-105 页。

[187] Mikhail Bakunin. "Táctica e Disciplina do Partido Revolucionário". In : Conceito de Liberdade», 第 197-198 页。

[188] Idem. "Programa Revolucionário e Programa Liberal". In. Conceito de Liberdade, pp: Conceito de Liberdade, pp.

[189] Dielo Trouda. "El Problema de la Organización y la Noción de Síntesis».

[190] Mikhail Bakunin. Império Knuto-Germânico。引自 Daniel Guérin (org.). Textos Anarquistas (trechos de Ni Dieu, Ni Maître). Porto Alegre: LP&M, 2002, pp.

[191] Errico Malatesta. "A Organização II». In: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 第 62 页。

[192] Mikhail Bakunin. "军事教育». In. Conceito de Liberdade, pp: Conceito de Liberdade», 第 154 页。

[同上, 第 151-152 页。

[194] 不要把这里所说的党派与参加选举或试图通过革命夺取国家的党派混为一谈。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 对马拉泰斯塔来说, "无政府主义政党"与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是一回事。

[195] Errico Malatesta. "A Organização II». In: Escritos Revolucionários», 第 56 页。

[196] 同上。"Sindicalismo: a crítica de um anarquista". In. George Woodcock: George Woodcock. Op. Cit. pp.

{1} 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人

{2} 巴西法西斯运动

{3} 在巴西的政治术语中，assistencialist (assistencialista) 是一个术语，用来指像非政府组织那样向穷人分发食物的人。它与慈善有关。